

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 顾龙生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

毛泽东 经济思想引论

顾龙生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新登字4号

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顾龙生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69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77—356—4

F·356 定价, 8.50元

序 言

蒋学模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显得迫切需要，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并为它服务的。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是极其复杂和极其艰巨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经济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本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不断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解决在新形势下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取得经济建设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经济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经济思想，包括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对于胜利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当然首先要集中力量研究毛泽东同志本人有关经济工作的著作、报告、批示等文字资料以

及他在制定经济政策和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观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按照“句句皆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或“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观点行事，而应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办事，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论证毛泽东同志的哪些观点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哪些观点则已被实践证明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总的看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着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真理，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我们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

顾龙生同志长期从事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曾发表过不少单篇论文。在这部《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中，他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是我国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它的出版，必将促进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工作的发展，是值得庆贺的。

1991年11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言	蒋学模 (1)
----------	-----------

1. 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几点认识 (代绪论)	(1)
-------------------------------	-------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2)
----------------------	-------

二、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	(3)
----------------------	-------

三、建国前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5)
-------------------------	-------

四、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简析	(7)
-----------------------	-------

2. 《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	(11)
----------------------	--------

一、怎样看待《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	(11)
-------------------------	--------

二、《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简析	(12)
-----------------------	--------

1.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12)
------------------------------	--------

2. 乐利者，人所共也	(13)
-------------------	--------

3. 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	(13)
-------------------------	--------

4. 孔子称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3)
-----------------------------------	--------

5. 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	(14)
----------------------	--------

6. 君子谋道不谋食	(14)
------------------	--------

7.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15)
-----------------------------	--------

8.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	(16)
-----------------------	--------

9. 中国固自由也	(16)
-----------------	--------

三、早期思想观点的反映	(17)
-------------------	--------

3.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与实践	(19)
一、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之始.....	(20)
二、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21)
三、调查研究与反对主观主义.....	(23)
四、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方法.....	(24)
五、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	(27)
 4.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30)
一、农村调查研究, 是正确认识农民、制定党的方针、 政策、路线的关键.....	(31)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是中国革命和 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37)
三、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是我国革命唯 一正确的道路.....	(43)
四、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 路.....	(48)
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民问 题的理论.....	(56)
 5. 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61)
一、《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的首篇经济学论 著.....	(62)
二、《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切实地研究了许多经济理 论问题, 内容非常丰富.....	(63)
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	(65)
四、《毛泽东选集》第2版纠正了第1版的《必须注 意经济工作》一文在编辑工作中的三处不很准确	

的地方	(67)
五、重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69)
6. 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71)
一、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71)
二、鄙薄经济工作是儒家说教的影响，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	(74)
三、公私兼顾，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76)
7. 毛泽东论人民群众长远利益	(79)
一、要考虑人民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	(79)
二、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人民群众的远大利益	(82)
三、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	(85)
8.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89)
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的写作	(89)
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的经济理论观点	(94)
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99)
四、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版本	(101)
9. 毛泽东与党的七大	(104)

一、毛泽东在七大上的七次报告·····	(105)
二、关于利用外国资金问题·····	(107)
三、关于“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108)
四、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	(111)
10.毛泽东论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 ·····	(114)
一、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脉络·····	(114)
二、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思想的不一贯性的原因·····	(120)
11.毛泽东财政思想论析 ·····	(124)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原则及内容·····	(125)
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方针的形成·····	(130)
三、解放区的财政政策和特点·····	(135)
四、建国后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137)
五、毛泽东财政思想指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实践·····	(139)
12.毛泽东与半工人阶级 ·····	(143)
一、关于半工人阶级问题的提出·····	(143)
二、半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	(144)
三、纠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	(145)
四、关于在半工人阶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	(148)
13.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矛盾的提出 ·····	(151)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亦即建国头三年的主要社会矛盾·····	(151)
二、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亦即建国头三年主要社会矛盾提出的历史过程·····	(154)

三、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本措施及指导思想·····	(156)
14.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	(161)
一、集体化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	(161)
二、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163)
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急于求成的三次表现及当时的 纠正措施·····	(168)
1. 1952年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小冒进和中央的纠偏措施 ·····	(168)
2. 1954年秋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躁冒进和中共中央的 “停、缩、发”方针·····	(172)
3. 1955年夏季以后的急于求成和党中央的“反冒进”措施 ·····	(176)
四、现在如何看待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81)
五、怎样看待三中全会后农村中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所有制性质·····	(186)
15. 手工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	(190)
一、我国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地位和作用·····	(191)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6)
三、手工业改造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 ·····	(208)
四、如何看待手工业改造的成绩·····	(218)
五、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1956年提出的解 决措施·····	(220)
六、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论述·····	(231)
16.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论述 ·····	(241)
一、建国前夕·····	(241)
二、1951年·····	(242)

三、1952年·····	(242)
四、1953年·····	(245)
五、1954年·····	(258)
六、1955年·····	(262)
七、1956年·····	(275)
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以后·····	(287)
17.毛泽东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创见 ·····	(291)
一、建国以后，党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92)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前途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94)
三、充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向民族资产阶级学习技术和管理经济的经验·····	(295)
四、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299)
五、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300)
18.从实际出发实现中国工业化 ·····	(305)
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306)
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307)
19.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我们的国家 ·····	(309)
一、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309)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所一贯坚持的原则·····	(312)

20. 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	(314)
一、《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314)
二、五大经济关系的实质	(316)
三、《论十大关系》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 方针	(324)
21.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327)
一、计划、调节、平衡	(329)
二、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331)
三、毛泽东论商品生产	(334)
22. 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	(341)
一、按照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是总结长期历史经 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341)
二、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344)
23. 毛泽东论现代化经济建设	(357)
一、改造中国与世界	(357)
二、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 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358)
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360)
附录：近年来在对毛泽东的宣传和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倾 向性问题	(364)
后记	(367)

第 1 章

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几点认识

(代绪论)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经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精微树义坚，今之马列得真传”（董必武：《偶成》），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对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成长，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的实践，积聚上升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实质内容。毛泽东经济思想在今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是永远不可抹煞的。与毛泽东在哲学、军事、政治等其他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比较起来，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棵根

植于中国大地上的硕树的同为芬芳的一枝。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看法和评价，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毛泽东同志在经济思想上的创见，较之于他对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理论，显见薄弱；而且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即使他的经济思想是正确的，但不能成功地运用于中国建设的实际，因而正确的程度也就有局限性了。海外更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志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军事是内行，搞经济，搞外交则不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经济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除一部分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等多已公开发表过，并众所周知外，大量的散见于毛泽东巨帙浩繁的文稿之中，鉴于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在文字上实为其全部著作的很少一部分这个事实，过早地下毛泽东经济思想不丰富的结论，或者甚至否认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就未免失诸慎重了。比如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著作，已经公开出版的，主要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约100万字；加上《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总共才一百几十万字，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全部著作资料，包括他的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

信、诗词、修改等)报告、谈话记录等,约有一千多万字,这是大家所已经知道了的。那末,怎么能够说,在这些未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稿中,不包含一部分能够体现和反映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内容呢?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毛泽东大量文稿中未发掘出来的经济思想方面的真知灼见确实并不少见。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并非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虽然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中有许多熠熠闪光的思想,振奋过几亿人,也有的如未经雕琢的美玉,有极其宝贵的学术价值。但在我们初步地、又比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后,我们必须说,这毕竟是他的弱项。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开拓的领域,的确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未为人知,这样,也就更谈不上真正深入的研究了。因此,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实践,从而去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无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要的价值,应该被视作为一种贡献。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地位,完整地、准确地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

二、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

^①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

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经济思想也应该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集中概括。因此，我们所研究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应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毛泽东所有著作（包括文章、课堂笔记、指示、批示、批注、讲话提纲、书信、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电报手稿、讲话、谈话记录稿、报告、用毛泽东名义印发的并经毛泽东审定过的别人起草的文稿、以别人名义刊发的毛泽东起草的文稿等）中的经济理论、经济观点、经济设想等等。

第二，根据毛泽东经济理论制定的党的经济政策（纲领、路线、方针），这些经济政策是体现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稿中的，不包括毛泽东著作以外的经济政策思想。

第三，还应该包括毛泽东经济工作实践，例如在战争、政权建设、政治等项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经济观念、经济工作措施以及经济工作的实践。

确定研究的这些方面，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又不致流于宽泛，将一些不应该属于这一领域的东西包揽进来。我们认为只有不去旁及那些虽然是很重要但是属于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方面的理论，只是在经济学领域范围内，或实在无法与之分开的领域内涉足，才能真正把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工作搞好，才能真正研究好毛泽东经济思想。

无庸讳言，现在有些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大作，实际上是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和阐述，离开了毛泽东本人对这些经济问题的见解和观点，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有的囿于所见的材料，只是把《毛泽东选集》四卷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经济理论观点加以分门别类，进行重新排列和组合，然后再研究和阐述，就显得没有新思想和新见解，流于一般。

这两种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偏向，无疑应该加以纠正。

三、建国前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建国之前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它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毛泽东早期的动态的即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观点。其中有些经济观点显而易见有欠成熟，但为了比较全面地对毛泽东经济思想有所认识，这种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观点也应该是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列。

第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对中国国情的阐述和理解。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尤其是经济情况的细密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和路线奠定了基础。这已经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第三，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理论。其中包括：革命战争时期要重视经济建设的思想；“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的理论；提高人民生活，以此争取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理论；工农经济联合的理论；经济建设不能和革命战争的总任务分离的理论，等等。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坚持和强调的学说，对处于弱小地位和被“围剿”境遇下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政府，这种经济理论无疑是适时的。

第四，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的理论。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的基本思想萌芽。

第五，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其中包括经济决定财政，发展经济建设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发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的理论；农、工、商为序的理论；节约的原则；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原则，等等。

第六，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思想。其中包括新中国经济构成的理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理论；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建设中国经济需要吸收外资的理论等。

第七，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第八，经济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的理论。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提出了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思想，他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别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第九，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理论。其中包括发展合作事业的思想；没收官僚资本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理论；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理论，等等。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遵循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有关时代的经济之中的马克思思

主义真理，通过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正确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策略，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说，没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透彻了解，没有对中国国情的精当分析，要取得这个历史性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许多经济学理论，形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简析

建国后，毛泽东对于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出了艰辛的探索。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这些经济理论观点，指导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又为实践所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诸如：

保存富农经济的理论。早在1946年5月，党就提出在土改中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1947年10月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又将富农与地主予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其后不久，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著作中，均强调了“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一般地应有所区别”的原则，指出不要重复1931年至1934年期间的对待富农的过“左”的错误政策。1950年3月，毛泽东提出在新区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同年6月，对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作了修改和补充，其中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

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这里顺便说一句，“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刘少奇“保存富农经济”，实际上保存富农经济是党的政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这在毛泽东1950年6月4日致刘少奇的信中便有说明。

“一化三改造”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根本条件的观点，提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个体经济积极性和局限性的观点，农业必须合作化的观点，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实行和平改造的观点。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要重视工商界的观点。1956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叫新经济政策。还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淡季合规了，是因为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所有制改造完成后还需要存在私营经济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

点。在这个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观点，诸如，两条腿走路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既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又要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重视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观点。并提出了处理国民经济中五个重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要更多地重视农业、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三者要兼顾，还提出给工厂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独立性的设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题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的观点；提出了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的观点；总结和归纳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观点；不能剥夺农民的观点；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来教育干部和人民的观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农、轻、重为序的观点；全国一盘棋，各方面要统筹兼顾的思想；以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和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的观点；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一贯思想；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的观点，等等。这些合乎科学的或基本上合乎科学的经济理论观点，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中有些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有些则囿于历史的局限，不一定全部适合现时的已经发展了的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需要根据实际情形去参照运用。

不必讳言，毛泽东在1957年后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使他的经济思想如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不能贯彻始终。比如，对于所有制成分越纯越好的设想，对于在生产水平还并不甚高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的设想，对于“穷过渡”和急于求成、超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片面强调和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做法，等等，一些“左”的思想观点逐渐占据了他的头脑，这正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的一个方面。

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了毛泽东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后还是要说，毛泽东经济思想将彪炳千古。何况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未被开拓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努力耕耘和收获。

第2章

《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样，在毛泽东早期也有萌芽。研究毛泽东早期的经济思想，也离不开毛泽东的早期著作。

《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至1914年^①在上“修身”课与“国文”课时所记的课堂笔记，修身课的讲课人是杨昌济先生，国文课的讲课人是袁仲谦先生。那末如何看待《讲堂录》，如何看待《讲堂录》中的思想观点？如何看待《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

一、怎样看待《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

《讲堂录》应该说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文献资料。首先，《讲堂录》是毛泽东的手稿，全篇都是毛泽东抄录的；

^① 1913年至1914年是一种说法，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持此说。另有1914年说，如逢先知的“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1913年说，如王兴国的《讲堂录编辑记事》和《毛泽东早期文稿》。

其次，《讲堂录》的内容是杨、袁两先生在课堂上讲解后经毛泽东抄写整理的；再其次，由于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杂以议论”，所以不排除有些观点是毛泽东自己形成的；此外，毛泽东的《讲堂录》，除了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外，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关于这一点，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合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中，有所注明，该书将《讲堂录》作为此书的“副编”收入，原因如此。

那末如何看待这些讲堂录？这些“有的纯粹是老师讲后记下的”、“有的则杂以议论”、“有的还是读书札记”的课堂笔记，应该说是能从一个侧面，能在一定程度上，能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反映毛泽东当时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当时接受了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和倾向于什么观点的。正如有的著作所指出的：

“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①当然，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毛泽东当时思想观点的情况，需要加以分析以后来确定。我们去研究《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时，也考虑了这一点。

二、《讲堂录》中的经济观点简析

现将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载的部分经济观点略作分析研究，以见毛泽东早期经济思想之一侧面。毛泽东在《讲堂录》里的记载文字，多数原来没有标点，是本书作者所加的。

1.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乐道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者所提倡的立身处世的态度。孔子曾说：“**贤者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页。

其乐。”①称赞颜回虽然生活贫困，仍快乐地做学问，不失其志。毛泽东在这里记的惟安贫者能成事，就是说只有不计较生活待遇的菲薄，或不顾贫困的骚扰，安心做学业，将来才能成就事业。

2.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首先肯定，乐利者人所共也，物质利益原则对一般人都是适用的。圣人能做到安贫乐道，清茶淡饭而乐在其中，但并不是不喜欢躯壳之乐利，否则何以解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富贵浮云，也是古代儒家思想的说教，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②把不义而来的富贵，看作象浮云一般轻飘和流动不定，这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③，我们分析毛泽东当时接受了这种思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3. “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重也。日人重母金，篋无余帛，困无宿粮。”④这可能是西方资产阶级传播进来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富有者营屋、买地、置衣履，是天经地义的事，不会被看作是“耗财损息之事”。母金，即本金，意思是贷给别人以生息的原本金额或本钱。这里认为日本人会做生意，会使资本生息，宁愿箱子里不存布帛衣服，仓库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也要“重母金”以便更多地发财。

4. “孔子称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簞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簞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述而》。

③ 鲁迅：《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④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8页

面死，不亦难乎。”毛泽东在这里说，颜回不忧而乐是有其物质基础的，第一是有圣人孔子作依靠，第二总算还有一箪食、一瓢饮等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所以要做到不忧而乐是容易的。但我第一无依靠，第二没有箪食、瓢饮，没有人供给钱，为了生活，必须奔波，这样，专心致志做学问就必然更难了。

5. “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如兵农财赋，古今之制异矣，而兵之为谋略，农之为富民，财之为裕国，莫或更焉。”毛泽东记的这段话认为尽管各朝各代制度可以不一，但道理是不变的，例如对兵、农、财、赋，各时期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方面的目标却是不变更的。用兵需要计谋策略，重视农业为了使人民富裕，重视财政为了使国家富强，这些道理是不变的。

6. “‘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草草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乎谋食也。”

“‘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者而言。若直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

毛泽东所记的对这两句话的批注，区分了不同的人对这两句话的不同态度。毛泽东记载的这两段话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①和“志不在温饱”，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如果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谋食、谋温饱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连饭也吃不饱，连衣服也没有穿的，还谈什么“道”与“志”？这“谋道”，即研究一定的政治主张、思想体系等，是必须吃饱了饭才能干的。所以毛泽东认为，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志不在温饱”，分别是对孜孜营求私利的人和有志向的人说的。逐利之徒，不顾信义，谋求私利，这些人应该讲些“道”；有远大志向的人，对温饱的事也不要考虑太多，如果把精力都化在谋求温饱上，还能实现远大的志向吗？所以温饱是可以谋的，只不过看你是有没有

① 董仲舒则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志向的人了。

毛泽东记述的这个思想，有它一定的道理。他始终认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也说明他当时并不“象一些所谓的‘名士’，矫揉造作地鄙薄功利”^①，而是实事求是地、朴实地认为，一般的人还是首先要为吃饭穿衣操劳的。这段切实的议论，反映了毛泽东对“功利”的正确态度。

7.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对于财物与女色，毛泽东青年时代不感兴趣，拒绝谈论，他在新民学会中曾经对此做过规定。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过：新民学会“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经济方面的事，也自是不去谈论了。

毛泽东1936年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说过这样一件他不屑于谈论、甚至不愿意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小事的事。当时“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世界，宇宙！”^②认为谈论家庭经济生活中的琐事俗不可耐，以致于与谈论此类问题的人断绝往来，说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重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事方面，竭尽全力，而对家庭经济生活方面的普通事情，他认为是不屑于谈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3页。

② 吴亮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8—29页。

论的，这也许是他以后在经济思想上钻研不是特别深的一个原因吧。

8.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①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毛泽东所记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强调农业的重要。他认为，不从事农业的人，不知道农业劳动的艰难，一切理论、历史，离不开吃饭、穿衣。毛泽东一生，始终是重视农业的，始终认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天下第一要事。

从历史上说，以农为本，而以工商为末，在历代封建统治者中占主导地位。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论贵粟疏》深刻阐述了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工商皆本”的观点，虽然是合理的和正确的，但始终未占主流。以农为本，一切仰给于农，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小农经济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的产物，曾被许多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毛泽东重视农业生产经济观点与此不同，他在强调农业生产的同时，没有排斥工商业的言论。但在主次序位上，毛泽东总是强调农业是第一位的。1959年，毛泽东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就是这个思想的发展。

9.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

《讲堂录》上记载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全面的。说中国租赋轻，恐怕不确。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田赋应该说是并不轻的。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

① 豳，古邑名，在今陕西旬邑西。周旋后稷之曾孙公刘迁居于此。

食”的农村田园生活，使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长期不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替代，劳动力始终依附在农田上，而没有成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未占统治地位。不过，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包括种种苛捐、杂税、劳役，层层压榨、欺凌、侮辱，使中国人民受到无穷尽的苦难。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此时涉世未深，尚未进行他后来得以实现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对中国人民的疾苦还没有深切的体会，所以认为中国要比西方国家自由，认为中国的劳动人民要比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受剥削程度轻。这当然不是毛泽东正式形成的思想。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载的这些观点，当然主要是杨昌济和袁仲谦两先生的讲课内容。除了上述九条外，还有一些也包含若干经济观点，例如，《讲堂录》中还写：“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藪也。”还有一些如“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种稻必使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然能于地隙水滨种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后可得百金以外。”这些课堂记述部分，也反映了一定的经济思想观点。因为是零碎的，不再加以简析。

三、早期思想观点的反映

从毛泽东记载的《讲堂录》里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观点看，再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对《讲堂录》中记载的某些经济观点显然是接受的。比如：“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不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照此去做的，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不去提很高的要求，而刻苦攻读，下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便是在老年教育他的子女时，毛泽东也常引用这句话勉励子女，要他们与工农子弟在一起生活，吃得起苦。只有吃得起苦，才能成就事业。而不让他们养尊处优，养成纨绔作风，因为“纨绔从来少伟男”。

经过毛泽东选择而加以记载的、毛泽东“杂以议论”的《讲堂录》里的经济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早期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如果说，因为是课堂笔记而完全不反映不代表毛泽东的早期经济思想，如果说，研究毛泽东早期经济思想不需要研究毛泽东的《讲堂录》，那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颇的，是可以商榷的，也是不全面的。作者希望能更多地挖掘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有关经济思想的内容，使之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

第 3 章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1982年12月出版了。这个《文集》收集的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从1926年到1941年的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和农村调查报告。《文集》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基础上，增补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五篇著作。其中，《寻乌调查》和《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两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两篇中的第一篇，毛泽东同志曾在1950年作过文字修改；第二篇写就于1931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文章，为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范例。

《文集》出版，对于坚持和发扬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

优良传统，对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光辉思想，对于我们用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来正确了解我们的国情、民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主义。

一、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之始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的著名论断。他在书中一再指出：调查研究是领导机关制订政策、执行政策的基础，“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①在决定方针、政策之前，一定要对实际情况作认真的调查研究。

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从解决问题必须要作调查的意义上来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例如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对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省寻乌县作了他所曾做过的最大规模的调查，写出了八万余字的长篇《寻乌调查》，对寻乌城乡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周密详尽深入细致的调查，进一步解决了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如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问题，坚持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问题，非农业人口要不要分田的问题，反对富农独霸肥田的问题，分配地主房屋问题。所有这些，通过寻乌调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解决。

举例来说，1928、1929年两次颁布的《土地法》，在规定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中有“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③的提法。后来毛泽东同志通过寻乌的土地斗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8页。

争的调查，了解到寻乌分配土地有四种办法：一是照人口平分；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实践证明，“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①通过寻乌调查，找到了当时分配土地比较好的办法。在后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中，就正式确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办法。”

决定政策需要调查研究，科学的、正确的理论的创立，更需要以周密详尽的调查为基础。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这些详尽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他对党的许多农村斗争政策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贡献，他就不可能如此洞悉中国当时的国情，指引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新岸。

二、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在学生时代，就经常利用假期到乡村去作社会调查。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湖南农村许多县调查考察一个多月后写成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他经常在戎马倥偬中，抓住间隙时间作农村调查，积累了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调查材料。《文集》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

1948年8月1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他写的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5页。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基本精神，作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制订了实施调查研究的办法，成立了有关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

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以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党的肩上。毛泽东同志那时工作很紧张，怎么办呢？还是得搞调查研究。他让国务院有关工农业、商业、运输业、财政等34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逐个地汇报各个部门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自己说，当时他每天就是床上地下，边汇报，边议论，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经验。通过这次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后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了著名的、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十大关系》。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对农村情况还是了解得不够透彻，又一次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每个省委书记亲自下去调查几个公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为此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中央组织了三个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了调查。

我们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地调查视察，体察民情。例如，1961年刘少奇同志亲自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进行调查；周恩来同志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同志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进行调查；还有，同年夏天陈云同志深入到上海青浦等地进行调查。通过这些调查弄清了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更加重视。众所周知，造成我国目前农村发展大好形势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两个农

业重要文件，就是在一系列广泛、深入、细致、浩繁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为此，胡耀邦同志曾到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进行了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到全国许多省、市农村进行了认真调查；同时中央还委托一百多位农村工作者和经济界、理论界同志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这两个农业文件符合国情民情，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调查研究与反对主观主义

1961年，毛泽东同志曾经郑重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要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还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是，有不少同志，仍然对“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正确政策的基础”这一点认识不足，或是推托工作忙顾不过来，或是借口别的什么原因，轻视调查研究工作。有的人甚至认为调查研究是一种额外负担。这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或决定方针的时候，“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从历史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相象的事情出发。”^①这样，就难免不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

当前，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中，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许多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新事物、新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搞调查研究是绝对不行的。比如，怎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8页。

样看待目前农村中出现的专业户、重点户？如何处理由农民集资或集股组织的专业联合体？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向社会去讨教。例如，中共山西省壶关县委就对专业户、重点户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该县有的专业户、重点户承包集体缸厂后，通过烧制大缸取得较多的收入，个别人年收入可超过一万元。但是这些专业户、重点户既参加制缸过程中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负责全面的技术工作，收入多是合理合法的，完全是政策允许的。通过调查纠正了某些人说这些专业户、重点户是所谓“暴发户”的错误观点。而且，通过调查研究，他们还搞清了专业户的少量雇工并不构成剥削等几个问题，从而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提高了执行党的农业政策的水平和自觉性，加强了县委对专业户、重点户工作的领导，取得了主动权。相反，有的地方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不去作详尽的调查研究，而是指手划脚，横加指责，或者人云亦云，这样就不会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有中肯的认识，从而也就找不到处理这类问题的正确办法。

四、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方法

毛泽东还在长沙求学期间，就开始注意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假期里在湖南作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当时，毛泽东的许多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同学到法国去留学，他也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毛泽东自己却决意不去，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①毛泽东决心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②。

当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中国革命以后，更自觉地

①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

②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

注意了对中国情况的调查研究。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农村。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毛泽东作了广泛的农村调查，在井冈山时期和土地革命的其他时期，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通过农村调查写了20来万字的调查报告，从而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斗争策略，指导了革命工作走向胜利。在这段时期对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的调查考察中，毛泽东对农村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文化教育、政治积弊以至宗族关系、风土民情、山水地貌诸方面有了透彻的了解，因而他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极大的发言权。在后来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时，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如何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取得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作出了理论的概括。如果没有对于农村的那么多调查，要作出这样的理论贡献是不可想象的。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当然此时的调查研究的方式与30年代有了改变，但毛泽东由于密切了解实际，掌握发生着变化的革命运动的脉搏，所以对实际工作的指导符合其本来的发展规律。比方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前后，毛泽东对工商界各种意见的了解，除了在工商界上层召开座谈会以外，主要是在通过写信、阅看材料这种调查研究方式的基础上获得的，由于与工商界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这种了解就比较全面。光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的毛泽东给工商界领导人黄炎培的信，就有17封之多，占此书所有受信人的首位，何况还有许多没有收进此书的给黄炎培的信。足见毛泽东通过通信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去了解工商界的情况和他们的反映、要求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在全面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也进行了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对国民经济34个部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正是因为后来脱离了调查研究的传统，使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迭受挫折，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毛泽东后来在总结教训时曾经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①这既是向全党发出对调查研究的号召，又是对几年来由于没有调查研究而使国家建设受挫折所作的自我批评。

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就是为了解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新的实际问题。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首先是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有先入之见，而应该在客观事实面前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假象所蒙蔽和迷惑，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看到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调查中，应该眼睛向下，虚心向被调查的群众学习。毛泽东在江西农村作调查的时候，被调查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商人，有知识分子，有兵士，有流氓，各式人等，只要了解被调查的问题和情况的，均可向其作调查。不虚心下问，不老实求教，不可能调查出有用的情况来。

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是比较好的，因为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

^①毛泽东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易犯错误的。此外，找有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收集多种有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利用多种会议收集材料，同参加会议的人展开讨论，写人物列传，个别调查，等等，这些都不失为调查研究的方法。但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都最好亲自出马，亲自动手，要如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①毛泽东还要求在调查研究中，要事先确定调查纲目，调查要深入，要调查者自己做记录，不能假手于人。在调查中，“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②

五、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 调查研究

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为纠正50年代末由“大跃进”引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60年代初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以通过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来解决农村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1960年底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都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会后亲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

自组织和领导了三个调查组，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任组长，到广东、湖南、浙江三个省农村调查，并规定由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 10 天至 15 天，然后三个组与毛泽东在广东会合，转入广州市调查工业情况。

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1961年3月中旬，毛泽东又在广州召集了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好处。毛泽东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的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需要“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①毛泽东还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1930年5日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当时名《调查工作》）一文。顺便指出：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1961年1月从革命博物馆找到的，是从福建龙岩地委处找来的，而这篇曾经被失落的名著的保存人是福建上杭的群众赖茂基。在毛泽东主持的这次广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着重指出：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

① 毛泽东1961年3月给中央同志的一封信。

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①

广州会议以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彭真等，分别率领和领导调查组在湖南、河北、四川、河南、陕西和北京郊区作调查。毛泽东对各地汇报调查研究的情况和各种调查报告，加了不少按语，其中一份按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吓唬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恢复了我们党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我们党在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工作中发生重大挫折以后，能重新实事求是地认识已经发生了的情况，纠正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才认识到的“左”倾错误，否定一些为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既定决策，例如关于解散人民并不欢迎的公共食堂，废除取消自留地的规定，变大队所有制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等，这样，就通过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重新认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的原理，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和措施，从而稳定了经过三年经济困难的大局，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①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1961年3月。

第 4 章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极其重要问题。我们党的 70 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农民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胜利后能否巩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和农民结成可靠的同盟军，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则应该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特别重视对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进行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一、农村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农民、 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关键

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马克思最早的调查研究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进而对工业，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的伟大真理。列宁非常重视俄国社会考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实践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尤其是毛泽东，始终重视社会调查研究，从而科学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从而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出身在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农村，因而对于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还在他少年求学的时期，他就身体力行，利用寒暑假，步行几个县，对农村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还发现，在古代圣哲写的书上，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多少写农民的，他感到很奇怪，他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在他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他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要搞中国革命，必须了解中国社会。而要认识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况，首先就要熟悉中国的农村。他说：“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①毛泽东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作了农村调查。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毛泽东在江西、湖南两省的许多县、区、乡、村进行了调查，并整理成调查报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长达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此外还有《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和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的调查及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等等。除了农村的调查报告和材料外，毛泽东还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农村调查的理论，总结出了对待农村调查的科学态度、方法和通过农村调查形成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思想。例如，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和“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始终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他通过调查研究而形成和得出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一些理论，至今还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在农民问题中，毛泽东首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革命首要问题。制定出中国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总任务，就是要解决千百年来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

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为制定土地分配中的具体政策，进行了江西宁冈和永新两县的调查，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了土地革命中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这个土地法，既是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宁冈、永新调查的结晶。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土地法存在着一些缺点。

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中，分配土地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第二种是以劳动力为

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①。1929年4月在兴国县制定的《土地法》在分配土地的办法上仍然沿用了这两种。虽然两个土地法都标明应以第一个标准为主体，但都说明在特殊情况下，应施行第二种标准。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内，也有以“劳动力”作为分田标准的，例如江西的儒廷地区的有些地方，以劳动力、牛力、农具、资金等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总之，分田的办法很多，见仁见智，做法不一，但到底哪一种分配土地的办法最好？毛泽东进一步通过农村调查，解决了这个难题。

1930年5月，毛泽东做了寻乌调查后认为，以人口平分土地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他从调查中得出了这个结论。

1930年11月18日，在江西峡江召开了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阐明了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历史必要性：“平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可是在目前确有他伟大的革命作用，粉碎封建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从前，俄国孟什维克批评列宁主张平分土地，是违反社会主义，列宁的答复‘平分土地是具有历史的革命作用，孟什维克派所不了解的。’六次大会指出平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但决不是否认平分，反对平分。六次大会明明写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分的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说要做平分的工作，同时还要做批评的工作。”^②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后来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乃至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按照农村人口在一定范围内（乡、村）平均

^①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页。

^②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283页。

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专门为平分问题加了按语：“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动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

（《农村调查》井冈山《土地法》的按语）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他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分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个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①

在土地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富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者，不是从调查中国农村实际出发，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这些基本特点，因而推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他们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经济上采取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的政策，他们给富农分坏地，对于地主，则从肉体上消灭（不分地）。这样，就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富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富农政策怎样才是正确的？这些，都要通过调查，依照农村中存在的事实，来取得制定政策的依据。“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②深知此事须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3页。

②《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页。

躬亲，毛泽东不是教条地搬用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经验，而是通过对农村的实际调查取得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深切了解，从而逐步作出了我们党对待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1930年5月，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①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发现当时斗争的一个中心，就是贫农与富农在土地肥瘦分配问题上的争执。因此，在继“抽多补少”之后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的正确原则。但是限于历史的条件，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提出计算富农的剥削量问题，因而没有将富农同某些小地主和富裕中农严格区分开来。在1930年6月召开的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制定了“抽肥补瘦”限制富农的政策。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文中，提出了“富农标准要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帐或借帐的人还是列在中农。”但也仍没有确定具体的剥削量来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准。到1933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中，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②后来中央又决定以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准。这些，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②《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343页。

查，而得到逐步解决的。

通过农村调查，毛泽东提出并解决了土地斗争中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中国革命开创了胜利的坦途。例如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非农业人口要不要分土地的政策，对待富农、地主的政策、分青问题等等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都是妥善处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动员广大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重大措施，是解决土地革命斗争重大问题的关键。

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重大发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同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继续强调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特别强调要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到农村中去作农民实际生活情况的调查。尤其是在革命和建设上党的工作重点转变的关键时刻，更需要作深入的农村调查。

60年代初期，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毛泽东着重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对于农村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一些省的农村进行调查。

通过大量的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经过修改，采取了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取消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取消带有很大弊病的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等等。毛泽东经过对农村的调查研究，还在1961年9月29日提出了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党中央号召全国农村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62年2月23日正式发

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①通过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这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走出锅底趋向好转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光辉理论及其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历来认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他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尝试的巴黎公社革命过程中没有及时取得农民的支持因而而不可避免地失败的时候说：“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3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③革命的敌人也知道农民一旦起来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他们的末日就将要更快地来到。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农民的情况，并指出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农民到

①《农村政策文件选编》（二）（第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③《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页。

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列宁和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列宁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天然的同盟军”^②还指出：劳动农民“完全不愧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③

毛泽东则认为，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度里，农民问题更有它的特殊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的情况如何，是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过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过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④他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农民问题的迫切性和极端重要意义。

毛泽东还深刻地分析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他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5页。

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3页。

③《列宁全集》第4卷第90页。

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52—653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极其鲜明地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①

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说：“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队伍的主力军。”还说：“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②

革命的胜利主要靠工农联盟。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26页—10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6页。

阶级的联盟。”^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一再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②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毛泽东对于农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来之于他对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并以极大精力投入农民运动的杰出代表。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就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自己说过：“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③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④

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践，还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时便开始了。那时，他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此外，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⑤毛泽东根据在湖南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83页。

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6页。

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44页。

④《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136页。

⑤《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讲话》第45页。

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和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和否定农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两个小册子。这样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

1926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部的工作，不久，又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湘乡、衡山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并向党中央写了考察报告。在这个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科学地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痛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并且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全力支持中国农民运动的迅速兴起。这个报告虽然遭到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否决，但作为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则是光辉的一页。执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陈独秀，反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低估农民在当时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因此，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采纳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的主张。然而，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科学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农民运动，没有忘记农民的力量。1927年9月，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起来的。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这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就是主要由湖南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和汉冶萍矿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的。毛泽东在后来还一直称

当时这支部队为“农民武装”，“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

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是极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历来有着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但是，这个革命必须有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使之取得胜利。他指出，中国的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使他们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然而农民的“小生产者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②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已经成为领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力量。与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民比起来，工业无产阶级具有与大生产和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特点，他们目光远大，具有解放全人类的气魄和力量。

毛泽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作了基本的分析，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所共有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因而具有组织性纪律性，也没有私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6页。

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67页。

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具有与别国无产阶级不同的突出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各民族中所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第二，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除了中国无产阶级这些特点能表明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外，还在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并没有一个单独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来引导农民解放他们自己。毛泽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完全割断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可能来代表农民的利益，向封建势力开展斗争，它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纲领。

“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①

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是我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机器，并运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但是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24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则是从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政权再将革命推向全国的典范。这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根据苏联的国情确定的革命道路。另外，在其他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经验也大都是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如十月革命前的巴黎公社革命等。毛泽东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革命毅力，创造性地、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即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把党的工作重心、立足点放在反动力量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中，首先发动广大受苦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组织农民的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然后，进而发动向城市的进攻，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胜利道路，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国情实际，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有着许多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到了应该起义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应该是“首先领导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①中国则不同，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应该区别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所曾走过的道路，“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即先取农村而走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7页。

②同上。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这一理论的提出，是经过了反复的斗争和艰苦卓绝的实践的。

首先，中国革命最初走的道路，也是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的目标主要是攻打和占据城市。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方面，曾先后建立了以广州、武汉两大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后来国民党走向反动，以及在城市的反动统治力量的过于强大，革命未能取得成功。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怎样继续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是继续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还是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是需要根据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中国当时的国情实际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个战略决策，是由毛泽东同志率先作出的。

毛泽东自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认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光辉的胜利道路的，他也是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认识的。1927年9月，他和湖南省委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时候，最初也曾经计划夺取湖南的省城长沙。在进攻长沙周围的城镇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毛泽东认识到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攻打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革命又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使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摧毁当地的反动统治政权，建设起新的工农革命政权，从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开拓了土地革命的先河。他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曾经说过：“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

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①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于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过充分的成熟的考虑，他熟悉中国农民的情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这个天地里将是大有可为的。因而在秋收起义的队伍向长沙进军途中受到挫折以后，他能够及时地、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领这支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就是因为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准备了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反革命统治力量较为强大的城市转移到反革命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和农村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小生产者农民。经过土地制度的初步改革（如减租减息）和土地制度的彻底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广大农民动员和武装起来，巩固工农联盟，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以工农武装割据为特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发展和到来，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中有一个中心的内容，或者基本思想，就是首先要在农村中站稳脚跟。而要在农村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必须把农民的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又离不开农民的武装斗争。因此，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武装斗争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是紧密不可分割的，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光辉思想论断。

其次，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在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斗争的实践中实现的。党的早期领导者陈独秀看不到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他反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反对毛泽东在农村大力开展农民运动。

^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陈独秀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他对于毛泽东关于加强农民运动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毛泽东的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没有进行讨论。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慨。1936年，他还说：“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①”毛泽东分析说，陈独秀完全不了解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完全不了解中国农民的力量，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党的五大给地主下的定义上，五大的文件说，必须“占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这种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论断，当然不可能正确的指导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很好地在当时形势下开展农民运动。实际上，陈独秀对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确是激烈反对，横加指责，他“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最后终于投入了资产阶级的怀抱。

另外，毛泽东还同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坚定了他提出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正确的航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党不是根据革命力量相对削弱、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情况，制定隐蔽力量、积聚革命势力，发动群众的政策。相反，仍然认为应该发动城市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从大革命失败后到1929年，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和组织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失败。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当时认为党的责任还是发动城市工人的暴动，任务应该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的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6页。

导。”并且认定“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因而，仍然强调城市领导农村的重要性，以为当时城市工人的斗争是决定革命胜负的力量，因此仍然将工作着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

毛泽东则从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到农村中去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在反动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农村去积聚革命的力量。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不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秋收起义前夕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为秋收起义指出了道路：“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①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一些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由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其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逐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不久形成了。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而摸索出来的，是指导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的锐利的武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如何改造小农经济，引导广大农民走上消灭压迫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一个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145页。

极为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1. 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经济，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都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是一种旧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因此，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必然要趋向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允许答应保存小农经济。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挽救和保全小农的房屋和财产，唯一的办法是变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变小生产为大生产。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小农改造的原理，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我国土地改革后不久，就明确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①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②

我国经过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新解放区的土改，全国大约有3.1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关系。广大农民每年免交给地主大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部分劳动果实可以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

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于是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发扬，再加上党和政府各种奖励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改革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但是，个体经济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它的积极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它又成了障碍，所以，列宁指出：“分土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这表明土地离开地主，归农民所有，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①

小农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种个体农业生产是很低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大量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不能满足工业的销售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同时，这种个体经济的分散性、盲目性，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也是矛盾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小农经济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再加上小农经济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展开的情况下，它“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②土改后的农村，也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开始买土地雇工剥削起来；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又开始出卖刚刚得到的胜利果实土地，也出现了借债、雇工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工农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产生很大的困难。毛泽东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

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7页。

②《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①

由此可见，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我们党在总结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经验时也正确地指出：“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当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②

2. 中国特色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借鉴了一些外国的经验，但主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经验，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1）必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第一，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特别落后，尤其是农业经济。土地改革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800页。

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一次大解放。但由于小农经济是一种小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二，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业中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能设想，工业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农业不走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资本主义农业是建立在剥夺小农的基础上，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是一条使广大农民贫困化的道路。深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刚刚从这痛苦深渊中解放出来，是绝对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同时广大农民从现实生活中体会到，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正是从这实际出发，我们党才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也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个体经济规模小，经营分散，力量单薄，购买和使用大机器有一定困难和局限性；只有改变这种个体生产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为农业使用大机器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所以，毛泽东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

为什么在没有大量机器装备的条件下，可以先合作化？因为合作化的集体经济较个体小农经济，即使在没有大机器装备的条件下，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协作”、“分工”创造新的生产力。事实已经证明，农业合作社建立以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可以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据1955年在各类农作物主要产区的调查，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地超过了一般个体农民；稻谷多产百分之十，小麦多产百分之七，大豆多产百分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之十九,棉花多产百分之二十六。^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给我们制定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我们党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根据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防止“左”和右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采取了逐步前进的过渡形式。具体地讲,第一步,在农村中,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临时互助组。它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只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一些劳动协作和共同使用某些生产资料。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过渡形式,第一,“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的到来的。”第二,这些步骤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第三,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3) 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符合全体劳动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但是,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统计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决不可以采取强制或剥夺的办法，只能是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剥夺剥削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说：“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①列宁也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②“想用某种快速的方法，下个命令从外部、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方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的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可能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③才行。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指出：“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④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又反复指出，一定要遵循“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①

在自愿和互利原则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互利是基础，只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311页。

②《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5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10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页。

互利，才能实行真正的自愿。例如，农民生产资料入社，除土地以外，是采取折价归社的办法，这既防止了占有生产资料多的富裕中农侵占占有生产资料少的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也防止了贫农和中下农侵占富裕中农的利益。双方都有利而自愿的组织起来，走上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

（4）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经济，并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我们党实行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前，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实行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其它一些政治措施，限制富农的雇工剥削、商业投机和高利贷活动。农业合作化活动高潮到来之后，中农已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富农更加孤立了。便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转到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毛泽东指出：

“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合作化了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②具体作法是：①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并允许他们改变成分，称为农民。②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做为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分。③表现坏的，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管制生产；有破坏行为的，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④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②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都不允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职务。⑤合作社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在社内的劳动，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⑥地主富农的子女，如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还是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儿童和在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或者在土地改革以前，他就参加劳动，并且在家庭中居于被支配地位，这种人不当当地主富农分子看待，而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称为农民。并且根据他们的条件，分配适当的工作。①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同于苏联在全盟集体化过程中消灭富农的作法。苏联对富农是实行剥夺的办法。采取没收、驱逐、甚至肉体消灭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作法既破坏生产力，又不利于对富农的分化和改造。我们的做法，则比较有利于分化和改造富农分子，这样做，可以减少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的反抗和破坏，同时有利于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我国农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不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而且正确地实现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

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165页。

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农业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和其他运动一样，在前进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首先，改造速度要求过急。原来党中央和毛泽东计划安排，从1953年起，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可从1955年夏季以后，整个部署加快了。事实上，只用了3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场伟大的变革。第二，由于要求过急，工作粗糙，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第三，运动中，未能始终一贯地严格按照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办事，不少地方采用行政强制和行政手段多，示范和吸引的办法少；未能始终一贯地执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搞了“一刀切”、“一锅煮”的错误作法，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缺点和偏差，在尔后的实践中，逐步得到了克服，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和肃清了“左”的错误流毒，制定了发展农业问题的两个决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农村低水平的集体化逐步发展到高水平的合作化，使农村合作化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从而使我国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而且继续发展了这一伟大理论。

首先，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们还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

高。列宁曾经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能产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①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还是不可能高速发展，尤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为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确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国农村中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但是这只占人口中的极少数。忽视或夸大阶级斗争都是错误的，对于极少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坚决打击，但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扩大阶级斗争，破坏团结，伤害好人。长期的斗争实践证明，我国广大的农民尤其集体化以后的农民，他们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很好地依靠和发挥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极少数存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农民，必须采取耐心的说服教育，帮助他们自觉地加以克服。当然，这里首先要分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决不允许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和取缔；也不允许把资本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支持和扶植。

第二，一定要维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用集体经济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其他物资；对于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尾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4页、425页。

巴去加以批评和取缔，相反，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以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国家在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且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降低支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逐步实行工农产品等价交换，等等。

第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广大农民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否则，是无法调动 8 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实践证明，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其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解决农民的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建立之后，如何不断完善和充实生产关系，尤其是解决集体经济如何经营管理问题。这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那里，都未曾给我们留下具体的指示，我们过去由于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失误，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致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民为纠正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病，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政府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并使之在各地不断推广和逐步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在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把劳动组织形式和相应的计酬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按最终劳动成果计算劳动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它使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农民真正成了集体经济的主人；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直接结合，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多产多得的原则。这种生产责任制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推

广科学种田和促进商品生产；有利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有利于解决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因此，它一经产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是我们党在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新发展。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就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所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意义不亚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标志着我国广大农村已经开始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道路。

第5章

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重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经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选集》第2版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七十周年之际出版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建国前的著作，重新学习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无论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及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是对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经验，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是具有伟大意义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称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报告的全题是《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建国初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由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第2节（原题为《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摆在我们面前了》）、第3节（原题为《经济建设中的领导方式问题》）加以整理，在文字上略作修改，改题为《必须注意

经济工作》，然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最近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2版时，《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题解由编辑者作了修改，这个原因是本文后面要解释清楚的。

一、《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的首篇经济学论著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十分关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作过许多农村调查。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都是在1930年前后作出的。在这些农村调查报告中，有许多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描述。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关于调查研究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的：“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①因此这些农村调查报告，虽然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但更多地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阐述，不能算作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在1933年8月以前，有大量著作，其中能够体现或反映毛泽东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观点、经济设想的有关文章著作，经笔者详尽统计，约有140篇之多。但是，毛泽东的这140篇著述，有的只是表述作者的某个经济观点，有的只是旁及一些经济问题，有的则是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签署的一些有关经济法令，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3—114页。

国经济政策》等，①因而也不能算是完全的经济学著述。

有的文章，毛泽东自己提到里面有经济观点，但搞错了，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这里毛泽东指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城乡关系问题，这段话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已经作了较大的改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作者又作了订正。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主要不是论述经济问题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它是经济学著作。

因此，真正集中地阐述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的，堪称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的，在1933年前的毛泽东所有文稿中，当首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似是没有疑义的，应当说是比较确切的。

二、《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切实地研究了

许多经济理论问题，内容非常丰富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论列了多方面的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泛，内容充实，着重阐述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强调了经济建设是全部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在当时则必须服从革命战争的道理。具体地说，这篇著作阐述清楚了如下八个问题：

第一，开展经济建设工作的目的。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

②参见拙作：《毛泽东财政思想论析》载《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说，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第二，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三点：一、取消经济建设，就是不服从革命战争，就是削弱革命战争。二，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三，还有不少革命工作人员不明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门组织还不健全，这样就会使革命战争缺乏胜利的保证。

第三，对不重视经济建设的思想与行为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对在思想上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认真重视经济建设问题以及有些地方经济组织不全或只让一些能力差的干部充任经济干部等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批评，此外，对不号召不发动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和认为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也以事实为证，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第四，阐明了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思想，同时明确指出，在现阶段，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不能离开当前的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因为这是不现实的。

第五，阐述了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所能完成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不去提出那些暂时还做不到的浩大

的经济建设任务，我们只提出我们在战争环境中能够做到并有些在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事。

第六，“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提出需要纠正离开革命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应当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去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同时他又强调经济建设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以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

第七，提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强调为迅速开展经济建设上的运动，要注意以下四点：（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经济建设工作与别的工作一样来不得官僚主义，（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

第八，提出了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等经济建设工作的具体任务。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这些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是正确的，而且在现时也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是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的。

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毛泽东 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经济学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它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作《我们的经济政策》一起，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中心，财政收入和

财政支出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工作的许多理论认识；明确了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的目的、意义、方法、措施。所有这些，对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连年“围剿”与封锁，根据地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工农业生产凋零，维持反“围剿”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条件也很薄弱。这样就不能不给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威胁。为此，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认为目前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是服从于我们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的。

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和号召下，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主要抓了开展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调剂粮食的工作，发展对外贸易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开展地方工业建设等工作，从而使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反“围剿”战争的物质保障起到了作用。尤其是毛泽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从当时经济建设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正确关系上，反对了一切忽视经济建设的观点，使毛泽东所批评的“象闽赣省那样，对于经济建设的任务，从来没有注意”的现象，逐步得到减少，使只关心战事不重视经济的党内严重的当时称为官僚主义的现象，逐步得到克服。

因此，《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对于挽救当时的革命形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明确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正确关系，指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此文作为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构成和发展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毛泽东选集》第2版纠正了第1版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在编辑工作 中的三处不很准确的地方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1卷，刊载《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时，在编辑工作中有三处不是很准确的地方，或者说有三处失误，这次《毛泽东选集》出版第2版时，改正了原来失误的地方，这是应该的，也是有根据的。

第一处：《毛泽东选集》第1版，将毛泽东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个报告的时间定为1933年8月20日，这是不对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是8月12日召开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就是在大会开幕的12日当天作的，这有当时的报道为证。

据当时的《红色中华》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1933年7月11日召开第45次会议，指出：“为了最广泛的动员群众，决定在8月内中央苏区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到会人：省、县、区三级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三级政府的副主席；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在博生县开，到会人与南部同。”①

1933年7月20日，临时中央发布通告，明确说明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到会县份、报到日期等，其中召开时间分别为8月12日、8月20日。

此外，《红色中华》、《红旗周报》均报道了南部会议的具

①《红色中华》第95期第1版，1933年7月23日，刊头上误署为7月17日。

体日程：12日，会议正式开始，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致开幕词，毛泽东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15日大会胜利结束。①

由此可以肯定，中央苏区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在1933年8月12至15日召开，毛泽东的报告作于8月12日，而不是8月20日。那么为什么会将8月12日错定为8月20日？原因可能是将这次会议与北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大会日期搞混在一起了。中央苏区北部的经济建设大会8月20日开幕，8月23日闭幕，与南部大会一样，也开了四天，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到北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大会上发表讲话。

第二处：在《毛泽东选集》第1版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首页有个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

“江西南部17县”的说法是不对的。第2版已作了改正。参加这次经济建设大会的不是江西南部17县，而是江西南部的瑞金、石城、博生、兴国、赣县、胜利、于都、会昌、寻乌、安远、信丰等11县，以及福建省的宁化、汀东、长汀、武平、上杭、新泉等6县，共17县。应该说是中央苏区南部17县。第2版改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是正确的。

发生这个差错的一个原因，我想大概是建国初期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为避开“苏维埃”、“苏区”这样的字眼而发生的，在《毛泽东选集》第1版收入的四卷全部文章中，凡原文有“苏维埃”、“苏区”字样的，在正式出版时都被删去或更动了。第2版将“苏区”改为革命根据地，就避免了发生上述差错的可能性。

第三处：第1版的上述题解还容易使人发生这样的误解，以

①《红色中华》第103期第2版，1933年8月19日。

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1933年8月12日演说的全文。其实，如象本文前面所已经指出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只是毛泽东1933年8月12日所作演说的一部分。所以，第2版这篇文章的题解就改为：“这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至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至于第1版的题解上称这个会议为“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也是值得推敲的。1933年8月12日与8月20日召开的南部与北部这两个大会，究竟叫“经济建设大会”，还是叫“经济建设工作会议”的问题，据笔者所看到的文献和史料，均称这两次会议为“经济建设大会”或“国民经济建设大会”，唯独《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第1版关于此文的题解，称这次会议为“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我认为，按这两次会议的内容、性质和精神来看称做经济建设大会也很恰当，并无不妥。既然当时原称经济建设大会，还是以尊重当时的名称以不改为好。第2版的题解维持了原来会议的名称。

五、重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曾强调指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后的事。建国初期，我们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这就需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看作是中心任务。因此，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及其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有所偏离，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轮回，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其后又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认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反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这使毛泽东59年前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得到了完全的实践，这是毛泽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在和平建设中，让经济建设成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贯彻始终地搞现代化建设，同心同德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天也不耽误经济建设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辜负毛泽东的希望，才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无愧于世界，为全人类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第 6 章

物质利益原则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是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的两段文字。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书面报告，长达十余万字，当时曾印成小册子发给与会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为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从事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篇中章中的两段文字，深刻地阐述了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批评了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错误观点。

一、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 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他认为，共

产竟人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所谓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然后才能“向人民要东西”。毛泽东说，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提倡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从来重视对群众利益的关心。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列宁在1921年谈到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时就已经指出：“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②明确地指出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是搞好经济建设的基础，这是列宁在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定历史时期转向新经济政策这个建设时期所作出的英明决策。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苏联当时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并且借重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

毛泽东把是否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提到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的高度，要求每个同志都去好好研究与实行。他把是否懂得这个问题，是否实行这个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提到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高度，而不是一个小是小非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把帮助群众去解决生产问题与向群众要公粮、公草结合起来，在当时那样的战争条件下，必须领导人民、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去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生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

来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只有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才能支持战争直至胜利。1933年11月，他《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①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会上的结论中，进一步指出，只有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才能围绕在我们周围，拥护我们，才能使我们达到革命胜利的最后目的。1942年5月，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②

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也是革命者的崇高宗旨。毛泽东在接见周世钊时曾说过：“人生在世，肯定是希望要过得幸福些。”既然人人希望过幸福富裕的生活，那末，只有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和政府，才是人民需要和拥护的。只有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为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地丰富起来。斯大林也曾经指出过：“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共产党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08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2页。

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包括为人民谋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①

二、鄙薄经济工作是儒家说教的影响， 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

这篇文章所节选的第二段文字，是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经济工作是其他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只有在经济上保障了供给，革命战争才能顺利打下去。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教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士大夫耻于言利，自以为不应该知道钱谷之事。宋太宗想管经济，丞相吕端对他说，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这种腐朽思想使得有些人不屑于谈经济工作，不屑于参加经济建设，好象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由于轻视经济工作的习惯，当时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还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

针对这种鄙薄经济工作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经济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中心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而要改变轻视经济工作的情况，首先是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抓好调查研究，制订计划，检查经济成效等等。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7页。

对于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1933年8月在江西等地17县经济工作会议上早就提出来过，当时他就认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但是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不够巩固，经济工作收效不大。在陕甘宁边区时，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更成熟，要求更迫切，以经济建设支持革命战争的需要也更强烈，实际效果也更好。边区的经济工作，不但支持了长期抗战，也为建国后领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强调经济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思想，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41年8月，他在致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的信中，提出了这个思想。他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①为了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重视经济工作，毛泽东反复叙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叙述了经济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指出我们需要一批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家和其他工作者，但更多的人需要从事各项经济工作。“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他指出，就当时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称得上是中心工作或第一位工作的，只有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而教育工作也必须围绕经济工作去进行，离开经济工作而去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边区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1944年，毛泽东在一篇号召发展经济、发展工业以打倒日本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侵略者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没有发达的经济，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大多数的敌军与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我们还不太懂，尤其在工业方面。可是经济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不关心经济工作或别的有益的工作的空头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

三、公私兼顾，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毛泽东关于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提出过。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曾提出，必须注意群众的物质福利。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一方面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农民，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又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使农民在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的年头，收入大多数有所增加。毛泽东批评了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提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他要求在农业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生产队提留多少，农民分配多少，都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页。

要有个适当的规定，必须使群众年年见到有所增加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是注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1959年底，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也曾对物质利益原则说过一些正确的话，如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并说过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等等。当然，这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出现自相矛盾和“左”的失误，他后来曾片面地批评经济工作的物质利益原则，从而违背了他原来坚持的正确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肯定和坚持了物质利益原则，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指出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离开这一条原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利用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成果的关心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依社会生产的总成果及劳动者投入的劳动来决定他所应得的物质福利，这也就是要进一步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我们现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要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这个中心。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相一致的。总之，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给人民以物质福利，在当前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7章

毛泽东论人民 群众长远利益

关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简单而复杂。说其简单，是因为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不难理解离开物质利益原则意味着什么。说其复杂，则是因为我们党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始终明确的，而是有反复的，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思想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对于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中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就更有其复杂性了。毛泽东在对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问题上，有一系列明确精辟的论列，研究毛泽东关于论述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思想，不但对于研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有益的，对于现在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和对当前改革中产生的某些短期行为的纠正，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一、要考虑人民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

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让他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基

础上，更好地支持革命，参加革命，这是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来过的理论观点。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演说中，就曾指出：

“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必须切实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革命工作”。在同年11月18日写的《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又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因此，让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与帮助群众争取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两者之间是一致的。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着重指出了要注意关心群众的当前物质利益问题，认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的生活，包括土地、劳动，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婚姻问题，都不能看轻和疏忽，而要真正地引起重视和注意。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要注意群众物质利益的思想更趋成熟，论点更为明确。他认为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那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有能力、有可能去自觉地支持党，支持革命，支持抗日战争。

对于不考虑甚或反对注意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的人，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认为他们是伪善者，是虚伪的一群。1942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是以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

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的。这篇讲话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对于这样的伪善者，我们只有去揭露。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经济学著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是否实行这个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这样的认识，是毛泽东从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而得出的。194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也说，“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2）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总之，将人民群众的当前物质利益放在必要的位置，关心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执政党的一项根本政策，是一项根本任务。任何离开这一根本任务而设置的理论，都只能是一种借口，是一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搪词，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二、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 而忘记了人民群众的远大利益

《共产党宣言》曾经写道：“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如何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作过十分精辟和透彻的论述。他指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或者只强调长远利益，而不顾群众生活，都是片面的观点。1947年6月，解放战争正处在紧张的时刻，军费开支增加较多，有些地方单纯考虑军事行动，对人民生活考虑甚少，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对邯郸等地不顾人民负担造成极坏影响的事例发出了通报。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在中央拍发各地、各野战军的电报上，就减轻人民负担问题，要求对照这些地区的事例检查本地区的工作等方面，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必须严格纠正这类问题，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

对于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处置失当将导致我们政策的失败，影响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综观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不能要求过高的物质待遇，不轻易提增加工资的口号。

194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过《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指出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原则应该是：照顾工人利益的同时照顾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利益，工人待遇的改

善，工资的增加，工时的规定，均应以适合战时需要、发展生产为原则，防止“左”的倾向的出现，争取各阶级共同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政策得到继续正确实行。1946年3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各中央局及分局，要求各地汇报工业及工运状况。其中提到以下几点：（1）是否有因劳动条件提得太高，致有生产低落、资本家畏避之事发生？如有此种现象，你们采取了何种对策？（2）经过斗争，工人有了组织，又适当地满足了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过火，没有伤害资本家的企业兴趣，只是提高了工人劳动热忱，因而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对劳资双方均为有利。此种事例，在你区多不多？是否成了一般倾向？（3）工会及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和厂方合作（不论公私合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就是说，实行了解放区工业及工运的正确方针；或者不是这样，而是工会及支部与厂方对立，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不管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即是说，承袭内战时期的白区工运方针？这两种方针，在你们区域内，党与工会干部了解情况如何？从这三点提问中，可以明确看出毛泽东所要求的和所反对的是什么。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在谈及劳资关系时，批评了“左”的以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代价的错误政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象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明确地说明了劳动者的片面的近视的福利，会实际上损害劳动者的长远的正当的利益，因此是不能允许的。

根据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讨论结果，毛泽东在1948年1月18日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劳资两利、公私两利、工人必须避免过高的物质待遇的问题。

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劳资两利问题、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远大利益问题作了明确阐述，提出“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要求在工资问题上注意纠正两种偏向，一是盲目无限制地过分提高工资；二是无原则地过分压低工资。并要求反对抹杀工程师、技术人员与普通工人的差别的平均主义偏向。

第二，在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时，要使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思想。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主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曾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长远利益问题作过精彩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

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

第三、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能只顾一头。必须三者兼顾，必须顾全大局的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作了专节论述，作为五大经济关系之一，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三者利益关系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要保证国家和集体的积累，当然都不能过多，因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第四，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长期感到不太好处理的问题。一般地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国家，要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建设成为先进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不把可能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积累起来，合理地使用到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去，那么就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因此，必须从我国人民的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出发，适当地增加积累的增长速度，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再生产不断地扩大，人民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所藉以提高的整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强。

三、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 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

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要关心和考虑人民群众的当前物质利

益，指出“正其道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是错误的与伪善的，另一方面则指出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人民群众的远大利益。而在谈到改善人民群众的当前物质福利的时候，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提出了处理生活与生产的关系的原则，这种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

1. 毛泽东提出了在解放区处理好生活与生产的关系的原则，强调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工人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中求得。1946年3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起草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①时，增写了一段话作为这个《通知》的第七项，这段话说：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毛泽东关于工人群众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中求得，要兼顾工厂企业主利益的思想，在解放战争中是一贯的。1946年4月19日，他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在指示占领长春后的东北工作部署中又说：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194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朱德1947年12月10日的来信上作了关于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批示。说：“不是公私兼顾，不是劳资两利，而是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就是极大的失败。决不可

^①此题目系毛泽东修改确定。

只看见目前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并将朱德的信转发给各中央局、野战军，要求“自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194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这个后来因某种原因没有下发的文件中，加写了第16章第5节，其中在谈到工人的利益时，毛泽东这样写道：“新民主国家必须保证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获得生活的改善，反对或忽视这种改善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当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明确地指明了工人群众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允许的范围，而要以合理的适度的改善为限。

2、毛泽东提出了在建国后处理好生活与生产的关系的原则，明确了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要逐步有所提高的观点。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看来，在1956年时的指导思想还是十分明确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中，也郑重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

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而在上述那篇阐述了五个重大经济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指出，由于我们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了一百多年，国家很穷，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那种妄想一下子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提得很高，都去过富裕生活的念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一定做不到的

学习毛泽东论述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观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对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更多地考虑长远利益问题，是有着精辟的分析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更多地考虑长远利益问题，才能更好地处理好近期利益以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应该是越来越明确了。

第8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的写作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毛泽东为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从事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更为加紧，他们在边区周围屯驻50万军队，建筑了一万多个碉堡，重重封锁、围困，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此外，还“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铔、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①他们想用经济上的压力来困死边区。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包围封锁，1940年

^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第142页。

和1941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最困难的阶段。“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领导全党克服经济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特别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关键。因为只有发展了生产，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才能免于公私交困与军民争食，才能训练干部与训练军队，才能支持前方抗战。所以，他认为，发展生产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基础，在服从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前提下，经济建设乃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他在1941年8月22日致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②

革命的目的是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以造福于民。即使在艰难困苦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也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无产阶级立党宗旨。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他强调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而在经济与教育这两项工作中，教育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为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毛泽东在较长时期研究边区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题进行了调查和整理。他在这一段时期内，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兼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组织部长陈正人、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以及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王中等的书信往来不断，了解了财政和经济建设工作的多方面的情况。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致谢觉哉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必需品入境”。^①同日，他为研究边区财经问题，致信林伯渠嘱请检寄有关材料。信中说：“前次（在枣园时）你给我之预算表及你的财经意见书，想再看一次，请检寄为盼！再，你的三年计划，我未见到，请检付一份。”8月9日，他又致信谢老说：“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②8月19日，他在致陈正人的信中说：“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并说：“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页。

②同上书，第180页。

确。”① 8月22日，他在致谢老函中提出：“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因此，“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召开之前与会议期间撰写的。边区高干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他在开幕词中谈了国际国内形势、整顿三风、边区的建设等三个问题。在《关于边区的建设》这个问题中，毛泽东说：我们有的部队能做到自给百分之八十，将来可以做到自给百分之一百。并号召部队做到自给百分之一百二十，剩余的百分之二十就可以帮助党中央与政府了。并指出：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让各个部队都找一个无人区去开辟，让他们去开荒，去建立工厂。这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的负担。11月12日至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系统地讲解了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论述。12月，他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篇书面报告分发与会人员。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闭幕，毛泽东等在会上给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22个领导干部颁发奖状。他还分别为所有受奖的同志题词。如，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晏福生的题词：“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给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文年生的题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给刘建章的题词：“合作社的模范。”给范文文的题词：“机关生产的模范。”③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4页。

②同上书，第186—187页。

③《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就在高干会召开期间，毛泽东还不断地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著作收集和补充资料，以丰富这一论著的内容。1942年12月8日夜，他写信给南汉宸说：“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12月13日夜，他又给南汉宸写信说：“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1000至1500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即《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引者）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大有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①12月20日夜里，他再次写信给南汉宸，请他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个部分的有关材料迅速送交，并且囑告在材料里“要说政策，说工作”，使广大干部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着重号是作者所加——引者）他还提出，每件材料中“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1943年应如何作法”。信后附言：“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②

直到1943年1月10日，即边区高干会结束前四天，毛泽东还给王中写信，请他继续收集资料。信中说：“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1942年的生产总结和1943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③可见，毛泽东为写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9—210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1页。

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一书的经济理论观点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所论问题面广、类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观点。本文仅择要简述如下：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论点。这个方针后来成为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经济战线的总的指导原则。在战争年代，首先是数十万军队的供给，需要大量的经费支出，这只有依靠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来获得解决，除此决无他途。他早在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中，就曾指出过，“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①因此，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②

2. 经济决定财政。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他说：财政的好坏固足影响经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106页。

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没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没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这个思想，最早是他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他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①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则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决定财政与财政制约经济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思想。他强调如果只着重财政而不切切实实地有效地发展经济，就要走国民党的竭泽而渔的老路。

3. 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重视“民以食为天”这个真理。他早在1934年1月就指出过，“在目前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第一位”。②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他并且说，我们要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提出应该打破害怕农民群众富裕起来的幼稚观念，纠正农业经济政策中的平均主义，提出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与质计算交税数目，使固定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还用较多的篇幅总结了边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一是纠正了经济政策上“左”的错误，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第二是党中央发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心理；第三是开展了移民；第四是实行了奖励政策；第五是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与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第六是政府发放了农贷。这些措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

施，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至今在许多方面仍是适用的。

4. 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股份经济。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确定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的第一位工作，而组织劳动互助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关键。^①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大力提倡成立劳动合作组织和消费合作组织。他在第五章《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中，专门就消费合作社的发展问题作了论述。他认为，合作事业“在组织人民的经济力量、减免中间剥削与发展人民经济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一些综合性的合作社，既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对人民的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起了很好的服务作用。他提倡兴办适合当时边区手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工人不多等政治经济条件的合股企业、合股雇佣企业，对合股企业的集股方式、股金来源、分红办法、股息额度等情况，均作了详细的考察，并过细介绍了当时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和经验，提出了发展集股合作事业的方针。

5. 自己动手，解决困难。1940年至1941年期间，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正如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到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因此，“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自己动手的结果，1943年度起，机关、部队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第553页。

粮食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取之于己。粮食、物资上的一切困难都顺利解决，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负担，在低水平上达到了丰衣足食，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6.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原则。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提出了“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对于集中和分散的辩证关系，他论述得十分透彻。分散经营可以提高积极性，如若盲目集中起来，则将破坏这种积极性。但是，集中领导是使计划统一、供需衔接、经营合理与分配恰当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小的企业分散，可以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大的企业集中，可以加强统一计划。各有各的用处。他认为集中并不是指边区的农工商都集中在唯一的机关里，而是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作出统一的规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在党政军每一大系统里，又有统一计划和分别经营的事。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分散，分散基础上有条件的集中。

7. 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经济建设工作是其他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只有经济上保障了供给，革命战争才能顺利地打下去。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教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士大夫耻于言利。宋太宗想管经济，吕端对他说，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这种腐朽思想使得有些人不屑于谈经济工作，不屑于参加经济建设，好象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由于轻视经济工作的习惯，当时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还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反复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经济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中心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一切鄙薄经济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

须注意经济工作。”而要改变轻视经济工作的情况，首先是居各级领导地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注意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对经济建设的注意力，对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要有计划与必要的经常检查。

8. 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物质利益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从来重视对群众利益的关心。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空洞的说教，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疾苦，认为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革命言词必须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毛泽东把是否能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提到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的高度，要求每个同志都去好好研究。他认为，一个政府必须把帮助群众去解决生产问题与向群众要公粮、公草结合起来，在当时那样的战争条件下，必须领导人民、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去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思想，1933年11月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已经提出：“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②这条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不但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也是一样。邓小平曾经说过：“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08页。

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此外，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例如，按需要生产的观点，即坚持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他提出了按需生产的三条原则，即需要与可能相结合；需要与赢利相统一；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销定产的商品生产原则，是完全切实可行的。他还通过对边区经济关系、经济条件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抽象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理论。例如，强调统一计划的思想，发挥经济杠杆对生产的调节作用的思想，提倡按劳分配的原则，女子参加生产劳动的观点，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各负盈亏的思想，对经济工作要充满负责精神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

三、《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在毛泽东 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重要的经济著作长达十多万字，当时印成小册子发给与会同志阅读。这个报告共分十章，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和粮食工作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原计划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会，没有时间写了，只好暂付阙如。”书中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作者把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并对文字作了少许修改。

对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著作的评价，早在西北高干会整财会议讨论它的重要意义时，就有过中肯的结论，贺龙在《整财问题报告大纲》（一）中指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因而，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

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说：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不是夸夸其谈地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聚讼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这部著作不仅指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与财政问题的正确道路，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使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还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提供了解决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辉煌模范的例子”。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坚持抗战，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等，提出了许多财政经济工作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领导边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大生产运动等的光辉胜利，使得整个陕甘宁边区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在这些正确的财经工作方针政策中，包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力更生的方针；精兵简政、厉行节约的方针；在可能条件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生产和节约并举的方针；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组织起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号召；关于经济建设是边区建设的中心任务的论述；关于合股经营问题的论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重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思想，等等。而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包含了上述方针、政策的许多重要内容和主要思想，阐述了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应该说《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第175页。

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理论的代表作。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因此，学习和研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著作，无论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还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毛泽东自己对这部著作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这表现在：第一，建国后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只将此书第一集收入了，取名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而将其余九章统统略去。第二，1956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准备在八大上作的报告）草稿作审查修改时，在周恩来报告提到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并且早在14年前，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毛泽东将这几句话统统删去了。我想这就是毛泽东自己不甚看重这部著作的地方和原因。

四、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版本

为研究和学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著作提供方便，兹将它的版本情况介绍如下：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共出过十几种版本（有的文章说只有两种版本，是不确的）。笔者为方便起见，特将单行本和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分别叙述之。

第一，单行本出过四版。按出版发行时间先后次序分别是：

1. 解放社1942年12月初版单行本。书名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2. 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单行本。书名仍为《经济问

题与财政问题》，但同时收入了《论合作社——1943年10月在边区高干会讲话》和《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

3. 上海合众出版社1946年6月版单行本。合众出版社印行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删去了此书第三章《关于发展畜牧业》和第四章《关于发展手工业》两章的正文，而只保留了这两章的标题。其他除第一章外，第二、第五至第十各章，也均有省略和删节，所以篇幅减少甚多。此书还将下述四篇文章作为附录：（1）《论合作社》；（2）《组织起来》；（3）《论合作社的方针——1944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招待合作社会议上的讲话》；（4）《二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演讲》。

4. 东北书店1946年11月版单行本。此书写有副标题“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本书也收入《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两篇文章。

第二，收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按出版单位叙述如下：

1. 大连大众书店民国35年（1946年）8月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该文（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下同）收入第四卷的第1—204页。

2. 大连大众书店民国36年（1947年）2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该文收入选集的第545—748页。

3. 大连大众书店民国36年（1947年）11月第三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这部选集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副标题中的1942年误排为1924年。

4. 渤海新华书店1947年3月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该文收入第四卷的第1—204页。这部选集在该文副标题中，也将1942年误排为1924年。这部选集的首页《编者的话》下署的日期

是1944年5月。

5.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3月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该文收入第五卷的第1—179页。这部选集由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出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

6. 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5月初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该文收入第四卷的开卷篇。这部选集注明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

7. 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该文收入第五卷的第748—888页。

8.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该文收入这部选集的第743—880页，副标题为“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第9章

毛泽东与党的七大

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隆隆炮声中，在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指明了道路。

但是，七大的召开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的，由于战争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从提出召开七大到正式召开七大，其间经历了整整15年的漫长时间。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召开，历时1天）便决定：“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其后，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召集七大的决议，还组成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后来，在1938年3月、4月、11

月，1939年6月、7月，1943年8月，1944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的历次会议上，都作出过关于召开七大或做好七大准备工作的通知，所以，到1945年4月23日七大正式召开，其间的确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党内的思想通过整风、审干和路线学习，更加趋于一致，全党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也就是说，这时召开七大的条件和时机成熟了。

七大的路线，七大的主要精神，体现在毛泽东在七大的七个报告之中。

一、毛泽东在七大上的七次报告

七大从开幕起到6月11日会议结束，前后50天内，毛泽东在七大上作了七次报告。如果将在七大预备会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包括在内，则是八次。毛泽东的这七次报告，为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七大和毛泽东在七大上的七次报告，也进一步牢固地树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的七个报告是：

（一）开幕词，即收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

（二）《论联合政府》，在七大上的书面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三）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四）《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1945年5月24日）

（五）《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1945年5月31日）

(六)《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10日)

(七)闭幕词，其中主要的部分即收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上的《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七次报告，是贯穿于七大的一条红线。应该说，七大的主要精神，在毛泽东的七次报告里都包括了。尤其是毛泽东的两个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来三次大革命的实践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报告所指出的方向与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当时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行动指南，也成了动员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共同奋斗的战斗纲领。正如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我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当然，七大上还有许多重要报告，如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的发言等等，以及许多代表的发言，组成了七大的精神，形成了七大的路线。但是，毛泽东的报告，象一条红线，把七大的精神突出出来了。

毛泽东的七次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与政策，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所取得胜利的条件，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政策。

在这些报告中，毛泽东还分析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起来

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斗争。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具体纲领则包括工业、土地问题等经济问题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这七次报告，也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施政纲领”，它描绘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蓝图，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二、关于利用外国资金问题

毛泽东在七大上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在七大正式召开之前形成的文献。在七大召开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发给七大的代表，并在七大正在召开的时候，曾在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在《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献中，毛泽东在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第七条“工业问题”时，曾谈到应该利用外国资金的问题，一方面欢迎外国投资，让外国人到中国来于对于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建设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金。这个思想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但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删去了关于利用外国资金的这段话。毛泽东的利用外资的话曾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本书作者顾龙生注：应为资金，下同）。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

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①

这段关于利用外国资金的论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的原因，我想可能与建国初期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情况有关，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对我国实行禁运，这样就限制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使我国不能正常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因而也就谈不上利用外国资金了。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而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新中国在建国初期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实行的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均不须用现汇支付，因此也不存在利用外国资金问题。

对利用外资的认识水平显然也是在逐步提高的，建国初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的考虑，曲解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存在。在世界各国利用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确因某些主观原因而坐失良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想由于以上分析的原因，毛泽东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同意删去了关于利用外资的这一段话。这样做的结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切地说，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三、关于“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里，几次都提到要在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

^①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第5版。

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不充分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根本规律，资本主义是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要千百倍地高于以往的生产方式所能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但在其中占有应有的一席，而且应广泛加以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一起，组成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经济要素。

在七大的这些报告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起来，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②毛泽东指出，离开这种观点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迷惑中国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的。

毛泽东还解释了“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可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等3卷第2版，第1058页。

②《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等3卷第2版，第1061页。

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无疑，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毛泽东指出，那些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必要发展的人，其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欺骗手段，是存心与中国人民为敌，不让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的空谈与欺骗，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上了那些人的当。

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讲了书面政治报告“没有明白写完”的一些问题，其中也谈到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个问题，在口头报告里作了很多发挥，其中有些观点的真理性，是至今有用的。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条，是可以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想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和斯大林给了他们以批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革命”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这个思想，是根据中国国情实际、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情况、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

和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一样，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中，又专门读了“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60页。

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要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有他的好处。我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从整个世界来说，它是向下降，但世界上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用处的。比如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益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益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南美还有一些农业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这样的性质。这个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要一般的讲资本主义，我们自己又在那里搞资本主义，这怎样解释？英、美资本主义也做过好事，他们打过法西斯，但压迫人民是不对的。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是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我想这都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说的，因为落后的地区，农业国家生产力不发达，就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便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还专门发了一个社论，叫做《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申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后来有所变化。

四、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

七大是关系全中国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

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这就是七大的重要历史意义。而毛泽东的七次报告，则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为了达到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目的，七大制定了一个革命的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阐述的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是总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毛泽东提出要全党团结起来，为党的伟大任务而奋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

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大会上除有二十多次报告并通过了若干决议外，许多代表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总是的总结几年来各个方面的工作，但在这些发言中，也有不少代表回顾了在党的历史上自己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及其责任，对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及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作了真诚的检讨。出于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和献身革命的赤诚，党内许多资深的负责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使全体代表受到教育。例如张闻天同志的诚恳的深刻的检讨，对于整风成果的总结，深挖犯错误根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不仅对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且对全体参加七大的代表，都是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张闻天从中国革命的曲折实践中，确认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决心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周围，去争取中国革命的新胜利。由于党的路线的正确，使大会在澄清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

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召

开的七大，由于做了长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全党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经过24年的战争和斗争考验，党在各个方面也逐步趋向成熟，党的干部队伍得到锻炼和成长，已经能够挑起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担。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包括国统区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在全国人民中成为具有吸引力的革命的象征。七大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通过召开七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里所指出的：“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指引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

第10章

毛泽东论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

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建设和发展速度的大政策。毛泽东对于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海外资金问题,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客观地、历史地叙述和评论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对于研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脉络

向西方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探求拯救中国的真理,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奋斗的目标。但是在这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在毛泽东青年时期,这种向西方的学习阻力重重。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说:“‘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

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厉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①可见当时学习西方之难,这种难,不仅在国外不让你学习,更难的是墨守成规满足现状的国粹者的唾骂。

193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怎样答复斯诺提出的问题的单子时,曾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在中国投资”这个问题作出一致意见:“欢迎的”。^②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投资,我们都欢迎。

1936年7月16日至23日,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采访中,就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问题进行了谈话。其中关于利用外资问题,毛泽东有着十分明确的阐述。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哪种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回答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③毛泽东还就外债问题坦然地告诉世界:“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④

①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21年7月。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5月15日,存中央档案馆)。

③、④《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20—130页。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中提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①1944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福尔曼谈话时，直截了当地说明我们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中国解放区来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作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②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同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又称美军观察组）的成员、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将军参谋政治顾问的约翰·S·谢伟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③把外国资本的帮助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毛泽东在吸收和利用外资问题上的重大思考，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发展。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本书作者注：应为资金，下同）。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

②毛泽东接见福尔曼时的谈话。《Report From Red China》，1945年美国出版。转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2期，第136页。

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合刊，第11—12页。

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①此段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略去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也涉及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经营企业等问题。在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工作做好以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中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说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开办的企业，是允许的，不存在立即取缔的问题。这个报告还强调了同外国人做生意的问题，有生意就得做，不但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次为期2个月的访苏旨在解决苏联对中国贷款等问题。揭开了新中国经济史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新一页。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与苏联政府谈判，并签订了苏联向中国给予资金援助即低利率的贷款的协定。这次贷款数量为3亿美元，年息1%。贷款用以偿还苏方交付的机器设备和器材，中方以原料、茶叶、现金美元等偿付贷款本金及利息。50年代，中国总共从苏联获得14.27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些贷款引进了主要是苏联（也包括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156项成套设备，建立了新中国经济的主干。

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3个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4月5日的

^①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第5版。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社论指出：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由此看来，当时主张吸收外资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50年代初我国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一些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等。可以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是肯定的，鲜明的。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5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又扩大至156项工程。

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把外国所有好东西统统拿过来的思想，这就不仅是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等，而且理应包括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外国的好东西学一点好，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外国有用的东西，就是要学。……拿过来就变成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在这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唐朝在我们中国是有名的一个朝代，一搞久了就变成中国的了。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在对港澳工作的指示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要吸收海外资金的问题。当时，华侨资金约有5亿美元流入香港。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怕将来会“共产”的顾虑，所以不敢将资金投到中国来。当年向国内投资的华侨资金不到1000万港元，不到香港吸收华侨资金的

2%。毛泽东指出：“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并无所损。就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去了。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来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毛泽东还问有关同志：华侨投资为什么不能自由提取？为什么不能给回外币？他们不来投资外汇是不是一样到不了手？毛泽东还说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两个文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这正是毛泽东关于要吸引华侨资金的观点的现实化。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有如下一段强调自力更生的话：“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虽然强调自力更生，但也说了争取外援和学习外国好经验的话。

1959年开始，毛泽东对引进和利用外资不感兴趣了。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用2个月的时间，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3版），他在学习此书时的《谈话记录稿》中，或者在后来流传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苏联第3版）的笔记》中，强调了中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的问题。

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接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时，说了这样的话：要破除迷信，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将来看吧，帝国主义要倒下去，我们这些人要比帝国主义先进。又说：好的事

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这样才有希望。特别是断绝外援最好。断绝了怎么办？还不是靠自己？①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与正确的自力更生的原则是不相符合的。

60年代中期，在渡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之后，我国利用海外资金，采取的主要的是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的外汇存款。这一形式，实际上是利用了海外银行的贷款，因而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尽管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此不同。利用海外资金的结果，我国这个时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一些石油化工、冶金、汽车等比较重大的设备和技术。

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②这种说法，似乎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失去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的可能性，显见是没有道理的。

二、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思想的

不一贯性的原因

如前所述，毛泽东关于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前后有差别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吸收和利用外资是补充国内建设资金匮乏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正常的对外国际经济

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以苏班德里约为首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1月24日。

②转引自黎青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交往，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措施。在有些时候，尤其在60年代后，毛泽东对借债受辱感到特别气愤。如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7月25日又不等中国政府答复，迫不及待地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内撤回其在华的全部专家，又逼中国还债。1963年4月20日，中苏签订中国提前偿还1960年贸易业务中对苏联欠款的议定书。1964年提前全部还清对苏联的欠债之后，毛泽东对于吸收和利用外资的问题失却了兴趣。至于在毛泽东晚期，他要求社会主义纯而又纯的思想有所抬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与资本主义的企业搞合营或联营，这样就排斥了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想。

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主客观两个因素。从客观上说，国际的大气候是当时不允许中国去吸收和利用什么外资，这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16日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迷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①

从主观上说，这也是与当时在对外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分不开的。这包括：

第一，当时只与苏联、东欧等国家实行经济合作与往来，有

^①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

一定的局限性。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对中国比较友好或持中立态度的，只搞贸易往来，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吸收外资等问题的考虑，似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更多地支援弱小国家，而我们自己则无需接受外国援助，在经济上无需接受外国贷款。如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老挝五国和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无偿赠款等，在不少年代超出了我们自己国力的可能。在被援助的许多国家如罗马尼亚等等，人均国民收入都要比中国高得多。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批评中国在“四五”计划期间对外经济援助太少，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因为这种批评，1972年2月2日，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会谈时，决定把向巴提供并已安排使用的四笔贷款全部改为无偿援助，将1970年提供的一笔贷款的偿还期推迟20年。中国1971年度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0年的3.5%上升到5.1%，1972年进一步上升到6.7%，1973年则达到7.2%，超出了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许多国家的对外经援比例。

第三，毛泽东从政治上着眼比较多，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成分少一些。对一些兄弟国家、友好国家的援助，当然是应该的，但过多的无偿援助对于援助国与被援助国来说，都是不利的。对于我国来说，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经济财政实力不许可，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显得突出。如1967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为19.94亿元，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5%，到1972年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51亿多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该年新签订的援外金额为49多亿元。其中，与越南签订的13

项协定就达26亿多元。^①这种不顾国内经济实力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持久的，无疑地也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而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国际资本相对过剩，而我们则错过了一次利用外资、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机会，这种损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才得以弥补。

^①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37—339页。

第11章

毛泽东财政思想论析

毛泽东财政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提出了适应当时战争需要、适应建国后革命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一系列有关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原则，提出了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财政观点和财政思想。例如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理论观点；改善人民生活 and 增加财政收入并行不悖的财政方针；公平合理和公私兼顾的财政原则，以及毛泽东对单纯财政观点的批判；对把发展经济看作是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的观点的批评；对“仁政”及“竭泽而渔”观点的评论，等等，都体现了毛泽东光辉的财政思想的特点，反映了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丰富内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财政思想，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抗日革命根

根据地的财政方针,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区的财政政策,及建国后毛泽东的财政思想,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对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对于夺取政权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具体运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财政,为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说是一项极其有意义的事。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原则及内容

建立财政,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是在红色革命根据地产生后形成的。革命政权的产生,毫无疑问需要财政的支持,红军的逐渐扩大,国内革命战争需要的给养和物资上的供给,需要制定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财政政策,需要确定革命政权的财政原则。当时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财政工作与经济工作,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财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于指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早在1931年11月28日,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项英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在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向富农征税,免收商业出入口税和工业的出厂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经济。^①同年12月1日,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条例》共14条,规定实行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

^①《红旗周报》1931年,第47期。

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税则征收。毛泽东同日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制定了包括财政与税则在内的四个方面的条例。其中关于财政与税则的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捐税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则，取消奴役和高利贷的一切契约。发行苏维埃货币，开办工农银行，对各农民家庭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实行借贷，以发展其经济。12月29日，毛泽东与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等签署并颁布《关于统一财政系统的规定》，强调了财政系统组织上的统一。这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财政思想：财政力求统一，收入上缴国库。

1932年3月12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4号，要求各地苏维埃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把所有地方政府收入的各项进款，除留用费外尽量上缴到上级政府来，同时应大量地节省金钱，来帮助红军必需用的用费。为发展革命战争，对于粮食一项极为迫切，各地打土豪来的谷子，除已发给当地劳动群众外，应以区或县为单位，全数集中起来，以运送到前方供给红军。各地方政府，还要以最大力量派专人到各地收买粮食，送往红军。动员群众自动捐助或廉价卖给红军粮食，在群众中开展革命竞赛办法支援帮助红军。3月17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第6条说：为了加强发展革命战争的力量，就要强固发展革命战争的经济力量，大会必须详细讨论发展苏区经济，按提高实施方案，以及执行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对于财政问题，大会要坚决依照中央所颁布的财政条例，定出很具体的统一财政办法。对于节俭经济，帮助发展革命战争更要切切实实讨论，大会应该坚决的反对过去各级政府随意浪费经费的重要现象，并规定惩戒以后浪费经济的办法。^①同年6月9日，毛泽东签署的《中央政府给

^①《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给予了13项指示。其中说：正确执行经济政策，开发财源，建立发展革命战争的经济基础，发展经济整顿税收，组织游击队在白区筹款。同时要提出“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严惩贪污浪费，实行真正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①接着在7月7日，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4号，对财政问题再一次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求把税负的重担放在最有财产的阶级身上。训令指出：为筹措战争经费，除提高营业税，累进税率，重新确定土地税率，征收城镇的房租，并责成地方苏维埃政府在发展新苏区中筹款，使一切税的重担放在最有财产的阶级身上外，还准备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使广大工农群众在经济上来动员帮助红军，保证革命战争的经费。此外，还开始发行（从本月起）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票。^②

1932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中，回顾了中央政府根据经济政策确定的财政制度与方针的实行情况，提出了发展革命的任务。^③12月27日，毛泽东在训令第8号中宣布：为统一财政，并随时明瞭全苏区财政现象，便利于整个财政计划和支配起见，财政人民委员部已决定于明年1月1日起建立国库，实行会计制度，将一切财政收入一律交到国库分支库，由中央支配。毛泽东指出这是建立统一财政的重要基础。

1933年2月24日，毛泽东签署《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9号，训令

①《红色中华》第22期，1932年6月9日。

②《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7月21日。

③《红色中华》第39期，1932年11月7日。

说，为筹措战争经费，争取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以保护苏区工农群众的利益，决定向富农募集一次革命战争捐款，这是战争时期的紧急办法。这次募捐，要视富农家庭经济情况斟酌派捐，一方面劝导富农捐助，同时带强迫性，但又不同于对地主的没收，应在特别收入款项内另立富农捐款项，不得混入地主没收款及罚款内，以清界限。同年8月25日，毛泽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在这个《训令》中提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训令》并对以前的财政工作作出检讨，责令新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对财政工作加以根本的整理。^①而在此之前的8月12日，（建国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及以后印刷的各种版本，均将这个时间错定为8月20日，1991年7月出版的毛选2版已把这个时间改过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原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也错误地说这是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全党必须重视经济工作，阐明了如下八个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一，开展经济建设工作的目的。一句话，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二，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三，对不重视经济建设的思想与行为提出了批评。四，阐明了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思想。五，说明了在革命战争环境中能做到与完成的经济建设任务。六，阐明了“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

五

^①《红色中华》第107期，1933年9月3日。

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思想。七，提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和工作方法。八，提出了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等具体任务。^①

1934年1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四部分的《再说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和《再说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两节，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合并整理，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此文指出要在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以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策。这篇讲话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原则：“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支出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讲话要求“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②

^①参见拙作：《对〈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几点认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②《毛泽东论财政》，财政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3—14页，第20页。

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方针的形成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相应作了改变。抗战之初，毛泽东就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①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适应变化了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服从抗日的需要。这个新的财政方针，即为一例。

1938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中，也重申了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常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②不久后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在谈到财政政策时，又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原则，以及必须适当改良人民生活的思想。毛泽东说，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有钱出钱的原则上。^③这里说的政府，除抗日民主政府外，当包括国民党政府。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演讲，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3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34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336页。

讲话共分十二点，其中在讲到第八点“生产运动”时，毛泽东说：关于财政经济方面，边区可以作为全国模范的，除生产运动外，还有津贴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等，这些是和生产建设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其中说到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时说，在过去苏维埃时代，洋人的货来，一定要关税，听做关税自由，我们要怎样他就怎样，哪一个帝国主义者敢放一个屁？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最高干部会议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7月12日，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演说，8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大会上演讲，都谈到了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以利抗日战争的问题。^①

1940年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及军委名义拟写给肖克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其中指出要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在抗大分校内设立行政工作班，教授政权工作及财政经济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关于财政税收政策，毛泽东写道：“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在经济政策方面，毛泽东写道：“关税政策和货币政

①《毛泽东选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编印。

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①1940年，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弄得解放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通过自己动手，发展经济，保障了供给。

1941年6月13日，毛泽东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财政问题提出二点：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斤斤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②6月15日，又致信林伯渠，就财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除一些财政方面的具体问题外，信中说“商品货币中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对有关理论问题提出了看法。7月31日，毛泽东就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对边区现行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根本点，如预算分散、纸币、运盐等，愿意继续听二老及其他同志意见，继续加深对此问题的研究。信里又对财政问题提了四点意见。大意为有关财政政策分歧意见不要对下级人员说，注意检查财政税收等工作中的缺点等。

同年8月6日，毛泽东又就财经问题写信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

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6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0页。

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拟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①毛泽东还提出了解决此两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指出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应有一致的意见。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林伯渠，要求重看他的“财经意见书”，请他寄去。8月9日，毛泽东复写信给谢觉哉，进一步商讨财政经济问题。信中请谢老“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并希望在财政经济方面有个统一的意见。

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就起草财经纲领问题提出意见。并让陈正人向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要材料，以作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并让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建设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朱理治等参加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东西，起草的东西更正确。”^②毛泽东在1941年对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散见于其他许多讲演、报告、通信、电报之中。

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说，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说明经过发展经济，已渡过了1940年与1941年这两年最困难时期，财政经济状况趋向好转。12月8日，也即在西北局高干会召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17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4页。

开期间，毛泽东为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致信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请他收集和撰写财经方面的材料。接着在12月13日夜，及12月20日夜，又连续两次给南汉宸写信，请他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即《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引者）中教育干部”。^①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与较长时间研究边区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召开之前与会议期间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长达10万字。这个书面报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观点，包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经济决定财政等著名观点。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毛泽东还提出这样一个财政思想：“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②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军队机关学校都通过生产自己解决全部或大部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

^①参见《〈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地位》本书第9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4页。

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提出“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而应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使军队生产达到自给。靠着这一方针，解决了抗日军队的给养，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解放区的财政政策和特点

经过八年抗战，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压倒了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抗日胜利后的财政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

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达到保卫解放区的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灾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①这里概括地提了解放区应该采取的财政政策的部分内容。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写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关于财政方针作了如下的规定：“财政。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1946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69页。

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①重点是两条，一是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二是支持解放战争的需要。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指示说，为打好自卫战争，“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②这实际上是重申前已提出过的两条方针，一是满足战争需要，二是改善人民生活。10月1日，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一文中，重申了内战期间的财政原则，即“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项原则，坚决地实施之”。这些财政原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原则，是长期适用的财政原则。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其中对财政问题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说：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第三个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这三项原则，是在财政工作的长期实践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5页。

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反复阐述，应该说是财政工作的基本原则。

1948年5月2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进一步完善了解放区财政政策的提法，结合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和解放战争的军费需要，毛泽东制定了新解放区的财政政策。毛泽东指示，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也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一句话，减租减息，合理负担。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重申在没有具备土地改革条件的新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

四、建国后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作了新的设想，其基本点有两条，一是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二是争取财政的收支平衡。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很关切。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便提出为了统一财政必须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工作。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便对整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的领导。7月27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财经会议。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6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对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估价。毛泽东说，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书面报告，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对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给予明确肯定。并提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财政工作的方针、目标是很明确的，在建设的年代，财政工作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的负担服务。

在建国后的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前3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财政问题仍有不少的思考。如象财政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财政工作要厉行节约，贯彻经济核算的原则，等等方面，有不少正确的论述。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说，国家给予农民必要的援助，象设立贫农基金和其他贷款，但是“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农民的潜在能力估计不足，是错误的。”①又说，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

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5页。

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①还有关于要依靠农业、轻工业积累资金，我们“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②等等论列，正确地阐述了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体现了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光辉。至于毛泽东关于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叙述，更是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在这里就不加以论引了。

五、毛泽东财政思想指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

从以上我们对毛泽东财政思想、财政观点和有关财政工作的许多论述中，从我们对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和特点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财政工作的许多精辟论列，不但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工作和经济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推动，而且对于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也具有深远的和实际的现实意义。

1. 关于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毛泽东在对经济与财政两者关系的认识中，始终认为经济是决定财政的，始终认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财政的好坏固足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没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没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制约经济，两者的关系是辩

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7页。

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证的。根本的、决定的、主导的东西是经济。这种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因为财政归根结底是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从基本方面来说是生产。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过来影响、促进生产。基于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认为片面地着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整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脑子里作怪的缘故。毛泽东指出：如果在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上，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那么，就一定处理不好经济与财政的正确关系。相反，往往把财政认为是高于经济的东西。而如果只着重财政而不切切实实地有效地发展经济，那就要走国民党的“竭泽而渔”的老路。因此，解决财政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目前我国财政连年赤字，困难比较严重，往往在必不可少的财政支出上想办法打主意。遵照毛泽东的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主要注意力应放在支持和发展经济上，经济建设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财政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在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经说：“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①当然这是批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即使现在也是适用的。

2. 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几十年来一直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早在1933年8月12日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334页。

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中，就曾指出了这个论点：“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①而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毛泽东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定为“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②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上都处在战争的环境中，因此，使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保障对革命军队的供给，是一个基本的财政要求和任务，而保障供给的前提只能是发展经济，只能是通过发展生产来壮大经济，充裕财政。

3. 关于减轻民负，改善人民生活和搞好财政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的所有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中，都注意到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如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生活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又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毛泽东也说：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己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105页。

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延安解放社1944年版，第1页。

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只有在完成财政收入任务的同时，尽量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地搞好财政工作，完成经济和政治任务。

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中，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和具有特色的东西，弥足珍贵，可以用来长期地指导我们的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可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例如，‘用90%的精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用10%的精力向人民收税的观点；在财政税收中公平合理的原则；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有限度的思想；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的理论；反对单纯财政观点，把经济建设看作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措施的做法；反对所谓“仁政”和“竭泽而渔”的财政观点；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的思想；以及在财政的支出中，厉行节约，贯彻经济核算的思想；财政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等等，都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重要内容，都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宝库中的宝贵财富，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思考和继承、发扬、光大。

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过去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愿意借这次《毛泽东财政思想研讨会》的东风，把对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第12章

毛泽东与半工人阶级

半工人阶级，就是半无产阶级，包括 贫农、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者等，毛泽东早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情况，认为“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历来没有将半无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来看待。然而，毛泽东也有个别的时候发生失误，认为半工人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一、关于半工人阶级问题的提出

“半工人阶级”一词，虽然毛泽东在20年代就用过，但是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极个别文件中出现过。毛泽东1948年2月在修改胡乔木同志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这一文件时，曾使用过这一提

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这个决定是草案，只发到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各中央局、分局讨论，征求意见。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工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解释我们过去的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而不是农民领导的问题时谈到，**贫雇农领导土地改革，就是乡村的工人阶级或半工人阶级领导土地改革**。以前的革命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和乡村的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蒋介石打倒了，把土地改革完成了。这段话是在讲党员条件问题中谈到的。同年5月5日正式印发的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删去了讲党员条件的部分，这段话也就随之删去了。这次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仍有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所以，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说法，只是在上述极少数文件中出现过。

二、半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个思想，我们党历来是明确的。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就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毛泽东在1926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也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刘少奇1926年5月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中指

出：“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在我们党的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著作中，这类正确阐述是举不胜举的。不但理论上如此，而且在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是一直坚持以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

关于半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和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论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曾多次作出过。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过：“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①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也指出：“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

②显然，半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那种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是一种明显的失误。

三、纠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

前面提到，建国初期的个别文件中提到了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引起人们的疑虑。《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9页

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43—644页

下发后，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治部等单位反映，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是个新问题。他们提出，在乡村中只讲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其中是否包括雇农？半工人阶级是否指农村的无产阶级？“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否指在目前或今后一时期内还有半工人阶级的领导？要求给予解释。为此，中央于1951年7月发出了《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解释》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句话，应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因为我们通常把乡村工人和雇农称为乡村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而把贫农称为半无产阶级（即半工人阶级）。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乡村的土地改革及其他革命斗争中，乡村工人、雇农及贫农的领导作用是显得很重要的，故在这里说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时，不能不说到乡村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即乡村工人、雇农和贫农）的领导作用。”至于说中国革命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否也包括半工人阶级在内呢？答复说：“是包括在内的。”

《解释》这个文件发出后，有些同志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仍然有疑问，并明确提出不同意见。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1951年10月17日分别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提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他们在信中说，《解释》中的观点和毛泽东著作的精神有出入。“乡村的半工人阶级主要指的是贫农”，“如说贫农是中国革命的一种领导成份，则很容易被误解为中国革命是工农联盟领导的”。“这也涉及到我们党的性质问题”，“有些人就以此为根据，说我们党是工农联盟的党”。我们“不应该把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领导阶级相混淆”。半工人阶级虽然受剥削很深，革命性也较强，但同工人阶级相比还有一些弱点，只能积极参加革命，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有了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之后，才使中国革命面貌一新”。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将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批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阅，请安子文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于1951年11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他们两人的意见是对的。第一次全国组工会议的整党决议和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作用问题解释中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容易使人在对中国的革命领导问题以及我们党的性质问题的认识上发生误解”。作为半工人阶级的乡村贫农以及城市的贫民和苦力，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确曾表现过积极作用，特别是贫农，曾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半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仍有所区别。“关于处理办法，拟发一个简单的电报，以修改上述提法”。报告附了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的电报稿。

毛泽东接到安子文的报告后，同意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于1951年12月15日写信给当时在杭州的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在信中说：“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象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①刘少奇于同月19日即写了复信，同意将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加以改正，并同意向全党发出安子文起草的电报。毛泽东于23日还将刘少奇的来信和有关文稿，批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胡乔木、杨尚昆等同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27页。

志阅，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的批语中谈到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及安子文同志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主动。

在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同意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之后，于1951年12月下旬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及其三个附件。这个指示说，《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中央现在认为是不适当的”。决定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一句，改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并将《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撤销。还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此后，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很快得到改正。从这一问题的提出到纠正，可以看出我们党是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听取群众意见，处理和解决问题的。

四、关于在半工人阶级

问题上失误的原因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在半工人阶级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待失误的态度。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

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①我们党在个别文件中把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都作为领导阶级并提，这只是属于一时使用了不适当的提法。毛泽东等同志从群众来信中发现这一问题后，即引起高度重视，在党中央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广泛征求意见，经过认真地商酌、研究，共同决定在党内公开纠正，使党中央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主动。由此可见，我们的党是一个郑重的党，是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党，是对工人阶级和人民事业极端负责的党。我们应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同志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中，更好地学习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尊重集体领导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搞好党的建设工作的。

那末，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在半工人阶级这个问题上造成失误的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想原因肯定是有，决不是一时的文字上的疏忽。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党员，绝大多数出身农民。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历史不算太长，他们也大多数从农民的队伍中出来。这样，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强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这一切，就容易产生贫农这个农村中的半工人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潜意识，就会发生一种错觉，即半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领导了中国革命，这样一种感觉，也许在不少人的头脑里存在过。

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彻底性的中国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共产党，在她成长的道路上也不是一步登天的，是逐步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最杰出的思想家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也是由不完善到完善逐步发展的。即使是在中国革命中已经比较明确和得到了验证的理论问题，有时也不免，例如就在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上，产生一时的难免的迷误，一经指出，便立即意识到失误之所在。这只能说明，与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的。如果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不需发展，那一定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或神话。

从半工人阶级也领导中国革命的错误的提法并非只产生在一处文件来看，显然，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把半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领导作用混淆起来了，尤其是把“在乡村的土地改革和其他革命斗争中，乡村工人、雇农及贫农的领导作用是显得很重要的，故在这里说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时，不能不说到乡村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说，把对某一运动的领导说成是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把半工人阶级的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挥作用，说成是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反映了逻辑上的混乱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

不论这个失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够正视这个失误并及时在党内公开改正，的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

第13章

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矛盾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人民既要完成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又要将国民党抛下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起来，使之逐步走上建设的轨道，任务是极端艰巨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难的历史任务。这个时期，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亦即建国头三年的主要社会矛盾

本文指的建国初期，就是指从1949年到1952年即建国的头3年，也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过渡时期7年中的前3年。在这三年中，除了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外，始终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那

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也就是恢复由于长期战乱而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虽然由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立了人民掌权的新中国，但主要矛盾实质上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矛盾。1950年4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建国初期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是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来的。这个总方针，是指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建国初期头三年各项工作的指针，也是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确定建国初期头三年的主要社会矛盾，制定这个时期的总方针，是切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国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民主革命任务的结束。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但建国时这三大任务均未彻底完成。无论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因素来说，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仍然霸占台湾，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近邻朝鲜而引起的我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包括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与企图颠覆和包围新中国的阴谋；以及我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的斗争（包括征用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则表现为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二的全国新解放区的农村土地改革。这个斗争，从1950年起到1952年9月为止，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大陆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到1949年底，全国共没收官僚资本

主义工业企业2858个，并没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系统和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这些工业、交通、银行企业包括了官僚资本的最主要部分，没收了它们，官僚资本就基本上被消灭了。^①但官僚资本的全部被没收，是1951年春天的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随着官僚资本的被没收而逐步得到确立，当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未占优势。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斗争，则通过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华南对残敌进攻，以及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建立起了人民大众的一统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究竟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回答说：“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②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是新中国的质的规定性。这一点在宪法的前身，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第一条中也作了规定。

^①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203页。

^②《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62—963页。

二、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亦即建国头三年主要社会矛盾 提出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建国头三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明确的，基本上是一贯的。经七届三中全会之后，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副主任委员毕鸣歧等的电报中指出：“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毛泽东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提法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而这个报告的原文，在1949年3月5日产生时有关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毛泽东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前，亲笔在“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一句后加写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几个字。修改后强调提出，“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主要矛盾的方面才发生转移，而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前，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没有得到根本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也曾提出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样的论断，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来说的，从大的历史时期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当然，过细一些地分析，应该是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国民党残余势力逐步肃清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宣告结束，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一化三改造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方才开始。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3年12月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①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建国头三年的主要社会矛盾，在这里是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来了。

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建国头三年主要社会矛盾的提法，历史已经证明是准确的。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些“左”的急躁思想，希冀在建国后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一举消灭资本主义，以为建国后的主要社会矛盾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否定了这种说法。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②1952年3月，毛泽东又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肯定了建国头三年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

三、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 基本措施及指导思想

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新中国的巩固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准备。毛泽东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也提出了许多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是：

^①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②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稳定物价，打击投机活动。为此加强了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国家控制主要商品，并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管理和现金调度的结果，制止了通货膨胀。

——维持私营企业。1950年4月13日，中南财委就武昌私营纱厂因税债及银根紧张等问题即将停工问题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写了报告。4月15日，毛泽东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说：“陈云同志：此件所述厂家似应予以维持。如何，盼告。”私营企业由于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施，大都在建国头三年得到发展。

——不动富农经济，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生产力。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刘少奇，要求郑重对待富农问题，“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即应保存富农经济。3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看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他认为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5月1日，毛泽东再一次就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致电中南局邓子恢和华东局饶漱石，认为：“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毛泽东一再表明在建国初期保存富农经济的必要性，正是基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方针的考虑而作出的决定。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发展，这也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而应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1950年6月6日在向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书面报告中指出，要

“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军队参加生产。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①

——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壮大新民主主义经济。

——在新解放区农村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粮食布匹等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9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此外，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还采取了诸如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合理调整工商税收以减轻私营工商业的税负；抓紧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突出抓了铁路交通和兴修水利这两大重点，以及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等等，都对恢复国民经济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上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诸种措施，体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在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的情况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的反抗，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才能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这个中

^①毛泽东：军委关于1950年军队加参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15日，）

心工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决定的。

毛泽东将这个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建国头三年的整个时期内。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及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确定了建国后对内实行节制资本、对外实行贸易统制的原则，确定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还确定：没收官僚资本归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①这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基本政策”。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约有3.1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原来属于地主的耕地，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村中的地主阶级。1952年，粮，棉，麻，糖等均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48.5%。

中国的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在共和国成立3周年时薄一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一文中说，如果工矿产品建国前最高年产量定为100的话，那么1952年有保证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可以达到的产量就是：生铁104，钢锭155，电力115，石油136，水泥148，木材136，煤90，除煤外，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①现代工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179%。②

其它如交通运输、内外贸易、财政收入等各方面情况，均得到恢复与发展，例如1952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7.5%，等等。这些，为大规模的国内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③

①《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5页。

②《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后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15页。

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页。

第14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一、集体化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农业（与此同时，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几亿农民引向了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的广大农民爆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分配到土地但缺少资金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有着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迫切要求。因为缺乏资金和生产资料，生产力不易得到实现。为避免重新借

高利贷导致破产，典让和出卖刚刚获得的土地，产生新的两极分化，也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个体经济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的科学技术，广大贫农、下中农要求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很高的。

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说，为了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真正摆脱贫困，为使正在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努力不致落空，为使正在逐步恢复的国民经济建设得到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增强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生产的工业品能够顺利销售到农村，获得农村这个广大的市场，也有必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走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了极大成效的“组织起来”的道路。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即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

于是，农业集体化道路就成为顺乎民心、合乎国家要求，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农民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增强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能力，才能彻底摆脱贫穷与落后。经过农业集体化，“将来大家共同富裕，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①几千年来来的个体经济，农民一直过着贫穷艰苦的生活，只有靠组织起来，才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他认为，在一般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

^①毛泽东：对工商界代表人物的谈话。1955年10月27日。

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蓬勃大发展，总是在相应的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认为在夺取政权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①因此，在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这三个方面的生产关系，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和必定要经过的道路。

二、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领导农民开展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1925年5月通过的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合作运动的决议案，就指出，农民要解决困苦问题，只有起来奋斗，在根本上惟由阶级斗争以达到社会经济的改造。但在根本改造目的尚未达到以前，我们对于目前的改革也是要的，合作运动就是改革目前农民生活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声明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相互的利益的组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的14件大事，第13件就是“合作社运动”，当时主要指消费、贩卖、信用3种合作社。湖南省农协还颁行了“合作须知”10条，^②来指导农村合作运动。

^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稿的论点汇编，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第254页。

^②据《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3页。载1927年3月30日《湖南民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组织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土地改革提出了组织农民生产合作社的问题。1930年5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暂行法》，便首次正式提出兴办集体农场的主张，撇开当时主张土地国有的不实际性，我们看到了集体化道路的萌芽。同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个主张，并在鄂豫皖等部分苏区实施。就是说，在民主革命的初始时期，我们党就有了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实践。

1933年8月在中央苏区召集了南北两地区的经济建设大会，8月12日（不是《毛泽东选集》第1版上注明的20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打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批评了不重视经济建设的错误以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1933年和1934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制定了16条方针、发展和组织原则、作用、管理办法、分配政策等等。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组织广大群众于合作社中的运动，也有了显著的成绩，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即在中央苏区吸收的社员，已达50万人以上。闽浙赣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数达全省人口的50%，在有些区乡则全体劳苦群众已经加入了合作社。”^①毛泽东1月24日、25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则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5页。

而“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①中央苏区劳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反“围剿”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来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的运动进一步在各解放区广泛兴起。1941、1942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解放区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为摆脱困境，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确定了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第一位的工作，而组织劳动力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关键。^②毛泽东在高干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他在这次高干会上的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5章，就题为《关于发展合作事业》。1943年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说：“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③毛泽东总是将互助合作、走集体化道路看作是发展生产力、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可靠途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只有合作化，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脱贫致富，这一点，毛泽东在同年11月29日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大会上说得相当明白：“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

①《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页。

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第553页。

③《论合作社》，《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页。

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①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到各种劳动互助组织中的农业劳动力已达全区劳动力的70%左右。②其它各解放区的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发展也很快，如晋绥解放区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达到37.4%。③劳动互助合作组织有扎工队、变工队、拔工队、搭工队、拉吊庄、唐将班子、互助组、劳力社、合作社等等，名称不一，各种互助合作组织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一些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很快，解放区政府把“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方法”，“是农业生产力飞跃式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④老解放区劳动互助组织进入巩固阶段，新解放区劳动互助组织的发展往往结合战争进行，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例如太行区1946年在互助组织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发展，20个县统计，平均每县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有42095人，是1945年的2倍，1944年的4倍多，全区78%的劳动力都组织起来了。⑤在个

①《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5页。

②《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1页。

③同上书，第708页。

④分别见《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生产运动的指示》，1945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指导》，1948年5月10日《晋察冀日报》。

⑤赖若愚：太行区二届群英会全体英雄会议上的总结，1947年1月5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体经济、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是很明确的。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①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通过）第29条、第34条和第38条，分别指出：“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持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②

由此看来，组织广大农民互助合作，走集体化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也是一辈子坚信“欲得仓廩盈，天下重农耕”的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所以，不存在什么建国后农业合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0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7页。

作化搞早了的问题，也不存在农业合作化应该不应该搞的问题。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急于求成的三次表现及当时的纠正措施

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来看，由于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发展是健康的，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几亿农民走上了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真正建立起来，成绩是抹煞不了的。

回过头来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必须指出，不光是1957年夏季以后有对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前，也曾有过几次急于求成的情况，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 1952年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小冒进和中央的纠偏措施。

正如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所指出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后一种积极性，需要国家引导和发展。当时党中央认为，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摆脱贫困，迅速地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并使工业品得到畅销，提高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与互利的原则，提高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很快。广大翻身农民逐渐在互助合作的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说的

“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正确性，批判了认为“农民已能单独生产致富，劳动互助组应该自行解体”的错误观点，劳动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劳动互助合作的组织不断扩大。这从迅速增长的1951年和1952年组织起来的农户的数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1951年上半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体农户的比例和情况是：华北区55%。东北区70%。华东区：山东有70余万个互助组，皖北、皖南4个专区统计有5万余个互助组。西北区有16.7万余个互助组。中南区：河南41县有11.4万余个互助组，占全部劳力的40%—50%，湖北5个专区有5.2万余个互助组。西南区也开始组织。①

1952年上半年的情况则是：组织起来的农户，华北区占65%。东北区80%以上。华东区33%，比上年增加60%。西北区60%，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中南区：已组织互助组100万个。西南区：55万个。全国共有互助组600余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000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约占总农户40%左右，比1951年增加40%。②

从上述两组数字可以明显看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很快的。在这股发展热潮中，总的情况是健康的，而且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总结的成绩有三点：“第一，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第二，在春耕防旱及防治病虫害上获得了很大成效”。“第三，刚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组织起来解决了新翻身户缺乏耕畜农具和口粮的困难，保证了增产运动的顺利开展。”③

①、②分别见：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1951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2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

③《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79—80页。

但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的情况，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的思想上存在着“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和“宁多勿少，宁大勿小”的倾向，致使违反农民的心愿，违反中央规定的自愿、互利政策，盲目搞大社，过多地积累公共财产，发生了强迫命令等偏向。造成群众中思想混乱，生产上受损失，有的地方发生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如长治专区新建的千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76%是将牲口、农具等全部归社公有的，有的甚至连棺木寿材、老羊皮袄也归了社。”^①有的地方急于提高互助组，扩大公有财产，照顾社员利益不够，有的地方则一开始就露出冒进的苗头。中南有些地区对牲畜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实际上长期不付款，等于变相归公，群众说是“软共产”。^②

这种情况，在东北、华北等许多地区均有出现。

产生盲目发展的冒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据当时中南局关于召开全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议的报告所分析的，有三点：主要由于一部分干部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规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存在着不健康的互比工作条件，互不服气的情绪，不批准就自己偷偷干。其次则为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时，没有着重的讲清楚发展过程与条件，片面鼓吹好处，因而引起一部分积极分子与劳动模范为了争光荣而盲目带头。再次则以政府扶持过多，群众红眼，有为争扶持而组社的。^③这种分析，当然不会概括当时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

①《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盲目冒进偏向的指示》，1953年3月。

②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第344页。

③《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1953年3月14日。

缺点，但应该说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的。

1952年的小冒进，中央发现得比较及时，在吸收各地反映情况的基础上，中央为纠正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是：

第一，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计划指标。根据各大区所报的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的计划数字，“现在看来都嫌过高”。1953年3月8日，中央下达《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出：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求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这个指示还提出了在5年之内在不同地区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控制数字，并要求各大区将原定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与此同时，中央还转发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盲目冒进偏向的指示》、《河北省大名县委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错误的检讨》（摘要）、《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对纠正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等现象起了有力的作用。

第二，提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之服务的。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强调指出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现象是严重脱离农民群众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中央为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还于3月下达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

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并结合春耕生产来进行，凡是影响和障碍春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的任何工作，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甚至取消原来的计划。而“为正确地组织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会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将损害春耕生产工作，因此都是极有害的。”这个指示指出了急躁冒进倾向的各种具体表现，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农村中取消雇佣自由、借贷自由与贸易自由，企图完全排除富农发展的可能性，对发展生产是不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合作化运动只能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

第三，明确和重申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理论和路线。195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将1951年12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三篇文件汇编成一个小册子，由毛泽东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下发给各级党委，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①进一步明确化，从而保证使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思想水平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一步，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

由于中央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和切合实际，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倾向在1953年6月初就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2. 1954年秋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躁冒进和中共中央的“停、缩、发”方针。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120页。

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关于召开这个会议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其初建的一、二年，一般可增产20%——30%，往后还可每年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所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应该当作农村工作的中心，也应该当作生产运动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和发展互助合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这次农村工作会议还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7年计划发展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大约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

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大大发展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所规定的数字。例如，决议规定：“根据逐年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总农户数的20%左右。”^①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却将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130万个和35%。这种提高，并非基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而是人为地拔高指标，因而是加了速的。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半年以后，在10月份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将在4月间提出的1955年计划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30万个或35万个的数目，改为“在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央农村工作部并认为“这个计划是大致合适的，建议中央予以批准。”^②在实际工作中，合作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225页。

②同上书，第260页。

社的发展更快，到1955年春耕生产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已发展到65万个^①或67万个^②，超过了这个大大拔高了的预定数。

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方针指导下，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快过猛，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并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当时粮食统购统销中，国家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出现了出卖和屠宰牲畜的现象。耕畜数量的减少，对建国初期主要靠人力畜力耕作的农村生产力来说无疑是一次破坏。

对于当时农村出卖、宰杀耕畜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深刻的科学论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③

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速发展这个生产关系的转变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中央通知要求按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1）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者是超过了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

（2）离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发展。（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社的工作。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概括起来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在巩固中继续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

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64页。

②《凯歌行进的时期》第549页。

③引自《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第955页。

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①简称“停、缩、发”方针。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同意“停、缩、发”方针的。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汇报后，肯定了这一时期在农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并当场议定：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浙江、河北两省适当收缩一些，其他地区（主要指新区）适当发展一些。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发表谈话，也谈了“停、缩、发”方针问题。毛泽东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并说，不赞成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党内也有，各级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况的。②5月17日，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停、缩、发”的意见。毛泽东说：“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③

1955年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说，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停、缩、发”的方针后，合作社得到整顿、巩固。据1955年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编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原有67万

①《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1988年第5期。

②毛泽东1955年5月10日的谈话。

③《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331页。

个农业合作社，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主要收缩地区的省份是：浙江收缩15500个，河北收缩7000个，山东收缩4000个，其他省份均无大的变动。这样，全国合作社数量共减少了2万余个。①

在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后不久，毛泽东又单独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三分之一。邓子恢主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50%农户入社，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说，粮食已经到了界限，购粮任务是900亿斤，再多一点都不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三分之一，不要50%了。后来，毛泽东又向谭震林说，合作社到明年10月停止发展。②

贯彻执行“停、缩、发”方针的结果，巩固、整顿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3. 1955年夏季以后的急于求成和党中央的“反冒进”措施。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骤然加快，到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部提前结束，这里面有数种原因。

一是有急于求成思想的因素。二是原来的估计在合作化的实践中显得落后了，预定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合作化的设想，只是一种预见，事实证明不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合作化作为一种趋势就瓜熟蒂落了。三是农业合作化与手工业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相互促进，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相互影响，就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

急于求成当然是主要的。毛泽东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上。他后来是这样描绘1955年的形势的：“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

①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49页。

②《凯歌行进的时期》第552页。

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3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农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①毛泽东为推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在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撰写了104条按语，（其中有许多条体现的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可见其对此运动的全力以赴。

1955年5月9日，毛泽东约见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等，提出改变原来决定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即1957年年合作化完成三分之一的设想，1957年化个40%。认为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毛泽东还指出党内有一批干部代表了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

5月1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新解放区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合作社能迅速发展的条件是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的利益。这次讲话，也讲了“停、缩、发”方针，但强调的重点是那些后解放区和农业合作社还发展不够的地方要大力发展合作社的问题。

应该指出，这两次讲话，是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认为农业合作化又出现了冒进现象并且提出了毛泽东同意的“停、缩、发”方针的情况下发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出农业合作化在诸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湖北、云南的一些省份中，出现了冒进现象。邓子恢说“究竟有没有冒进现象呢？大家很怕‘冒进’这两个字。当然‘冒进’这个大帽子是难戴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

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页。

什么叫冒进，首先弄清这一点。主席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时说，超过了实际可能就是‘左’，就是冒进。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实际不能做这样多，你搞了这样多，超过了实际可能，这就是冒进。”^①会议认为冒进的原因一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二是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在会议反对急躁冒进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却提出了更为冒进的意见。而且，毛泽东还对各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具体数字提出了明确要求：“发展合作社，河南7万，湖北4.5万，湖南4.5万，广东4.5万，广西3.5万，江西3.5万，江苏6.5万，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②

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有一部分人（据柯庆施说约有30%）是反对合作化的，他们代表了农民“要自由”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绪，因此，体现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实际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基于推进原本已经加速了的合作化的速度，毛泽东1955年7月29日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整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1）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越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

①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36页。

②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2) (略)

(3) 要有坚定不移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视，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自己的方向。

接着，在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众所周知的批“小脚女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和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应该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报告批评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①

其后，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下了一系列指示，催动合作化的加速进行。例如，8月13日，他以中央名义给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拍发的电报中说，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②8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

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②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1955年8月13日。

一份指示中说：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如此等等。使农业合作化急剧升温。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骤增到农户总数的96.3%，其中高级社占87.3%。1957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又增至97.5%，其中有96.2%是高级社。^②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26年之后，即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中所指出的“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的历史结论的原因，也就造成了其后数十年内急于求成症结的起点。

这一次的急于求成及其造成的后果，在1956年上半年就表现出来。党中央及时采取了反冒进的措施。周恩来、陈云根据当时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急躁冒进情绪的事实，提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6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一个反急躁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指出：现在全国已有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在一些工作中“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

①中共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1955年8月16日。

②薛暮桥《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红旗》杂志1987年第17期。

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①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反冒进”的代表作。这篇社论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过、修改过，但是毛泽东在收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

“不看了”。^②

显然，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的。事实上反冒进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倒是不久便被反反冒进所代替。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自此，急于求成的思想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四、现在如何看待50年代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完成了建国初期头3年的主要任务，即肃清国民党残余，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完成土地改革和扫清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三大改造。

（一）对于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不可能从西方取得贷款

^①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载《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和资金援助，帝国主义的决策者正企望“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在经济领域中产生”。^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也是有限的。而对包括个体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建设新中国的资金来源，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的资金矛盾，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这恐怕是中外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就评价了三大改造。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②

党的八大全面肯定了农业合作化所取得的胜利，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的第二部分专门谈了社会主义改造，肯定了农业合作化把全国1.1亿农户组织成为100万个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宣告：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③消灭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和在几亿人口的国度里实行社会主义的崭新制度，难道还有比这更辉煌的胜利吗？

①《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827页。转引自《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第84页。

②《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第523—524页。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肯定了我国50年代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①

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毛泽东的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两翼的设想逐步得到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取得了农村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已经无须用更多的数字来描绘和阐述，单是1956年，农业生产的大踏步前进，使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比1950年增长近10倍这一事实，已足堪说明一切。所以建国头7年，尤其是实现三大改造的后4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②这决非虚言。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教训及其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原先规划的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到只用了4年时间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飞跃”的产生，始于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促进”的报告不切实际地、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了正常发展合作化的速度是“小脚女人”；批判了整顿合作社是一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在毛泽东的这个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②薛暮桥：《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红旗》1987年第17期。

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行，始终认为是正确的。他认为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同年10月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还批判了十三种“错误观点”，并指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直到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还就合作化速度问题说：“从1950年起，到1955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些同志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了富裕中农想“冒尖”的心理。他们认为合作社可以搞，但是要慢一些。经过批判，很多同志已经转过来，积极赞成合作社。”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于求成，与其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中不时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的。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中国近百年落后挨打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领导着“重新站起来了”的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改变外国人“看不起我们”②的情况，需要尽快地使中国工业化和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否则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种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对于肩负着民族解放和领导人民建设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然而，对于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于提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够，因而认识脱离了实

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一）第45页。

②毛泽东1958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际。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艰辛的努力。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结果，反而减缓了应有的速度，事实已经这样教训了我们。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成熟的答案可以参考，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走一些弯路。问题是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过急于求成的同样的教训，以及在我国为什么急于求成的毛病一犯再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分析，这也许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比较集中和计划经济有关。由于中央领导人的意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速度起着密切关联的作用，一旦指导思想上的操之过急或发生“左”的偏差，就易于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急于求成。

第三，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不够。急于求成的思想一般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寄予过高的期望，而对客观规律掌握和尊重不够，在一些时候，我们党往往过于强调意志的力量。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个屡试不爽的准则也许会使人聪明一些。

第四，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过高的个人威望，也是1955年夏季之后农业合作化急于求成的原因之一。这是不难理解的。毛泽东作为人民革命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和胜利的象征。他在1955年夏季批判“小脚女人”和要求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讲话，使全中国人民深信不疑，对于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连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认为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的这个基本教

^①刘少奇：1953年5月5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训，现在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了。回过头来看，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稳步前进是因为：首先，要考虑到农民的两个积极性，既要考虑到农民在土改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农民小私有者的现状和走个人发展道路的积极性，此种积极性尤为强烈。其次，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办事。农业合作化是农民群众自己的运动，关系到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农民的教育问题，这与土地改革不同，更与建国前的战斗动员不同，不能光靠轰轰烈烈，一哄而起。再次，农业合作化要与国家工业化的实际相配合，步调相一致，也要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相结合，稳步前进。当然，这也只能当作教训来总结和分析。

五、怎样看待三中全会后农村中实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所有制性质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在1978年末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解放思想，提出的改革措施。这一措施改变了干活大呼隆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办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所有制性质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包括联产到户、包产包户、包干到户等形式，与农业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没有什么区别，是独立的个体经营。因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的解体，并以此来推论建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基本上是失败的”，“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起着伤害农民的积极性

性，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①总之，农业合作化没有必要。

事实证明上述这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它不符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恰恰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集体化在新时期的发展，这种责任制是合作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性质。

第一，党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明确规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1982年党中央的一号文件明确无误地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所以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②为消除一些人的误解，党中央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次解释。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这个问题继续指出：对包干到户责任制来讲，就是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在其中，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③其后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大纲

①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1988年10月20日。

②转引自《求是》杂志1990年第16期文章，第30—31页。

③转引自张路雄：《评目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分歧》。

中，多次反复明确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性质的规定性。1987年党中央的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中央业已反复阐明了的问题，本来是不应该存在那么多的误解的。

第二，从理论上讲，当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非小农个体经济，决非私有经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与集体化前的小农经济是不一样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也适应现阶段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状况和思想水平，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是不言而喻的。那种认为集体统一经营的经济是集体经济、家庭分散经营的经济是个体经济的观念应当改变。这是因为：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是一种集体经济，主要生产资料如土地、水利设施等仍是公有的，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改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称上看，我们也可明确得知，是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承包。事实上，承包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向集体交纳土地承包款，每亩若干元，依各地情况而定。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实行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分配方式也相应地改变了，农民“交够了国家的”（本来由集体交公粮）。

“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方式更适应现阶段农民的特点，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为农民所称道、所拥护。再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集体经济的一份子，不是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与农业合作化前的个体小农经济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与集体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他们除了在经营方式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外，其余均得服从集体经济的支配和领导。比如使用土地、水利设施、大型农业机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每年要为集体水利建设出工，以及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归组所有，

集体管理，有偿使用等等，都是由集体经济规划和组织实施的。

第三，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实际来看，也可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集体统一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生产责任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9年，我国3.2亿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即农业劳动者中，有3.1亿是集体经济领域的劳动者，这也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确立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经济共处这个主体地位的客观必然性决定的。此外，从集体经济的发展来看，1983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1631.9亿元，其中，集体统一经营部分和家庭经营部分分别占50.9%和49.1%。1984年全国农村已经有95%以上的基本核算单位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断发展，到1988年时这个比例应为更大，但是这年的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3042.8亿元中，集体经营部分和家庭经营部分的比例变为54%和46%。^①可见，集体统一经营部分增长速度快于家庭经营部分，说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增长与发展，两者也是一致的。因此，从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公社、大队、生产队），改革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经营管理，强化了农民的劳动责任心和自主权，刺激了生产积极性，是当前行之有效的、适合国情的基本经营制度，要稳定、巩固、完善，而不是削弱。

综上所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我国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伟大创造。它使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越走越宽广，毛泽东的合作化理论更趋完善了。

^①参见陆学艺：《巩固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手工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一样，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无庸讳言，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出现过缺点和偏差，也出现过一时的失误，但这并不占主要地位，手工业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也确实说明了这“四过”问题是存在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造成的，而是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才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是“三大改造”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和研究，对于手工业改造经验的传播和失误的分析，却是那样的不够，一些介绍和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文章和书籍，居然对手工业改造一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以致于人们往往忽略了手工业这“一大改造”。这种情况，对于建国初期拥有二千万手工业劳动者，对于建国初期手工业总产值相当于工业总产值31%的格局，应该说不相适应的，是十分不够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里准备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手工业改造的形式、步骤和特点，关于手工业改造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如何看待手工业改造的成绩和不足，当时是怎样提出改进措施的，以及怎样认识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论述等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作略为详尽的回顾和介绍，以期对手工业改造的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一、我国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地位和作用

科学意义上的手工业，应当包含三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内容，即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手工业，生产小商品的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我国在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工业是指的哪一类手工业呢？我理解，主要地是指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其次也包括了一部分依附于农业自然经济的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有其一般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手工操作为主，能容纳比较多的劳动力；小巧灵活，能适应人民群众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需要，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行业复杂，品种繁

多；许多手工行业有季节性。

中国是一个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的国家，由于机器工业发展历史比较短，非常薄弱，而手工业生产则历史悠久，高度发展，这在建国初期更为明显。因此，我国的手工业生产便有着除手工业生产的一般特点之外的鲜明特点：

第一，我国手工业生产历史久远。据考证，我国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出土的青铜器，便已具有高超的造型艺术，刻有精致美观的花纹，表现了我国古代十分发达的手工业技术。我国手工业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技术享誉世界。

第二，我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之多，也为世界之冠。建国初期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约有800万人，加上为渔业、盐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的和兼营农业的手工业者，共约2000万人。

第三，手工业分布面广，手工业产品精工制作。我国各地均有手工业，其中城市手工业约占 $1/3$ ，农村手工业约占 $2/3$ 。许多手工行业还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具有传统的生产技术。如苏州的刺绣，景德镇的瓷器等等，千百年来就驰名世界，英文中的“瓷器”（china）和“中国”为同一词，可见中国的瓷器对世人影响之大。

第四，我国手工业者素有勤俭经营的优良传统。

第五，我国手工业门类众多。从大的方面说，有制造业、修理业和服务业等方面。至于从小的行业说，则差不多涉及各行各业。据全国手工业管理部门统计，总计在千类以上，品种则达数万种。

朱德在谈到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要长期存在下去问题时曾这样指出过手工业的“许多特点：首先，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能利用当地原料与大工厂的废料。中国物资丰富，当地的原料是很多的，如藤子、竹子、条子、苇子、木材、丝麻等，大工厂的废料

也是很多的，如废钢废铁、破衣烂布等。这些东西，一经手工业者制造或加工之后，就变为很有用的物品，不仅供给了本地的需要，有的还可以出口。其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大机器工业所不能代替的技术，特别是一些传统的、特种的工艺品，如雕刻、刺绣等，是不能完全由机器生产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当地需要的，它可以节省很多运费；同时它又是与农民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它不仅供给了农民的必需品，而且换回了粮食与原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失业问题。”^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自然是与手工业生产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朱德也是把两者联系起来论述的。

总之，如果把大工业比作正规军，那手工业就是到处出没不定的游击队。它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分析了我国手工业生产的特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建国初期，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当时农民所使用的工业品，大部分是手工业生产的，由大机器生产的还是少部分。统计资料表明，手工业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农民所需量的60—80%左右，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仅占20—40%左右。朱德在1953年12月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曾这样评述手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因此，把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有计划地指导他们的生产，提高生产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会起很大作用”。所以，要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②

①《朱德选集》第323—324页。

②《朱德选集》第321页。

建国初期，由于现代工业产品的不足，手工业成为供应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种重要经济力量。在大城市的工业中手工业占有一定的比例，小城市和县以下的工业则几乎全部是手工业。据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手工业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六个方面：供应广大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从事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加工，并为国营大工业的配件修理和小型制造服务；在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为国家培养技术工人，是国营工业技术后备的重要源泉；供应城市居民日用品和提供修理服务；制造各种工艺美术品，供应国内外市场和解决就业。总之，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1957年12月举行的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朱德评价：“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业，是要永远保存和发展的。

对于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对手工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朱德对手工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评价，表示了我们党对手工业的重视。具体地说，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1. 为工业生产服务。手工业是机器大工业的伙伴和助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许多零件配件，是由手工业生产与提供的。这种情况，不但在建国初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长历史时期，恐怕都难以有本质的改变。不但在我国如此，在其他国家，甚至生产力非常发达的国家，大工业也需要手工业作助手。

2. 为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服务。手工业在基本建设中的作用就更为巨大，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基本建设工程的施工，以及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中各种工具的生产，都离不开手工业。

者的劳动。此外，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这两支劳动大军，其成员很多本来就是独立的手工业者。

3.为农业生产服务。从建国初期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基本上是手工业者所生产的。锄、犁、耙、镐、铲、锹、水车、手推车等等，无一不是手工业劳动者的产品。这种状况，从全国来说，肯定还要维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4.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生活中须臾离不开手工业产品。50年代，手工业产品占农村商品供应量的70—80%^①，据1954年调查，全国个体手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是：棉布2600万匹、1173万匹；毛巾724万打、393万打；袜子986万打、500万打；皮鞋525万双、168万双。其余如苇席、土纸、土布、夏布、布鞋、丝绸、糖、日用陶瓷、木制家具、帽子等等，均是很大一部分为手工业者所生产。

另外，手工业为商业服务的情况也很普遍。据统计，建国以前上海有1700户手工业者为永安公司服务。因此，丰富的手工业品还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

5.为出口服务。手工业品在建国初期的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别是工艺美术品和特种行业如景泰兰、陶瓷、漆器、地毯、刺绣、抽花、丝绸、草编品等等，至今仍不失为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6.为解决劳动力就业服务。由于手工业产品需要量大，分布面广，而由于手工操作不可能创造太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手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就特别低，容纳的活劳动数量大，物化劳动少，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7.为国家积累部分建设资金。我国手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

①邓洁：《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

济中的比重, 1952年相当于全部工业生产总值的31%, ①1954年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0.1%, 相当于工业总产值的20.13%, 1955年则分别为9.2%、18.44%, ②1956年, 这两个数字变为9.1%、16.6%③。1950年到1956年, 我国工艺美术品出口总额3亿3千多万元。手工业生产在为国家创汇、积累资金上起了重要作用。

8. 为地方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基础。这在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显得特别清楚。合作化后的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了地方工业。

9. 培养熟练工人。手工业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替国家培养很多熟练工人, 输送技术熟练的工人到国家的工厂、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中去。

一句话, 高度发达的我国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 忽视手工业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这个地位和作用, 是由建国初期我国现代工业极不发达的国情所决定的, 也是由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影响所决定的。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这个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召集的重要会议指出, 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它分散的、个体的性质。但“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①1954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积极领导手工业者走合作道路》。

②邓洁:《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

③朱德:《发展手工业生产, 满足人民需要》, 1957年12月16日。

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①因此，把个体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就是“一化三改造”的重大任务和目标之一。

同时，列宁的合作制理论，无疑是手工业改造的思想理论指导。列宁曾经把手工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手工业小商品生产者；第二类：为消费者劳动的代客加工工人；第三类：为包销商人和工厂主劳动的家内手工业者。他并且指出：不能不希望一切研究所谓手工业的人严格遵守这个划分并使用确切的政治经济学术语，而不要在日常用语之下作任意的理解。^②手工业必须合作化，当然这是列宁合作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9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

^②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织消费合作社。”^①

建国以后，手工业合作组织逐步得到发展，到1950年底，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26万人。1953年党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普遍的发展，到1953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4700多个，社员（组）员达到32万多人。

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党的八大进一步指出和概括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页。

地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1955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9%。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他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①手工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已为尔后的实践所切实证明，这是本篇文章后面还要加以专门论述的。

手工业者，根据当时政务院的规定，对手工业者阶级成分的划分如下：

1.小手工业者。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以其产品出卖，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小手工业者，或独立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一般不雇佣工人，有时雇佣辅助性质的助手和学徒，但仍以本人的手工业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这种小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和中农相似。

2.手工业资本家。占有多种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雇佣工人和学徒以进行手工业生产，取得利润，作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手工业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只雇佣辅

^①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

助自己劳动的助手和学徒，而手工业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学徒则不是为了辅助他自己劳动，而是为了获得利润。这是小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资本家的主要区分。

3.手工工人。完全没有生产资料，或者只有很少的手工具，向消费者，或向手工业资本家，或向小手工业者出卖劳动力，为雇主从事手工业生产，领取工资，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手工工人。手工工人的社会地位，与工人、雇农同。

由于手工业的性质与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密切不可分割，所以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有的与农业的合作化同步进行，例如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其中从业人员的收入仍以农业为主的，这些手工业就以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手工业工场雇佣较多的工人，（根据当时的规定是10人以上）产值也比较高的，则划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行列。因此，属于手工业管理机构负责进行手工业改造范围的手工业，当时确定为以下五个部分：①

1.个体手工业。据1954年秋冬普查结果，全国共有从业人员672万余人（不包括渔、盐、运输、砍伐、屠宰业的从业人员）。加上组织起来的，共为785万余人。这些纯系商品性手工业生产，并完全以此为生，因而必须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手工业改造的主要对象。

2.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全国从业人员估计约1000万人上下，其中专业的、地区集中的、技术性较高的，已基本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这些应通过手工业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兼营农业部分，可在手工业

①白如冰：在全国省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手工业生产联社主任汇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5年7月8日。

生产联社领导下，在手工业生产社中设立农业生产小组。至于非商品性的农副业，或虽系商品生产，但由于有分散零星、技艺落后、其从业人员的收入仍以农业为主，如农民兼碾米、磨粉、酿酒、榨油、制糖、轧花等，这些应在农业部门领导下，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生产社中设立手工业生产小组。以上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小组，应分别计算盈亏，手工业与农业部门并相互给予专业上的技术指导。凡农民兼营的季节性手工业生产或农业收入和手工业收入相差不多者，手工业和农业可以分别组社，社员可以跨社。

3. 雇佣10人以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业人员约54万余人。这部分原则上由手工业管理部门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这一工作非常复杂，我们又没有经验，因此，下半年内，以手工业管理部门为主，结合当地地方工业部门，在大城市中选点试办，总结经验后，再确定走合作化道路抑或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4. 一切日用品修理业（如修理钟表、收音机、自行车、电灯、钢笔、皮鞋等）以及手艺性大，并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服务性行业（如洗染、织补、理发、照像、刻字、油漆、广告、画像等）。目前无详细统计。这些行业应通过手工业合作化进行改造。凡利用资金、设备获取利润的性质较大，而手艺、加工性较小的行业（如澡堂、旅馆、饮食等），建议由商业部门负责改造。

5. 建筑修葺（如泥水、瓦木等），在农村者多系农民兼营，建议由农业部门负责改造；在城市中有国营建筑公司者，建议由国营建筑公司负责组织；无建筑公司者，尤其是小城镇，由手工业部门负责管理和改造。

以上出卖本身产品的手工业者，虽有门市，亦属手工业改造的范围。

因此，根据马列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和我国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我们党采取了通过走合作化道路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手工业者逐渐组织到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中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手工业改造既是三大改造的其中之一，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手工业一经组织起来，便于从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便于从手工操作发展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因此，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与步骤。就全国来说，一般分以下三个步骤：^①

一、手工业生产小组。这是手工业改造的初级形式，也是手工业劳动者开始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个体手工业者通过由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供给原料、推销产品的加工订货方式组织起来。这种形式既使手工业劳动者避免受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剥削，又便于进一步对手工业实行改造。手工业生产小组没有改变原有生产关系，仍然是分散生产、自己经营、自负盈亏。也有一小部分手工业生产小组，实行工具入股公有，集中生产，收入部分按劳分配或全部按劳分配，这实际上已逐步过渡到它的高级形式，不过名称仍没有改变而已。手工业生产小组由于与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发生经营关系，获得扶持，因此生产获得稳定发展。

二、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这是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由若干手工业生产小组或许多个体手工业者联合组成的，是为着解决采购原料的共同困难、达到推销成品的一致要求而组织起来的，也有由供销或消费

^①邓洁：《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的报告》。

合作社通过供销业务，发原料、收成品，以加工订货方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起着组织业务指导生产的作用，它有生产管理上的统一性。它统一向国营企业或供销、消费合作社购买原料，推销产品，统一承揽加工订货任务，生产工具部分公有，也以业务经营中的积累购置公有的生产工具，进行部分的集中生产。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领导着若干手工业生产小组，而这些已经成为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又分为四类形式：第一类，社员直接领原料交成品，分散生产；第二类，组长统一领原料交成品，分散生产；第三类，生产过程的部分环节开始集中，其余环节仍然分散生产；第四类，小组内实行简单的分工协作。^①因此，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内，有多种情况，合作化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在于能有效地克服小生产者的困难，能逐步以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来代替雇主与雇工的关系。

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其中因生产关系和生产工具的公有化程度的不同，又分为半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计划指导生产，实行统一经济核算，大多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中生产，生产资料归社员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凡这样做了的，当时称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部分半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则生产资料部分集体所有，工具入股分红，统一经营，收益之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

除上述这三种合作化形式外，还有一些手工业者自己相互联

^①邓洁：《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

营的，还有一些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资本家联营的。对于这些联营的形式，在手工业改造的后期，一般地都使联营者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手工业资本家则走了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步骤，是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手工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诸如从供销入手，“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上而下地发动，采用说服、示范、国家援助的方法，启发和帮助手工业劳动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逐步组织起来，等等，也都是在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逐步实行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是：

1. 典型试办阶段。时间为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一样，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准备条件。

第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在手工业失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中组织起来的。“以革命积极性最高的手工业失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为主体，选择同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棉织、针织、服装鞋帽、铁木农具、建筑材料、木材加工、食品加工、造纸等行业为重点，组织了第一批手工业合作社。其中最著名的有从《三把斧头》起家的上海市铁床合作社、从《破铜烂盆熬糖》起家的北京市第一食品合作社、由24名木杆秤工人组织起来的武汉市度量衡生产合作社，和由217户红炉手工业炉主组织起来的山东省潍坊市新胜红炉合作社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手工业合作社的旗帜和骨干。同时，对于一般的个体手工业户，还从供销入手，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组织了大量的加工订货小组。国家商业部门对这些小组，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通过供销业务，组织生产。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个体手工业者逐步克服供销困难，摆脱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控制和剥削，而

且有利于国家掌握货源，稳定市场，扶助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并为进一步实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①在这一阶段，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由1949年的300多个发展到1952年的2700多个，社员则有8.8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是稳步前进的，是典型试办阶段，也是起始阶段。

2. 普遍发展阶段。时间为1953年—1955年上半年。1953年，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手工业改造正式摆上了议程。

在这段时间内，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包括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得到普遍发展。特别是在1953年11月20日到12月17日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之后，进一步为手工业合作化的普遍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召开这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时，刘少奇作了《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讲话，说明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为什么要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合作化的目的、组织对象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说明了集体经济要保持稳定的理由。朱德在会上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说明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个体手工业

①季龙：《我国手工业改造的基本情况》，《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

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朱德在这次讲话中是强调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①程子华在会上作了《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的报告，邓洁作了《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管理问题》，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发了《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对手工业改造的初步经验，明确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党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向各级党委发出《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地切实办好现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作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准备。还要求各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要求各地将手工业视为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手工业合作化的全面、普遍发展铺平了道路，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顺利发展。

3. 高潮阶段。时间为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痛批了“小脚女人”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掀起高潮，这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手工业建立合作社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二》里，为农业再有几年便可完成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兴高采烈，他说，农业合作化“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篇序

^①《朱德选集》第322页。

言里，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么一来，手工业的改造速度，就大踏步地向前跨进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点冒进。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社员数已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手工业基本上完成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变革。

对于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1、12月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还明确了以下6项建社原则：

- 1.本着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的原则，选择当地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建社。

- 2.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发扬社内民主。

- 3.建社要保存和发扬我国手工业生产的高级技术。我国特种手工艺品的高超技艺享誉世界，建社中要妥为发扬。

- 4.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加强生产管理。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社员收入。

- 5.注意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社员。

- 6.在生产不断增长和社员实际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逐渐增加公共积累，为手工业生产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创造条件。

除此之外，当时还规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工资和总收入，应不高于当地国营企业同业工人的工资。这些原则，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大都是正确的。这些既定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当然，规定合作社社员收入不能超过国营企业工人，就有点不顾经营效益的硬性指标式了，是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的。

三、手工业改造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

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全国手工业管理部门召开了五次重要的工作会议，对手工业改造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五次次会议是：

（一）全国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又称全国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1951年6月6日到6月26日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为：（1）明确组织与发展生产合作社和加工工厂的方针；（2）制订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及各级生产处（科）办事细则；（3）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制度，研究生产合作社的经济核算问题；（4）拟订发展生产合作社的计划。

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商讨了今后办好生产合作社的一些问题。

程子华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如下8点：（1）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走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走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是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具到半机械进而机械化，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2）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独立手工业者是革命阵营中可靠的同盟军。（3）生产合作社主要在中小城镇和农村进行组社，组织对象为手工业生产者，其组织形式应以供销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主，集体的生产合作社应视其具体条件来决定，不可勉强草率组成。必须认清供销社和集体的两种生产合作社形式是发展中的两个阶段，是由低级走上高级的发展过程。（4）生产合作社的工具公有，是巩固生产社和使生产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环节。（5）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主要

服务对象应为供销社和消费社。(6)合作社系统内生产部门(包括各级社加工工厂)原则上由各级合作社生产处(科)领导,但须由各级社理事会视其实际情况作具体决定。(7)生产合作社要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定额制度、生产责任制、技术管理制度、检查制度、民主集中制等。(8)做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整社和建社工作。

会议开了三星期,6月26日胜利闭幕。薄一波、程子华给刘少奇并中央写了《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报告》。

(二)全国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也称全国合作社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1952年8月25日到9月5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1)总结经验,推广典型,明确方针,确定任务。(2)建立生产合作社联合社。(3)修正生产合作社章程,拟订生产联合社章程草案。(4)确定1952年增产节约计划和1953年组织发展计划。

会议决定:1953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要在1952年的基础上,发展社员100%,生产总值增加145%。

会议为了交流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进行了18个不同生产社的典型报告。还进行了各种专业小组会议,如加工工厂小组会,渔业小组会,产销结合问题会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还作了《轻工业中的手工业》的报告,指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须从现实出发,想立刻搞大工业机械化生产是脱离实际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前途方向应:(1)与国营企业相结合,主要是供给工业原料,其次是代替机制工厂加工,为国营工厂制造零件等。(2)为基本建设服务,主要为木材、砖、瓦、砂石、石灰、家具、小五金等行业。

(三)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1953年11月20日到12月17日召开。这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据中华全国合

作社联合总社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称，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1.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现代工业产品的不足，手工业是供应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

2.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后的4年多以来，城乡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有了大的发展。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均已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优越性：克服个体手工业者在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上的困难，能常年地连续生产；可以逐步改进落后的生产技术，实行生产上的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公共积累，为进一步改善技术装备和劳动条件准备物质基础；增强了手工业生产的计划性，便于把手工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更便于通过供销合作社或直接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订立结合合同，使产品规格、质量更能适合农业的需要；有利于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打破技术的保守性；有利于对手工业者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3、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手工业者要求组织起来的积极性是更加高涨了，国家对手工业增产的需要也更为迫切。为此，要求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首先以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和集镇为重点，依据群众的自愿，也就是依据当时当地群众的觉悟水平，采用多种多样的适合手工业特点的过渡形式，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逐步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高级形式。

确定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形式为：（1）手工业生产小组，是广泛组织手工业劳动者的一种低级形式，也是手工业劳动者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2）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是由若干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或几个手工业生产小组为解决原料采购和产品推销

的共同困难而组织起来的。(3)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里面也分两种,一部分为主要生产资料已完全为社员集体所有,实行了按劳分配,这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一部分为主要生产资料尚未完全成为集体所有,实行工具入股分红,统一经营,收益之一部采取按劳分配,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

4.为贯彻总路线,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根据当地手工业的具体情况,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手工业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采用群众所能接受的组织形式,由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必须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大求多,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停步不前。

会议提出了办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

5.为促进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议一切国营经济部门,供销、消费合作社,工会系统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必要的援助。

6.在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化的同时,必须认清个体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目前仍占居绝对优势,加强对广大的个体手工业者的领导,对于发展手工业生产,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

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过程中,刘少奇听取了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作了《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指示,朱德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程子华作了题为《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的总结报告,邓洁作了《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管理问题》的报告。这些指示与报告,就手工业生产的地位、作用、重要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手工业为什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步骤、形式、方法,手工业改造的初步经验,以及手工业生产的概况,管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心环

节，产销结合问题，合作社内部分配问题等，都作了明确的决定，作了清楚的说明。

中共中央特向全党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指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报告中所提发展计划和各项意见，是正确的，希望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布置执行，希望各地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指示说，联合总社的报告分析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总结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形式和初步经验，提出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这都是很好的。指示要求各地切实办好现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作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准备。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补充国营大工业生产的不足，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应引起全党重视。指示还要求国营经济中各个有关部门，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全国工会系统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必要的援助，并采取具体措施，有效地协助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指示是1954年6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的。

（四）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1954年12月8日到1955年1月6日召开。会议总结了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确定了1955年的任务，讨论了基层社的社章草案，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向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将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概括为7点：

1. 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具有相当成绩。至1954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供销

生产小组达41000多个,比1953年约增加8倍多,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113万多人,比1953年约增加2.7倍。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总产值比1953年增加1.1倍左右。

2.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应该而且必须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密切联系起来考虑,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手工业生产的方向,应面对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为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及国家工业建设和出口需要服务。要做到手工业和大工业按行业统一安排、手工业和农副业统一安排、地区之间产销统一安排、现有手工业者和非手工业者劳动就业统一安排、手工业同行业中,组织起来和未组织起来的统一安排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3.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上应当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应当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实践证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作出的这些决定是正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有的生产合作组织不够健全,因此整顿和巩固现有社,还是一个重要的繁重的任务。

4.关于手工业和农副业、工商业的分工管理和几个政策性的问题。(1)手工业改造的对象是“独立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独立手工业者约900万人左右(城市家庭手工在外),农业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生产的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左右,受雇于10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资本家的手工业工人约100余万人。改造重点是独立手工业者。(2)关于在手工业改造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以不提“依靠手工业工人,团结独立劳动者”为好,引导手工业劳动者在自愿原则下,逐步改变个体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并根据需要与可能改变小生产为大生产,这就是工人阶级

的阶级路线。(3)关于农村副业和农业兼营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业的领导关系问题。建议一般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领导,但应贯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并最好各计收入、盈亏,以保证从业人员的积极性。(4)关于雇佣3人以上10人以下的工厂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问题,由手工业联社负责。(5)关于手工业生产联社的供销业务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关系问题。(6)关于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的组织领导问题。

5.1955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把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继续摸清楚;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发展新社。

6.督促还没有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各省、市、地、县迅速建立联社等机构。

7.要有计划地派遣、选择和培养、训练手工业改造管理干部,包括会计、计划、统计、生产、技术等各种业务干部,以适应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在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朱德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报告,指出:国家要大力扶植手工业;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在合作社内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应该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手工业合作社要依靠群众去办,不要少数人包办。干部要从下面培养出来,从劳动生产中锻炼出来。^①

陈云关于《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讲话,是在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说的,参加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代表也听取了这一报告。报告对手工业改造提出如下意见:“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是一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

^①《朱德选集》第334页。

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地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这种情况在工业和商业中都发生过，比如在商业中曾发生过批购户排挤非批购户的情况。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①

在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邓洁作了《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总结和1955年的任务》的总结报告，国家统计局王思华作了《关于手工业调查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五）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1955年12月21日到28日召开。会议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基本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思想，提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规定了规划的内容、办法以及按全行业改造和分期分批分片建社的方法，规定了发展、整顿和巩固与技术改造相结合的建社原则，有重点地组织和逐行逐业分批改造的方法步骤。

白如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的报告》，提出：

（一）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与此相适应。几年来的手工业改造工作，是取得了相当成绩的，这为手工业合作化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议及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的精神，来检查手工业合作化工作，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远远落后于群众的要求。这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严重情况是和我们在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分不开的。其原因首先是对总路线的实质认识不够，对“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

^①《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269—270页。

方针领会不全不透，因而在贯彻执行中表现为摇摆不定。其次是我们对广大手工业劳动者，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手工业者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于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给手工业改造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认识不清；对手工业行业中暂时的供产销困难摸不到底，缺乏积极的措施，致使相当多的干部怕组织起来后背上供产销困难的包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发展，也不敢积极过渡。

（二）必须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加速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发展合作组织，改造技术，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充分发挥手工业对国营工业的助手作用，以适应城乡人民生产上和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为此，提出了以下5点措施：

1. 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必须与国家工业化，与国家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计划在1956、1957两年以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到1957年要求生产合作社社员占全部社（组）员的90%以上。

2. 在发展合作化的基础上，必须积极进行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从根本上改变手工业生产的落后状态。

3. 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保证生产合作社高于供销生产社和小组，更高于个体户；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高于手工操作的合作社。

4. 对手工业的17个主要行业进行规划。这17个行业是：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业、棉纺织业、针织业、缝纫业、食品工业、造纸业、日用陶瓷业、建筑材料业、皮革业（包括制革及皮革制品业）、煤炭开采业、铁矿开采及冶炼业、化学矿开采和化学加工业、竹藤棕草软木制品业、文化教育科学用品业、特种手工艺品、修理业。

5、作好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财务规划。

(三) 在全面规划中，必须根据有利于改造，有利于生产的原则，明确划分改造的范围，确定改造的方针和政策，这是由于手工业分散、面广、行业复杂、社会经济性性质不同的特点决定的。分5种情况：

1. 不雇佣工人或虽雇佣工人而不超过3人的个体手工业，其改造的根本方向是走合作化道路。全国约有880余万人。

2. 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可根据本人劳动收入以手工业为主农业为辅，手工业农业收入接近，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等几种情况，分别由手工业部门、跨社、农业部门改造。全国这种情况有1000余万人。

3. 雇佣工人4—9人的私营小型工业，应当通过公私合营进行改造。全国约有54万人。

4. 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业，凡以制造产品为主的，应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凡以贩卖商品为主的，则应划为商业部门改造。

5. 服务性的行业，凡利用资金、设备获取利润而工艺性较小的行业，划归商业部门改造，凡工艺性较大商业性较小的行业，原则上由手工业部门改造。

(四) 1956年必须新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组)员460余万人，较现有社(组)员总数增加2倍以上。具体措施也有6项。

1. 加强领导。包括：

(1)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文件，批判和克服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2) 加强检查工作，转变领导作风。(3) 树立典型，推动工作。(4) 健全、充实、加强手工业管理领导机构。(5) 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2 订出全省(市)、全专区(市)、全县(市)、全区(以

集镇为中心)的和全乡手工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

3.为了适应大发展的要求,克服过去零打碎敲的建社方法,必须采取全行业改造和分期、分批、分片的建社方法。

4.有了规划,就要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去执行,否则就会落空。需补充、培训、选拔干部。

5.应该切实贯彻“勤俭办社的精神,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并逐步实现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

6.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

在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还起草了《关于十七个主要行业的初步规划的说明(初稿)》,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关于雇佣10人以下4人以上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问题提纲》,作为会议讨论文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会议讨论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基层社示范章程(草案)》(会议讨论稿)、《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组织通则(草案)》、《手工业加工订货管理暂行办法(草案)》(会议讨论稿)等。

中共中央批准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95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开展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四、如何看待手工业改造的成绩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从当时看还是现在回顾,都应该说是取得了伟大成绩的,它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一个历史功绩。具体地说,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后,大量的手工业合作社转为手工业联社经营的合作工厂或被扩建为地方工业的工厂,也有的直接

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地方工业，有轻工业机械厂、纺织厂、服装厂、皮鞋厂、建筑公司、陶瓷厂等等。这样，有力地壮大了地方工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则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力量。“全国有几千个现代化工厂，都是些落后的手工业合作社经过三年五载苦战而发展起来的”。①这对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门类不全的情况，对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是有好处的。

第二，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据1955年的统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平均年产值是1970元，比个体手工业者的平均年产值1060元高出85%。如包括手工业生产小组在内，那么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的成员人均年产值为1357元，也比个体的高28%。1956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总产值达76亿元，提前一年超额60%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的总产值指标。②

第三，改进了生产技术。由于合作化后，生产上实行分工协作，改进技术、改进装备就有了可能。手工业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接收和利用了国家多余的或者替换下来的机器、设备，发展了一批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生产合作社，而这是当时的个体手工业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难以做到的。

第四，增加了手工业者的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断增加，社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较快的提高。据当时统计，1956年，新社员与入社以前比较，老社员与1955年比较，有90%增加了劳动收入。

第五，扩大了劳动就业。在手工业合作组织成立以前，许多

①程子华：《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②邓洁：《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

手工业者由于或缺乏资金、或缺乏生产资料、或购销渠道不畅通等诸种原因，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需要国家救济。手工业合作社组织吸收了这些人就业，帮助了国家解决劳动力的安排问题。而且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吸收了许多新的劳动力入社。

此外，在培养手工业生产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部分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打破技术的保守性，增加手工业者的相互学习机会、提高手工业者的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任何时候也不容抹煞的。无论怎么“反思”，怎么“再认识”，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五、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

1956年提出的解决措施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起初步伐是稳定的，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在农业合作化批判了“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也跟着加快。1955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9%，^①而到1956年6月底为止，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②。产生了不顾手工业分散灵活、能适应群众不同要求和市场变化的特点，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的情况，并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发展大社，使组织形式不适应需要，生产管理也跟不上去。在

①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0页。1956年9月15日。

②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城市中，有的一个社跨几个区。有的全县一个行业就是一个社。黑龙江穆稜县钟表修理、刻字是一个合作社，有一个服务点与社相距120里，主任检查工作要乘火车去。南宁市修理行业撤点并大社后，亭子镇群众的自行车坏了要用船运到南宁市去修理。①手工业生产点和修理点的撤消合并，使人民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不便。

此外，有些手工业户因为等待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就不接受商店的零散订货了，原来存在于手工业、商业之间的赊销关系也停止了，因而形成一时的供产销脱节现象。手工产品减少品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但是手工业改造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集中过多、社过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就针对性地拿出了处理意见。陈云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就明确地指出：“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是一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地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这种情况在工业中和商业中都发生过，比如在商业中曾发生过批购户排挤非批购户的情况。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②

刘少奇在1956年1月3日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时说：手工业多留些，组织还是要组织，但可以分散生产。要避免谢苗诺夫所说的手工业全部合作化所犯的错误。③1月10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指出：特种手工艺品不要组织合并，

①邓洁：《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

②《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269页。

③刘少奇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的插话（姚依林整理），1956年1月3日。

怕合并以后将来人民会感到不方便，特种手工艺品会降低质量。并说挑担子卖的小商小贩也不合并。^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其中有关手工业的地方，他指出：完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改造的时间，可能也应该比对农业的改造稍快些。在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手工业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有些特种手工业和手工艺行业可以允许单干。手工业大部分产品应该自产自销，不要统购包销。但是，要尽可能把手工业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首先是纳入地方工业计划之内。

2月8日，国务院召开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决定》认为，从本年1月份起，许多城市为加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采取一次批准全业合作化的办法。由于时间过于匆促，来不及进行有关供、产、销的安排和企业改造等多项工作，从而出现了供产销脱节的现象。例如，有些手工业户因为等待生产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就不再接受商店的零散定货了，原来存在于工业、手工业、商业之间的赊销关系也停止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作出八条决定，其中要求：凡参加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户，必须保持原有的供销关系，一般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内暂时在原地生产。不要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某些分散、零星的修理业和服务业，应保留方便群众和关心注重质量的优点；必须保护某些具有优良传统的特殊手工艺；应该维持某些适合个体经营，而本人又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户原有的单

^①刘少奇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1955年1月10日。

独经营方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必须注意不减少经营品种。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强调指出：手工业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条件不成熟的地方等一下不要紧，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号召各地头脑要清醒，注意实事求是。^①不要把计划数字搞得太大，不切合实际。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国务院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中，为解决手工业合作化过急所带来的问题，还规定所有手工业合作社在批准成立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并规定参加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户，必须保持他们原有的供销关系，而且不要过早地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

1956年3月16日到26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城市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与分析了城市手工业合作化工作中的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等问题。会议认为：应该按照有利于生产和人民生活原则，结合制造性行业或修理、服务性行业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集中或分散生产的形式。走街串巷流动服务的手工业行业，要保持和发扬服务上门，方便群众的特点，防止和纠正盲目、过早、过大地集中生产。至于供、产、销问题，会议提出应该根据提高生产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生产丰富多样价廉物美的

^①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

产品满足人民需要的原则，做好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工作，不要打断原有的供销关系和生产协作关系。手工业生产要贯彻优质优产的原则，健全各级管理机构，保护特种手工艺。在基本上实现手工业合作化的城市，要立即转入整顿、巩固和提高工作，没有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城市，要积极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

可见，我们党在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便对产生的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识到了集中太多、社过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采取了必要的改进措施，弥补了合作化过快带来的一些缺陷。

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前后，党对手工业改造进一步总结经验，克服合作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改进工作，从而使手工业改造工作更适合城乡人民的需要，更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

1956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社论指出：国务院规定，手工业在实行合作化以后，要有一定的时间，暂时照旧生产和经营，以便经过仔细研究和规划以后，再完善地进行改组和改造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社论说，手工业改造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造成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水平，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着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仅不应当比过去做得差，而且应当比个体时做得更好。为此，在对手工业进行改造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轻易地去改变它们原来的生产和运销规律、经营制度和服务制度等等。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特点，行业中的各个环节又有它内在的联系。前一个时期我们主要是忙于合作化的工作，还来不及对手工业的行业情况、生产和运销规律、经营制度等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因此我们完全不应该

急于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只有等到将来我们对生产技术和管理办法分析研究清楚以后，才能对行业中不合理的部分逐步加以改革。至于某些行业中存在的某些显然不合理的情况和困难问题，为了便利生产和经营，经过领导机关的批准，当然也应该及时加以调整 and 解决。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已经作了详细考察研究，并且提出了统盘改组方案的行业，经过省（自治区）、市领导机关的批准，也可以进行改组。但是，这些只能是个别的有重点的。总之，经济改组，调整商业网，企业改造等工作，不能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予以解决，而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和研究，进行统盘规划，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央和地方统一领导和安排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行逐业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达到提高生产和经营水平、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目的。

1956年6月5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向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第五个问题专门谈了“关于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报告》说：在这次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有的地区在某些行业（主要是修理、服务性行业）中，不顾具体条件，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盲目地办大社、并大社，发生了生产困难，居民不便，供销失调，协作中断，产量和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以至社员收入减少，生活困难等不利情况。《报告》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是：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是有关生产经营的根本问题，应该根据行业的特点，按社员自愿和有利于生产、不影响社员收入、有利于为居民服务的原则处理。大体上说，在制造性行业内，一般技艺性较高，协作性较大，产品相同，供销多是经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环节，只要厂房、设备、干部、技艺等条件具备，家庭辅助劳动能够得到妥善安排，在进行了具体规划和充分准备以后，一般可以适当地集中生产。但集

中的人数不宜过多，在城市一般地以不超过五、六十人为宜，个别有条件的，也可以建立百人以上的大社。在农村应该以集镇为中心，建立专业合作社，一般以二、三十人为宜，行业人数少的，也可以建立三五人的专业生产小组。如果条件尚不具备，仍暂时在原地分散生产。如果有条件时，可以先按主要工序进行小规模集中生产。修理、服务性行业，与群众关系密切，协作性较小，一般适宜于分散生产。其中某些行业的主要修理环节（如电焊）和修理高级用品的行业可以适当地集中。集中生产的，应当实行统一核算；分散生产的，一般应当分别核算，各计盈亏。目前过分集中和不适当统一计算盈亏的手工业合作社，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应该有准备地逐步地加以调整。中共中央在同年7月9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且原则同意了报告所提出的各项内容。

1956年6月18日，陈云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精辟地指出，手工业合作化后，并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改造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求我们逐个地加以解决。他建议小商店和手工业者可以挂公私合营的招牌，但仍然自负盈亏。^①在八大政治报告草稿的一个修改稿中，在总结手工业改造经验时也写道：“我们在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采取了尽量保存手工业原有的优良传统和供销关系的政策，使得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一方面能够解决上述个体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另一方面能够使原有的生产经营上的特点继续保存下来，并且在可能条件下加以改进。”^②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便根

^①据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8年10月20日。

^②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草稿1956年9月5日的修改稿。

据手工业合作化中盲目并社、改变所有制的情况，清醒地指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刘少奇同时承认：“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①

周恩来在八大的报告中，集中就手工业改造发生的问题，发表了同样十分正确的意见：“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性、服务性的行业，都应该让他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②

①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304——305页。

②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上，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422——423页。

陈云在八大发言中，则明确指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错误：“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因此，比自营时候，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陈云还明确提出了改进措施。指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手工业一般地带有分散性、地方性、因此，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自购自销为生。中央和省市手工业领导机关和多数行业的联合社，只能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不应该自己经营进销业务。”^①这种合作化之后重新由大分小，由集中改为分散的做法，就是基于对过于集中、过大合并不符合人民生活的需要、不符合手工业生产的特点这样一种认识而作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陈云还认为应当改变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办法，采用市场调节的方法来促进小商品的生产。陈云指出，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一般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

^①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5页—第8页。

值，规定了降低成本率、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等，但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因此并不十分科学。工厂的生产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需要都注意不够。因而，“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生产发展了，又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①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在党的八大上也就手工业合作化问题作了发言，其中，他就手工业的“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问题”，作了重点发言。白如冰说：手工业小而分散，经营灵活，产品多种多样，能够随时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历来就有关心自己产品质量、品种花色和市场销路的优点。组织起来以后，为了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除了一部分行业适宜于集中生产而外，合作社的建设规模一般宜于小些。高潮中，由于我们对这些特点认识不足，未能很好地考虑消费者的需要和便利，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以致在有些行业中原有的供销关系被打乱了，产品质量下降了，品种花色减少了。在修理服务行业中，有的地区不适当地撤销和合并服务点，既造成群众不便，又使社员收入减少，这些错误和缺点，应该继续加以纠正。白如冰为此指出，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统一核算盈亏和分别核算盈亏，不仅是组织形式问题，而且是生产和经营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因此，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情况，从实际出发，稳妥地进行改组改造工作。现在集中生产的合作社，如果

①《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页。

产量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成本降低，社员收入增加，又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当然就不要变动，如果一时利弊还看不清楚，可调整可不调整的，亦应暂时不动，待摸清情况后作再处理。但对那些集中生产以后显然有毛病的，则应该坚决地有准备、有步骤地划为小社、小组，并且应当单独核算；有的户还应当允许其分散生产，自负盈亏。不论是大社、小社、小组，或合作社领导下的分散经营户，只要是没有剥削，都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可见，当时对手工业所有制改造后产生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是认真对待的，在政策上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都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办法，发表了改进工作的正确意见。

不仅如此，党中央也就手工业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56年9月27日，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中，也就手工业问题专门指出了两点，其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注意整顿和巩固组织，妥善地安排生产，组织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贯彻执行“按劳付酬”的原则，保证一般社员能够增加收入。应该适当地划分管理范围，加强领导，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同时还应该注意保存和继续发扬这些手工业原来的优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根据需要和可能，对一部分手工业可以逐步地实行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以发展生产。其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不宜过分集中，某些行业还应该适当分散，并且允许一部分手工业者，特别是特种手工艺品的生产者继续独立经营。农民兼营的而其产品又在本地销售的手工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农民个人经营，或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①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56年9月27日。

由此看来，对于手工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都是明确觉察到了并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并非如某些时论所说是后来才发现的。如果说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反思，那么这种反思在1956年就已经作出了。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理应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而恰恰在这一步上，我们党的路线发生了偏差。因此，如果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主要地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没有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所造成的。

至于包括手工业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本身，总的成绩我认为应该肯定。正如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所指出的：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新的原则，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只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这些经验，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些帮助。①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所取得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绩（有人称之为“最初的表面效果”），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

六、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论述

毛泽东提出关于“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在三大改造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正确的理论与实践。当然，毛泽东在三大改造中，把最主要的精力花在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也给予了关心，他对手工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许

①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1956年1月22日。

多是与农业合作化问题或是三大改造放在一起谈的，单独谈到手工业问题的情况并不多见。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手工业经济和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经济一样，也需要引导其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1953年3月24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1953年3月2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作出批语，认为湖北省委的指示“很好”，要求“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湖北省委的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作出六项决定，大意为：（一）对各个城镇的手工业情况进行分类排队，以确定发展、维持、转业等对策。（二）划分手工业阶级界限，宜宽不宜严。（三）关于工人和学徒的工资等福利问题，应按代表会议通过的协议执行。（四）当前对手工业应提倡自产自销，提高质量，打开销路，加工订货只作为对销路有困难的行业的辅助办法。（五）宣传手工业的前途，解除某些人以为国家工业化一下就消灭手工业的想法。（六）学好手工业代表会议文件，有重点有步骤地贯彻。^①

同年4月4日，毛泽东又致邓子恢说：“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处”。湖北手工业协议，指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54—155页。

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10条协议。这10条协议4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在这两次批示之间，毛泽东还对邓子恢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先后作了两次修改，并加拟了《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的标题。第一次修改，时为1953年3月31日。毛泽东将原稿“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仅次于农民多数的一种经济成分，是今天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句，改写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原稿“在农业使用手工业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一句后，加括号写了“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在原稿“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60%、70%之后，加写了“有的竟至80%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接着又加括号写了“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第二次修改，是在1953年4月2日。毛泽东在原稿第三项的“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这一段文字之后，加写了“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等字样，^①表示了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形，以不致产生片面性，产生偏颇。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份《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57页—158页。

提纲》，其中写道：“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①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中写道：“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表示了要加快手工业改造的速度的意向。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有一篇重要讲话。其中，在谈到手工业合作化所存在的问题时，他曾这样说道：陈云同志今天讲鸭子，那天也有一个同志讲过羊肉。羊肉搞得不好吃了，一大退化。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搞资本主义羊肉好吃，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还有北京的鸭子，各种布匹什么东西，花样少了，质量差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辩证法，羊肉也可以进步的。一万年以后，还是现在这么个味道吗？还有什么新的花样使得更好吃一点呢？恐怕也可能吧。烧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花色更要多，质量更要好。不然，你这个优越性，在羊肉面前就没有优越性了。^②按照手工业的类别，这种服务业中需要较多手工艺的行业，当时也被划属于手工业。

关于手工业改造速度问题，毛泽东在这个1956年初召开的会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1页。

^②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议上也曾说过：“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还要几年，比如三年到四年恐怕还是要的”。“快是好，但是不要在相当多的人不愿意的条件之下来得快”。这与陈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样，毛泽东原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估计也是比较留有余地的。

毛泽东对于手工业改造集中发表意见，是在1956年3月4日，我们现在看到《毛泽东选集》第5卷上有一篇文章，叫《加快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5日），题注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3月5日”，在时间上有误，应为3月4日。毛泽东从3月1日起到3月5日至，分别听取了国务院四办、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工作部门的汇报。3月4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领导人白如冰向毛泽东汇报手工业的基本情况、1956年计划、远景规划轮廓和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毛泽东就上述问题作了24点指示。陈云、邓小平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将其中的11点作了整理，在程序上重新作了调整，以《加快速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题予以发表。

白如冰1956年3月4日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汇报很具体，其概要为：

1.基本情况。（1）手工业的人数和分布，据1954年统计，全国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员共为785万人，渔业、盐业有97万人，农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1000多万人。

（2）手工业的产值和主要行业。1954年手工业总产值104亿元，相当于工业总产值25.2%。主要行业有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业等17个行业。（3）1955年的合作化情况。1955年底，全国有手工业合作社、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小组共68000余个，社组员

200多万人，年产值20亿元。（4）主要产品产量（略）（5）当前合作化发展情况。手工业合作化亦出现了高潮，仅今年（1956年）一、二月份即发展了300多万人，比去年年底增加一倍半，到2月底止，合作化比重已达全部手工业总人数60%以上，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组织任务的35%以上。

2. 1956年计划。（1）手工业合作社第一个五年计划前3年的执行情况（略）（2）1956年计划：手工业总人数为785万人，其中社、组员计划发展到660余万人，占总人数的84%；手工业总产值为95亿元，其中社、组产值为79亿元，占总产值的83%（不包括渔业、盐业和农民兼营的手工业产值）；手工业中17个主要行业情况，人数和产值量。

3. 远景规划轮廓。（1）计划在1957年除少数难于组织或不适宜于组织的手工业者外（约占5%），要全部组织起来。

（2）为从根本上改变手工业的落后状态，发展生产，从1958年起技术改造开始成为主要任务。（3）手工业的总产值，计划1957年为103亿元，1962年为190亿元，1967年为343亿元。（4）手工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5）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相应地逐步改善社员的生活和文化生活。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内，社员的工资收入计划增加1.25倍，平均每年增长7%。

4. 几个问题。（1）改造范围和组织对象问题：手工业部门负责改造的对象是个体手工业者785万人。盐业、渔业等97万人划为农业部门；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约有1000余万人，分不同情况，由手工业部门或农业部门改造；雇佣工人4—9人的私营小型工业，约有54万人，主要应通过公私合营进行改造；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业，一般应由商业部门改造；服务性行业，分别由商业部门或手工业部门改造。（2）建社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建社方法：一次批准合作化的方法，及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的方法，可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不同基

础分别使用。在没有合作化基础的地方，逐行逐业、分期分批地去改造还是比较稳妥的，这种有领导、有步骤的建社方法，可使合作社的发展快而不乱。在建立新社时，应考虑到领导力量，管理经验等问题，社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以100人左右较为适宜。组织形式：妥善地处理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确定合理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因此，制造性行业，一般适宜于集中生产；修理服务性行业，一种是完全流动服务的，如钉锅钉碗、磨刀磨剪、焊铁壶、擦皮鞋、洗衣、轮胎翻修、修理雨伞、皮鞋、日用家具修理等等，应当长期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一种是有固定生产场所或兼作一些流动服务，可适当集中生产，有的也可分散服务；特种工艺业有些可适当集中，有些可分散生产。（3）关于生产资料折价和股金的处理问题。生产资料折价采取自报登记、民主评定的办法，按现值公平合理地折价，防止偏高偏低。入社股金，应从实际出发，既要照顾到社内生产需要，更要照顾到新社员的经济负担能力，一般以相当于社员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为宜。（4）供产销问题。①解决原料问题；②加强推销工作；③对手工业产品价格要贯彻“优质优价”的原则；④将原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负责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基层社的加工订货业务，逐步交由手工业生产联社或专业联社承担下来。（5）技术改造问题。（6）加强领导和培养干部问题。（7）保护和提高特种工艺问题。

毛泽东在听取白如冰的汇报时，所作指示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上发表了一部分。为了全面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思想，特将其余13点意见摘要如下：^①

1.手工业合作社的积累。按成本计算，利润率7.5%不算

①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汇报会上的讲话。1956年3月4日。

低，纯利润1亿4千万元，积累2亿4千万元，纳税1亿2千万元，税收占利润的46%，很好。合作社本身也有积累。

2.手工业合作社的名称改为工艺合作社，没有必要。名称可暂时不作变更。手工业改造的目标要明确，不要与其他工业混淆。目前，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程度还不高，只占人数的1.97%，占产值的7.6%。待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再改为好。如山东潍坊市半机械化、机械化已达到30%，现在就可以改，再叫手工业就不适当了。

3.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要讲质量。合作社生产的砖、瓦数量很大，但质量不好，价钱太贵，建筑部门对你们有意见。

4.手工业领导机构，要把手工业管理局（科）和生产联社分别清楚。全国2100多个县市还有880个没有建立机构，就是有五分之二没有机构。机构是要建立的，生产联社的人，吃合作社的饭，国家不出钱。县以下只有手工业，县工业科或工商科不管手工业，管什么？

5.1956年手工业合作社、组产值为79亿元，这还不够完全。你们应当把全部手工业的117亿元都管起来。归你们改造的785万人要管，不归你们改造的如渔业、盐业、农民兼营部分你们也要汇总。这样手工业就全面了。你们还要负责调查，全国手工业在历史上哪一年的产量最高或是产值最大，并且把它定下来。象农业上的粮食一样，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为280亿斤。没

有比较，看不出发展进度。

6. 农业和手工业分别建社问题。跨社，这个办法很好。

7. 手工业合作社条例是需要的，是法律问题。财产关系，属于民法。起草后要报人大常委会通过。

8. 你们提出对手工业纺织业提高专业、紧缩兼业、淘汰土纺土织的方针很好。要这样办。纺纱织布多霸一点在国家手里，国有化多一点大有好处，轻工业赚钱又多又快，好办重工业。农业合作社搞“万事不求人”，这点就要它求人。何叔衡同志的家里我去过的，男耕女织，喂猪养鸡，全家生产，自给自足，既不雇人，也无剥削，真是“万事不求人”。

9. 对手工业中完全丧失劳动力并依靠雇工生活的人，手工业合作社没力量养起来，那只能社会救济。

10. 有些地方供销社包销竹子，不让手工业合作社直接购料，霸得很。

11. 手工业合作社直接采购原料、推销产品的办法，是合理的。这些就是陈云同志的那些办法，国务院作过决定的。

12. 关于手工业合作组织加强领导、增派领导干部问题。糟糕，我要你们汇报工作，你们将了我一军。

13. 国拨物资作价问题，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方针问题，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国家将替旧机器和多余厂房，采取租赁给合作社（和合作社合营的办法）的意见，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策性的问题。今天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你们和陈云、陈伯达继续研究。

此外，毛泽东在谈到国拨物资拨给手工业合作社要合理作价问题时，还就合作社的所有制问题说：待合作社有了基础，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就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质上应该成为全民所有。好象续范亭的战一师和决死队在形式上是山西省的新军，但实质上就是八路军，一定要照八路

军的制度办事，党派二波（薄一波、罗贵波）到战一师、决死队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此。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手工业合作化我是保守的，手工业搞合作化一股风把它吹起来了，到处有毛病，没有领导就合并了，这下搞乱了。表示了事后吸取教训的意思。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的社论。社论指出：近几个月来，各省市的手工业个体户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人认为合作化高潮以后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是不正常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手工业个体户的继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必然的趋势。当然，从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中，也反映了手工业合作化工作有缺点。有些合作组织在实行改组改造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生产的特点和其他具体条件，把不该集中生产的也集中起来了。社论还指出，个体手工业者是合作化继续改造的对象，手工业合作社的联合社、基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团结他们，逐步吸取他们入社。对不愿入社的，也不要勉强。^①

虽然毛泽东在谈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或者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谈及手工业改造问题，这些零星观点散见于过渡时期的毛泽东的文稿中，但是，就主要的观点来说，基本上就是上述内容。

^①载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6章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改造问题的论述

一、建国前夕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认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①但要 对资本主义经济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一起，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这是在总结解放比较早的东北等地区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二、一九五一年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作了修改。这份意见稿关于私商联营的形式提出了五种。（一）公私联营。（二）私资联营，在贸易部领导下进行。

（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也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进行。

（四）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五）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主要目的是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毛泽东的修改词这样写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①前三种形式则是好的，应予支持。

三、一九五二年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②当时毛泽东认为，多发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二）第602页。

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540页。

展工业比多发展商业要好，因此有些商业要改行，把资金投到工业上去。这种对生产和交换作用的认识的偏向，是与毛泽东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以士农工商序列经济不无相关的。黄炎培后来在向工商界的谈话中，转述了毛泽东3月15日同他谈的意见：

1. 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2. 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3. 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①

同年9月5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一封复信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说了如下一段话：“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这段话明确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只是“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它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②后来在黄炎培的讲稿上，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意思也与此差不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536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533——534页。

多。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上的报告，发表在同年14日的《人民日报》上。

9月10日，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问及各地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方法时说：①，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②，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他们经营，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需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③，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④毛泽东指出的解决私营中小工商业出路的这三种办法，看来为以后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理出了思路，或者说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这三种办法，归结到一点，都是要维持中小工商业的生产，使私营中小工商业继续存在下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570页—571页。

9月29日，毛泽东在复黄炎培的信中说，“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指10日说的三点意见——笔者注）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这封信还对黄炎培反映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的问题作了答复。

9月底，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在10年至15年内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11月12日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的时间问题。

11月16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笔者注）稿作了修改，并加写了批语。他在这份指示稿中加写了一些话，“目前已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已在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

“也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6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①这三段话的精神，与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的精神一样，要求在当前阶段，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方便人民生活，弥补国营商业的不足，加强流通、交换，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一九五三年

1953年1月2日，当时任商业部正、副部长的曾山、姚依林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610—611页。

给毛泽东等写信，提出商业中库存积压太多，占住了一大批资金，影响生产发展和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提出了改进办法，并请求中央及各地党委、政府给予领导和支持。毛泽东对这封来信写了批语，指出：“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牵涉到一切商品的生产 and 消费，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动员全党协力执行决定，才能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克服目前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状态，而走上正轨。提议在商业厅长会议后由中财委为党中央起草一个商业工作的指示或决定，并在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①批语还指出，信中提出的国营商业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在收购上，克服盲目性，停止收购滞销产品的改进办法是正确的。

3月8日，毛泽东给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两先生写信说，“任老（指黄炎培，字任之——笔者注）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象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②可以看出，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具体处理和对待时是十分慎重的。

5月15日，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副总理黄炎培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两先生，指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6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5页。

主改革和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①紧接着在5月17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5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解决工商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建议作了回答。黄炎培在信中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对此答复说：“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决问题作成一個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②在这段时间内，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问题还没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还没有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毛泽东通过与工商界代表人物的联系，注意密切关心工商业的情况，了解工商界的态度，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6月14日，毛泽东分别给周恩来、李维汉、陈叔通、黄炎培写信，就陈、黄12日关于全国工商联、民主建国会召开工商问题座谈会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以及黄炎培13日召集京津两地工商界举行座谈会讨论朝鲜停战问题情况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作出答复和布置。陈、黄12日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讨论情况均已送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议经常座谈、协商，交换意见，以解决各种问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24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25页。

题。毛泽东给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中说，“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给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统战部长的信，要求将陈、黄和黄的上述两信和有关材料刊登在反映工商界和知识分子情况的内部文件《零讯》上，并说：“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①毛泽东对工商界多种意见的了解，是在通过写信、阅看材料这种调查研究方式的基础上获得的，由于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这种了解就比较全面。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可以看到，光选收入这本书信集的毛泽东给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的信就有17封之多，居此书中所有受信人的首位，可见毛泽东对工商界情况了解的全面了。

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好在这份提纲手稿不长，照录如下：“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47页。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①

这个提纲所体现的思想，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越来越明确化。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5月27日向党中央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这份调查报告还认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维汉的这个调查报告，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表讲话，肯定了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在讨论并同意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的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毛泽东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②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51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06页。

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思想，应该就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提出来了的。

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这两次扩大会议均讨论了李维汉的上述报告，并在这个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李维汉的调查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肯定了《报告》中的意见，说：改造成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6月21日打印件送交毛泽东后，毛泽东于6月28日批示印发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同日，毛泽东还在胡乔木6月27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稿的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上写下了如下批语：“（一）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二）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三）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四）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五）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六）改为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七）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八）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第六种经济形态。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②这个批示，提出了资本主义工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43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55—256页。

商业改造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例如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等等。

李维汉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草稿）》，并以此为题，在6月25日开始的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作了三个半天的报告，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文件基本上是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其主要精神，是与李维汉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草稿）》是一致的，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7月9日，毛泽东在夏季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写了如下批语：“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这段批语，很清楚，是对6月28日写在胡乔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稿意见上的批语的第一部分的发挥。如前所述，毛泽东对胡乔木6月27日的意见，写了批语，其中第一部分即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而这一段关于

^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7月9日。

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意思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表述，在7月20日前对一个文件的修改中更完备与清楚。毛泽东对全国总工会党组7月14日报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作了修改，在全总指示中“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句下，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里所说的改造还并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份）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①这种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到社会主义企业的必经之路。当然，毛泽东说，这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即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7月20日，毛泽东对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79—280页。

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中的指示》的批语稿作了修改，中央的批语稿说，“指示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毛泽东在这一句后加写道：“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①对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四马分肥”政策作了补充解释。

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8月11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是继6月15日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更为完备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个表述与6月15日表述的区别只是：（一）界定了过渡时期的时间，（二）原定的“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为不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此外并无本质的不同。

总路线的正式提出，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正式开始，虽然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在不同程度的进行之中。

9月4日，毛泽东对陈云将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6次会议上作的报告要点稿作了修改，加写了一些批语，在最后，毛泽东加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80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301页。

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①除了重申一化三改造的内容外，毛泽东还叙述了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指明了方向。

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代表人物参加了座谈。毛泽东作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的谈话，毛泽东写了谈话要点15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出版时，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为题，收入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要点13点。被删去的二点是：（一）（原第12点）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二）（原第15点）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多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②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谈话的主要精神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改造过程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322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326页。

有很大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利润分配要兼顾四个方面等。

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陈叔通作了《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分析了私营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工商业者自觉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0月27日下午，李维汉作了题为《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长篇的报告，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等四个问题。毛泽东11月5日对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作了批示，同意此稿在1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让将此讲话稿送给高岗和周恩来阅看。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是开得成功的，并对李维汉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的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有关部门在全国工商界中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工商业者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2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谈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写作和修改。毛泽东要求宣传总路线，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草稿，毛泽东对这一提纲作了修改，主要修改有四处，其中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关系密切的修改是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

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①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建国以后立即实行的，但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这就明确了建国初期头三年的基本社会矛盾，与总路线制定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矛盾是有区别的，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对这个提纲的另一处修改中，在提纲写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处，接写“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浪费很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404页。

现。”^①

12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谈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的修改问题，请有关同志阅后提出修改意见。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资)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前，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向中央送交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中央批准了这个提纲设想。这个汇报提纲提出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完成公私合营的设想。毛泽东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说：10年内搞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没什么急躁冒进。已过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将天下大转。10人以上的企业改造，可能不要10年，也许7年就可以了。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秋（意指游泳），淹不死人”。^②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会议形成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后来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业有计划地实行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文件。

在1953年，毛泽东还写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这样一篇文稿，但只写了开头（一）便没有再写下去。但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③即建立新中国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在其他一些场合，毛泽东则认为建国后头三年的主要矛盾在实质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407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53—754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425页。

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矛盾，因而这三年中国人民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因而这建国头三年的社会性质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五、一九五四年

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讲话的讲稿提出些意见。黄在讲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医学术语来比喻工商界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毛泽东对此提出说：“‘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①毛泽东同时给周恩来和李维汉写信，告诉复黄炎培副总理信函事，并补充说，“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②。这两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估计，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置这个问题，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3月23日，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伯达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时，有一些插话，谈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在陈伯达说到宪法草案的总纲规定逐步改变个体劳动者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是很复杂是很困难的”时，毛泽东插话说，最困难。改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7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68—469页。

资本主义困难，比较说来，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更困难。人多分散，一万万一千万户农民，就是一万万一千万个单位，我们要指挥这么多单位好困难啊！当陈伯达说到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资本主义，是一个比较可以采用的步骤，也是逐步过渡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多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①

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宪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他说，“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是一个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遇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②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解释了宪法草案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而且将工商业改造的形式、内容和政策阐述的一清二楚。当然，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讲宪法草

①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8—709页。

案，但同时又把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讲清楚了。

9月7日到15日，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作了修改，并就修改宪法草案作了一些说明。下面摘录的，就是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关的一些段落：

——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多种经济成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化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对后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我们将让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逐步接受改造。当然，斗争是一定会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现在就有一部分资本家进行各种违法活动，有一些人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抵抗态度。所以宪法草案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①那种认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对于那些违法和进行破坏活动的资本家，是应当加以处罚的。由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不能设想没有复杂的斗争，但是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用和平的斗争方式来达到目的。资本家只要明白了大势所趋，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违法，不破坏人民的财产，那末，他将得到国家的照顾，将来的生活和

^①此段文字见《宪法》（1954年9月20日通过）总纲第10条。

工作将得到适当的安排，他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这同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

——为了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狡猾的敌人还特别雇佣了一些人，如象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们装成“左”的面孔，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他们说，我们做得“太不彻底”，“太妥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想用这些胡说混淆人们的视听。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做，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

——因为，现在我们这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在多种复杂形式下的经济联盟，而不能自成为一种独特的所有制。所以在指出各种所有制的第5条中不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列举在内。①

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外数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在阐述政协的作用时，说政协有5项任务，其中第4项任务是调整关系。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毛泽东说，国家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关系，政协主要是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公私关系。我们国家内部是团结的，这种团结还在增强着，但这不是说没有矛盾了，在各种生活中还是有矛盾的。因此就需要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加以调整。毛泽东还说：公私合营就是要去解决矛盾的，把私方利益纳入公方之中。私营工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把它和公方拉在一起，加以调整，发挥它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消除其最大限度的破坏性，达到解决矛盾。

①《宪法》第5条列了4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很明显这个工作乃是总路线的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还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说：在工业中，原料和定单（生产任务）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严重的是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挤是对的，因为国家应该把流通环节掌握起来，问题在于挤的太猛，未给他们照顾，今后应该继续前进，但要放慢一点，要吸收他们。并说，看来，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就要负担起这个任务。^①这是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协的任务而说的。

六、一九五五年

1955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议长沙多诺时，曾经说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

^①据陈毅传达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指示。

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说：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哪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

10月9日，毛泽东对彭真送请审阅修改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作了修改，在彭真发言稿写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五万万农民群众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运动”这段文字后边，加写了这样的话：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这一句话，与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写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一句话一样，现在看来，显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来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实践已经证明，不但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样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形式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的，人为地取消是不明智的。而且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也不可能、不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比如分配领域，就要在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如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就是非劳动收入，三资企业中的外资、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资本多寡来进行分配的，看来提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这句话本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是一种带有空想成分的设想。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形成的过分单一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产生不利于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大锅饭”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不无关系的。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民建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在中南海座谈。毛泽东在10月27日的谈话中着重指出：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加工订货就是初步基础了，公私合营是第二步了，然后再到第三步。工商业改造并不容易，相当复杂，全体工商业者连家属共3000万人以上，包括小商贩、手工业主、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人）、船主、渔业资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厂主、店主连家属约700万人，数目确否，还要调查，但情况是很复杂的。逐行逐业要安排，要有事做，还要教育。

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况，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毛泽东说：私营工商业者，中小户漏税多，大户要好些，农民有些相反，下中农、贫农想合作，富裕中农不想干。大的工商业者因为是知识分子，听报告多，要开明些，中小的听报告少。如果讲得资本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好的，守法户总是多数，“三反”、“五反”

作了结论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搞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少数人还有贪污。

毛泽东还安抚说，从社会上说，做好事的多，错误是部分的，要有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

对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毛泽东都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想劝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更高的核心人物，经他们去说服大多数，比我们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共产，迟早要共产的。

毛泽东还说，民建和工商联委员有300人左右，还有各省各市都有一批，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物中争取一批，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是有思想准备宣传共产主义，但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1960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要逐步地做，不使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最后是要改变的。但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其权利，改变成分后可恢复公民权，可以加入合作社。对地主来说，事实上是给他们解放，全国总共3000万人，以后要共同富裕起来，不叫地主，叫农民。将来大家共同富裕，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

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大家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是工人阶级。

在座谈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谈到解放前民族资本被官僚资本挤垮的事，毛泽东说，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少些，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上还是说，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些尾巴。并说，三个五年计划我们才有1800万吨钢，要有70%的工业才算基本上工业化，我们国家穷得很，国大而不强，要共同努力。所有的资本家，摊贩，一起努力来搞成强大的国家。

在10月29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三次讲话，总的精神与10月27日讲话精神差不多，首先是要工商界人士认清社会发展趋势，认清前途，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经过协商，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妥善安排。其次是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先知先觉的人，出来带个头，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工商界的人。第三是肯定了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这是总的结论。第四是讲了工商业改造的一些政策、步骤，赎买政策的理论根据。第五是希望民族资产阶级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具体地说，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些问题：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把握（指社会发展规律），应该是安的，但是要讲清楚，并且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不安。

——资产阶级，总有一天，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不要这个阶级了，就叫工人阶级了。

——学习，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应该有几千人，逐步的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个中间有个问题，就是要比较有少数的人物，核心领导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较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工商界的人，所谓先知先觉。这点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已经有一些人是觉悟程度比较高的，这几年工商界的人，已经有一部分是懂得政策，懂得国家的方针，了解更多，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批人。因此，我们觉得这完全可以设想：壮大这么一个队伍，全国有这么几千人，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壮大这么一个队伍。

——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么一个总的估计，究竟这几年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呢？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

——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估计，没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工作信心，工商界本身也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没有信心——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横直是改不好吗？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吗！

——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也许我不是资本家，提出这些是好事情。但你们会知道的，你们大家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私有制，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统筹力量是大的，这个东西要说开，一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晚上睡不着觉，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睡他几年吗。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

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吗。究竟哪一年国有化，不会是一个原子弹扑通下地，我们来商量吗，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吗，全国不是一个早上全部宣布，是逐步逐步来的。

——我们现在采取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实际上不是国家发卖公债购买机器，购买私有财产（不是讲生活资料，是讲生产资料——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不是用那末一个方法，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步地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

——在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还是拖到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法子好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样是比较好的。这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十年有效，安排人员，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把这两个统统的都安排好。政治地位无所谓安排了，因为已经宣布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采取不同政策。

——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你们想当无产阶级一定有帮助，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把这两个私有制废除，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和工商业跟富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种私有制废除，社会上就剩下这些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

——全国努力，各界努力，工商界在内，民主党派在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许多工作在内，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应该有充分的准备，有秩序地、有步骤地前进，而不是一阵风，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最好损失越少越好。

——全国来一个大高潮，不能那么设想。会有各种曲折、反复、犹豫、动摇，我们最后引导到一条路上，就是不动摇了。要逐步引到那点。有少数先进分子，有少数人先不动摇，逐渐使更多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总是要逐步逐步地来，要这样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早两天跟朋友说过，就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夕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祖国前途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谈话，以及在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报告，使工商业者对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普遍提高，从而出现了走公私合营道路的要求高涨的情况，形成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作了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改动外，内容上也作了补充。如指示草案在提到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一批核心分子，“这些核心分子”处，毛泽东加写了“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这一段文字，把原文“党委应当经过统一战线部门，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这一句，改写为“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及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加重了语气与分量，表示对此问题的重视，强调了培养核心分子的重要性。

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说明“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即这篇社论在写到“必须顺应当前的形势，加强党和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的第二项工作时，在中间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于工人的剥削，接受国有制。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在国有化以后，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知道危机的”，“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实地工作的人，是不会找不到合理的工作的”。引导内的文字，都是毛泽东加写的。这篇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了的社论，发表在1955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的文件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上作了些须修改。这个文件，毛泽东署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是不确的，因为这个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会议，并不是七届七中全会。鉴于1955年10月刚开过七

届六中全会，所以七届七中全会到1956年8月22日才正式召开。因此，在1955年11月16日到24日召开的应是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上的修改是，在决议草案写到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联盟的四条理由后接写道：“因为上述各项理由，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关于两个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此前也曾多次提到过。在“但是这样做”，与“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付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两句话中间，加写了这样的话：“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此外，在其他一些地方，也作了些文字修改。比较重要的还有，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初稿上，毛泽东在原稿“这个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环境中所许可的原则”处，加写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主张过这种赎买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在工人阶级“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处，加写“这笔利润的数目，可能达到几十亿人民币”。在“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处，加写：“而是由工人阶级在十几年内用替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在提到对资本家加强教育时，毛泽东加写道：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并指出，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修改中，对于和平改造资产阶级这个问题，还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

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段文字，毛泽东旨在说明我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正确性。

在这个文件的最后，说到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后，党内也存在右的和“左”的偏向，较多的是“左”的偏向。毛泽东将此改写为：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人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吸取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党员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生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各地都可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党员，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右的偏向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只是个别的，较多的是“左”的形式出现的一种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都是右的。这一大段话中，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加写的。

同日上午4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请他们审阅处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信中说：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3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急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以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本文前已指出，这个决议，后来是1956年2月24日通过后作为正式决议的。作为草案，这个决议文件其后又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因此，正式发表时，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其他人修改的这个文件，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又作了若干改动，不过凡毛泽东修改过的地方，一般来说无甚变动。^①

同日，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信中也谈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其中说到：“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会的经验可以推广。”^②

1955年11月22日，毛泽东对李维汉的一篇发言稿作了修改。这篇发言稿，是李维汉准备在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讲的，在这个集中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会议上，陈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讲话，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李

^①见《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245页。

^②《致黄炎培》（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03页。

维汉着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对他11月21日报送的发言稿表示满意，认为“此件可用。有一些修改，请你考虑是否可用”。具体的修改是：在发言稿写到“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做，这样”处，加写“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在发言稿写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的时间问题时，毛泽东加写了“在两年至三年内”、“在两年内”等字样。

在发言稿的第（二）个问题中，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在发言稿的第（六）个问题中，当写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处，接写：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还有一小部分人一定要抵抗。在“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后，接写：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在“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这就是”处，接写：说，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些斗争方式。

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这个会议上，除了毛泽东的在此前的座谈会上的几次讲话由陈云传达外，毛泽东也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资产阶级人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显著进步。还批判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赎买政策的主张，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路

线，是一个挑战，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毛泽东指出，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①

1955年11月24日，李维汉给毛泽东送来一页工商管理总局制作的《全国500人以上私营工厂合营情况统计》，毛泽东在这张统计表的周围写了一些话，其中有：（1）思想落后于实际。（2）全面规划。（3）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又向他学习）。等等。统计表明，全国500人以上私营工厂，1953年有153户，1954年有163户，1954年合营户数为98户，1955年三季度前又已合营27户，四季度计划合营8户，全国到1955年止未合营的共30户。毛泽东在“30”旁写上“=18%，即82%已合营”字样。在毛泽东看来，已经有82%的大型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看来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业改造以后的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对资改造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对资改造问题上花费了仅次于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所花费的力量。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资改造的许多言论、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话，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为尔后的实践证明未必完全符合发展的实际情况，这应当视为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

七、一九五六年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

^①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65页。

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还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①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比方刚才说的烤鸭，涮羊肉，这是好东西吗，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资本家的技术，资本家的管理方法，不是讲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旧制度，而是讲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词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的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广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撤消私有制”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还是公私合营，至于哪一天全部消灭私有制，要看情形，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要安排好，大家有饭吃，一般的生活不降低。总之，可以撤消了，才撤消，还是我们过去的老办法。不要因为一阵混乱，有许多人要求撤消私有制，明天早晨就

^①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撤消，这样并不见得好。毛泽东认为，私有制迟早是要撤消的，国有化迟早是要实行的，但是立即撤消并非是好事情，并不见得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大的资本家、大的工商业者来说是如此，所以还是留下一个尾巴，不取消定息，不实行国有化为好。

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作经济调查。从2月到4月，他听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每天听汇报。毛泽东自己说，一天就是床上地下，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来的。①2月19日，在听取国家建委汇报情况时，毛泽东说：“三反”、“五反”，把私人建筑业一网打净，老板在内，化私为公。

在3月1日到5日的调查中，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四办及中央轻工业部各部门的工作汇报，他在地方工业部汇报时就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插话说，要达到什么任务，要订出一个规格，如数量、质量、品种、花色要比过去大好，稍好不算改造得好，一定要大好才算改造得好。

3月6日，在听取铁道部长滕代远汇报时说，自从1953年反主观主义之后，1953年到1955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当然你们是采取原谅的态度，你们说中央的领导是英明的，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3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交通部党组的工作汇报。在交通部党组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毛泽东说：长江及沿海已合营公司进一步改造的意见好。对资本家赎买政

①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第4页。

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现在资本家愿不愿意？现在小资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资本家随潮流走。现在问题是怎样安插。中国资本家特点之一是许多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岗、饶漱石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资方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3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给他们福利基金。毛泽东几次强调，要使用资本家中有能力的人，要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他对资产阶级中有才华的人的重视，以及对发挥资本家作用的重视。

195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驻华大使格瑞杰先生时说，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样进行的。资本家现在在半国有化的企业里还是担任着工作，有的还是当经理、当厂长，将来也还是如此。政府采取了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都有职业，而且有选举权。他们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对此很乐意。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恩希纳、委内瑞拉共产党第一书记约尔梅、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维依拉、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总书记罗加、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书记鲍尔赫斯等的会谈中，就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主要是：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很大的作用。它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它的影响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还大，所以对这些人工作就很重要。你们到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和资本家谈话？如果谈过，可作为参考。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斗争，对他们的坏处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毛泽东介绍的经验还说，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

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也用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他们作斗争，资本家的家庭里进步子女和父母也作斗争。这样，6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基本上就被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了。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逐步变为国营。总之，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毛泽东认为，中南美的兄弟党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1956年8月6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议长沙多诺时说：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我国过去是个大国，但不是独立的，它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哪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

8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挪威共产党主席埃·洛夫林时也谈到了工商业改造的方法问题和经验问题。毛泽东说，到上海可见到中国的资本家，看看他们是怎样改造的？怎么想法？他们为什么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改造是自愿的，要靠他们自己改造，不是从外边改造。他们自己开会、看报纸、看书，开训练班我们也帮助他们，派个人去给他们讲课。讲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变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使他们懂得社会一定要这样发展。毛泽东重复他对别的国家的代表团的介绍，说：我们对资本家的办法是给工作做，生活不降低，将来还可以和工人阶级一同提高。资产阶级有一定的技术，一定的管理生产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只是要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唯心主义改造掉，他们的技术、经验我们要学习，把这些一起丢掉，对我们就不利。资产阶级的经验和方法中也有落后的不合理的，我们可以不学，他们的知识、技术，一定要利用。

195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草稿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改造部分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加写了几段文字，但在修改时又随即将加写的文字涂抹掉了。这是需要研究的，但在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

9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的乔治乌·德治时也说，资本主义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的东西。这是在乔治乌·德治提出意见，说工厂中脱离生产的人员太多，如上海电机厂，有工人3000多人，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却有70人之多时说的。

1956年10月3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陈云一起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在基里洛克说到波兰解放以后，农民党、人民

党、社会民主党都留下来，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为统一工人党时，毛泽东说，这些党派存在有利于我们改造资产阶级。并说，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好几百万人，可以替我们服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抄苏联那一套。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发言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并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与陈叔通谈话，就陈叔通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解答。陈叔通提出的三个问题是：（1）资本家对定息很担心能拿多久？怕取消太快。（2）资本家担心现在安排工作，再有两年会否一脚踢开。（3）合营以后如何自我改造？毛泽东就这三个问题回答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权有工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关于定息，毛泽东说，定息拿多久呢？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主要是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时还要叫他拿下来。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高潮1955年已经来过了，以后不再来个高潮了，而是逐步低下去。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你看怎么样？现在资本家当中大体有70%左右对定息没兴趣，一个月拿几毛钱，他们要求放弃定息，摘帽子入工会，享受劳保条例。我看也可以放弃吧！其他30%不肯放，就叫他们拿6年，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于会否一脚踢开，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

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关于学习与改造问题，毛泽东说，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的，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学本事好吗？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对资本家要从两方面看。毛泽东最后还说，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地主只有古代文化，工人阶级有这个财宝是好事情，工人没有文化，资本家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毛泽东并且表示，为了解决资本家担心职位靠不住、定息拿不长的问题，8、9日可召集资本家代表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说心里话。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主建国会、工商联会的代表人物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李烛尘等，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定息问题、摘帽子问题、国有化是否要来个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问题等。毛泽东说：唱戏有个高潮。这个东西恐怕不好来个高潮。因为高潮是想拿定息较多的人。他们大多是先进核心分子。想摘帽子的是中小。有些人拿的定息只能买一包纸烟。毛泽东又说：“基本完成”，讲的是公私合营，不是国有化。国有化了是全部完成。三年左右，可左可右。发生误会，就想到定息，定息取消，是最后完成，不是基本完成。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不革命的阶级，毛泽东回答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對抗还是非對抗？妥协了，还有什么對抗。实行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搞公私合营，……没有對抗了。“三反”、“五反”只是部分對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對抗。最近几年，更融洽了。现在是我们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如公

私关系，不敢吃面，不敢讲话，要讲话只有骂人，报上不敢登，“左”的空气。座谈证明他们是进步的，但还有缺点错误，还要继续改造。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中，不革命、反革命是个别的。作为阶级，不能讲不革命或反革命。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要组织人写文章。资产阶级三、五反后没有对抗，三、五反也不全部对抗，只是一部分对抗。以前孙中山同盟会，他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一面对抗，一面妥协。现在是否一面对抗，一面合作？两面性是一面进步，一面落后。阶级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结果就没有改造了，大家尾巴会翘起来。定息完结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两面性。说只有一面性，不利于改造、进步。现在资本家学习热情很高，看来民族有希望。

在荣毅仁谈到供、产、销三项计划对不起头，计划落空，陈云谈到计划要分批，重要产品要有计划，日用产品要自由主义时，毛泽东谈了下面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如车之两轮，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他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工人250万（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8、9万工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就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

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陈叔通再三提出，资产阶级“很怕放弃定息来个高潮”。毛泽东对此回答说：决定问题是10%，80—90%是小的，要压一二年。决定问题的是大、中。20人以上是大厂，定息才有味道。小的，要搞（帽）可以搞。一不提倡，二不搞高潮，三不登报。一登报一广播就发生问题，就控制不住。合营高潮是没有领导的，农业是有领导的。……手工业没有领导，搞快了。大工业历来有领导有组织的，小的没领导，没组织，长沙一股风并了，全乱了。合营是一股风，没领导。不影响大的，影响小的，手工业、商业。要改过来。江苏手工业由大致小不愿意，泄了气，散了。领袖人物面上无光，搞是你们，散是你们。事情要上正规，要合乎客观规律。过一个时期，代理人，小的定息逐步取消，个别解决，不登报。

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上，反复阐述了延长定息时间的好处。要发挥资产阶级的作用，不搞国有化的高潮，要保存一些私营工商企业，这样对国家建设有好处。毛泽东强调指出：苏联说我们是完整地实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一直到现在物资还不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物资多。首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然后才能同农民结成同盟。农民要物资交换，也比较好地稳定了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很大作用。

12月8日，毛泽东又召集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会，回答了有关工商业改造及改造后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与12月7日座谈会上的内容是一样的，

有些又展开来阐述得更清楚了。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是：

首先，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一笔收入，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曾经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和政府合作，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我们是无用的，而是有用的，很有用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因为他们在厂里从前和资本家是有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清楚。特别是工商界学习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是会对你们改变观感的。在资本家，要宣传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

其次，保留定息。这样做，大资本家他们会高兴的。大学生中70%是资产阶级子弟，他们是不要继承权的，但是对于政府这样对待资本家会满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上层领导、宗教界、华侨也都会满意的。很快取消定息，他们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来都要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间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对亚洲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没有几个钱，七年总计不到8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没有落到外人田，是楚弓楚得，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债推销的对象，还可以开工厂，可以从各方面来考虑。

第三，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料到这样快，现在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民族都不利。我们照顾大资本家，对整个民族有利，花钱不多，讲的话要算数。还可以影响外国的资本家，对改造世界资本家也有利，现在的情况和我春天讲的话是一致的。我只讲“基本上”，那是指公私合营全部完成，还要七

年，除了今年，还有上年，花钱不多，大约有8亿左右。国内各方面都要照顾，对资产阶级、无党派民主人士都要照顾，要向工人阶级解释，要对中小工商业者讲清楚，要对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讲清楚，不了解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着重指出，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要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是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我们国家穷，钢产量少，比起国外先进的，我们这一点钢不算事。所有过去搞资产阶级革命，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会开会，大家学习，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希望在座朋友引导这几千位工商业者，向着生产方向。要有几十年功夫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95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陈云送的一份材料上写了批示，并将此批示送陈叔通一阅后转陈云。批示说，我在这里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陈叔通接此批注，十分高兴，立即写下这样一段话：“各报均如此登载，我们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亦是照此传达，只是未曾再加一句，那是走上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国有化。因此有些人不懂基本两字，懂的亦不免怀疑说三年结果，去冬今春已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再两年即转变为国有化。这次毛主席说明定息7年，还可能拖一个尾巴。大家就安心了。”通过开会、座谈、批示，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后所定的政策，全盘交给了工商业者，使他们能安下心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以后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对此问题仍发表过一些意见，散见于他接见外国人时的一些谈话中和别的场合的一些言论中。如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7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比较集中地阐述对资改造问题经验，是在他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的谈话记录稿中，特别是读这本教科书的第20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时的一些谈话中。

在教科书写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赎买等方式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入社会手中。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处，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

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教科书写到“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处，毛泽东加了一个问号，并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

毛泽东还认为教科书的这种写法，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拿我们有些省分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分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分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20章时，就我国反官僚资本问题还说了

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涉及民族资本在我国资本主义中的地位。毛泽东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级，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在读到第23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教科书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说法是不对的之后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再次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他，又整住他。又说，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的这些关于对资改造的论述，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具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其中又带有某些

反思的成分，如1956年底关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讲话，可以将地下开设的私营工厂办到地上来，与国营企业开展竞争的讲话等。总之，毛泽东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并不是如有些文章阐述的只是片言只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又是全方位的，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改造的具体政策、方针、路线、办法叙述得比较清楚，又对团结、争取、赎买、利用资产阶级，改造他们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系统、全面地将毛泽东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言论整理出来，相信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于我国对资改造的研究，以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不无好处的。

第17章

毛泽东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创见

50年代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党成功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赎买工作，用和平的手段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改造的先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和平赎买资产阶级问题上，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的设想，成功地在中国进行了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实践，仅仅用32.5亿元人民币，就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整个阶级买了过来，并在此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就已经作出的设想和奋斗目标。从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开始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因为接收资本主义企业中属于汉奸、战犯、官僚资本的股权属于国有，就实际上与原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公私合

营。与此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和平改造的工作。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这是在总结解放比较早的东北等地区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一、建国以后，党实行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与发展，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与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根据中国国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思想。毛泽东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条，是可以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想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和斯大林给了他们以批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

“革命”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上讲：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①黄炎培后来在向工商界的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3月15日同他谈的意见：（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二）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三）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②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逐步展开的。同年9月5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一封复信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明确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只是“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③11月16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中要求在当前阶段，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方便人民生活，弥补国营商业的不足，加强流通、交换，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540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536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三）第534页。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前途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是可以教育的。这由三方面的原因决定。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愿意接受改造。第三，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1953年6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统战部长的信，要求将陈叔通、黄炎培的反映工商界情况的信和有关材料刊登在反映工商界和知识分子情况的内部文件《零讯》上，并说：“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①毛泽东对工商界各种意见的了解，是在通过写信、阅看材料这种调查研究方式的基础上获得的，由于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这种了解就比较全面。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可以看到，光选收入这本书信集的毛泽东给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的信就有17封之多，居此书所有受信人的首位，可见毛泽东对工商界情况了解的全面了。

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纲中说：“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②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47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第251页。

这个提纲所体现的思想，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越来越明确化。

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这两次扩大会议均讨论了李维汉5月27日向党中央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并在这个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李维汉的调查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肯定了《报告》中的意见，说：改造成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

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其中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说：要在资产阶级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毛泽东还在谈话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改造过程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的话表示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基本信任的态度。

三、充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向民族资产阶级学习技术和管理经济的经验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文化、生产技术和经营企业的经验的特点，号召学习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促进社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743页。

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在对资改造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点。1955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议长沙多诺时，曾经说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况，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毛泽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搞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少数人还有贪污。

对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毛泽东都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

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在座谈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谈到解放前民族资本被官僚资本挤垮的事，毛泽东说，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少些，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上还说，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些尾巴。并说，三个五年计划我们才有1800万吨钢，要有70%的工业才算基本上工业化，我们国家穷得很，国大而不强，要共同努力。所有的资本家、摊贩，一起来搞成强大的国家，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同策同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因而是非常正确的。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上作了修改，在决议草案写到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联盟的4条理由后接写道：“因为上述各项理由，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关于两个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此前也曾多次提到过。在“但是这样做，”与“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付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两句话中间，加写了这样的话：“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此外，在其他一些地方，也作了些文字修改。比较重要的还有，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初稿上，毛泽东在原稿“这个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环境中所许可的原则”处，加写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主张过这种赎买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在工人阶级“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处，加写“这笔利润的数目，可能达到几

十亿人民币”。在“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处，加写：“而是由工人阶级在十几年内用替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修改中，对于和平改造资产阶级这个问题，还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段文字，毛泽东旨在说明我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正确性。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①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比方刚才说的烤鸭、涮羊肉，这是好东西嘛，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资本家的技术，资本家的管理方法，不是讲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旧制度，而是讲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词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

^①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光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向资本家学习并没有成为口号，效果也不是太好，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

四、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毛泽东几次说过，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笔财富。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一笔财富。1956年3月8日，毛泽东听取交通部党组的工作汇报时说：对资本家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现在资本家愿不愿？现在小资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资本家随潮流走。现在问题是怎样安插。中国资本家特点之一是许多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岗、饶漱石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资方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3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给他们福利基金。毛泽东几次强调，要使用资本家中有能力的人，要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会谈中，就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主要是：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很大的作用。它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它的影响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还大，所以对这些人工作就很重要。你们到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和资本家谈话？如果谈过，可作为参考。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

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逐步变为国营。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毛泽东还说，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地主只有古代文化，工人阶级有这个财宝是好事，工人没有文化，资本家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

但是，毛泽东关于要重视资产阶级，党中央关于要给资本家合理安排的政策，在实际上没有落实好。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日子里，由于害怕丧失阶级立场，对资本家不敢采取利用、重用的态度，而是对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本领弃置不用，这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说，应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当然，总的来说，和平赎买资产阶级，保护了生产力，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五、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

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这个改造，包含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样两重任务。毛泽东曾经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

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二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①

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会接受改造？这是由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分析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愿意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具有革命性；一方面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特点，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针对这样一种两面性，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这不但有效地加强了国营经济，而且有效地改造了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是我们党成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个重要条件。邓小平曾经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②这是成功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财产实行国有化，但是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假如无产阶级能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③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

①《毛泽东思想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25—126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2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页。

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都是“不文明的资本家”，所以只好采取剥夺的政策。列宁认为假如能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无须流血便可取得国营经济力量的壮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这是“很便宜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和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和和平改造，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对资改造前、对资改造中和对资改造后。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前，针对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有能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抗衡，不愿意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不少资本家用各种违法手段谋取高额利润，“五毒”泛滥等情况，对资本主义投机势力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并组织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肃清了“五

毒”现象。同时，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争取他们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进行正当的经营和生产活动。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后，教育与和平改造的方式，便改为向资产阶级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他们学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势下面，资产阶级经过教育与学习，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感到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没有别的出路的。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指出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①这叫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因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的形式，一些资本家在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加上改造政策妥当，使资产阶级大体上能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因此使资产阶级易于接受和平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确定在工作中对资产阶级进行教育，作为改造资产阶级的基本途径。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一般都被安排在企业工作，他们同国家派遣到企业中的干部在一起，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作为私方人员，他们也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从观念上改变了依靠剥削工人维持生活的情况，劳动被人们看作是光荣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尽量发挥私方人员在企业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自愿原则，大规模地组织私方人员进行政治、时事、理论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克服剥削阶级思想。

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理论，使绝大多数资本家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使资本家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达到了消灭剥削阶级，同时又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第18章

从实际出发实现中国工业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实际，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代表毛泽东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样，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也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和教条出发。

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应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更应如此。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按照本国本民族的自己的特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多少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去遵循。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由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能从一而终的观点是教条的、僵死的，是束缚自己手脚使之不能前进的绳索。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国际环境和起跑线不同，实现工业化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

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毛泽东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打破了革命首先在城市发动并取得胜利、再扩展到农村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有了多种形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鉴于我国的国情特点，采取了同国外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同的策略，即在经济上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阶级也得到和平改造。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也要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的口号。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中国要工业化的设想。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6页。

中国的工业化的。在此之后，在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只有具备了发达的工业，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巩固。否则即使有了根据地，也会丢失。建国以后，毛泽东为在我国实现工业化，作了艰辛的探索。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对工业化（后来的提法是现代化）的时间作了预测。他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①后来，毛泽东又对我国的国情实际作了冷静的思考，认为要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根据中国国情实际，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那就是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资料的生产应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他们把重工业摆在首位。我国一方面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一方面根据中国实际逐步完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工业化道

^①转引自顾龙生：《毛泽东和现代化建设》，《光明日报》1986年9月19日。

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①毛泽东提出了这样几点：第一，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第二，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轻工业的许多原料、材料都是从农业来的，另外，轻工业以农业为市场的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三，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会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易于为人们所理解。第四，农业发展后，会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就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提供了市场，就会加速重工业的发展。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时要以农、轻、重为序，要求首先抓好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这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1960年3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农、轻、重为序，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建设的程序，是根据中国本国的国情实际决定的工业化道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业化道路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我们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在前进中不迷失道路，脚踏实地地前进，真正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第19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建设我们的国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时期中，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途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否则，不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一、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依据中国国情，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理论，解决了与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苏联的不同的革命道路问题，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理论形成的萌芽。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表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土地革命中，中国革命迭经挫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成为革命成败的转折点，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这里，提出了革命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反对了那种教条主义地依赖外国的观点。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强调了无论搞革命工作，还是搞经济建设，都需要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他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

同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又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原则，坚定了革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争取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573页。

^②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

胜利的信心。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离不开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援，但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使我们无法取得许多必需的援助，另一方面我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写下了关于自力更生和外援的关系的著名的一段话：“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②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论点，进一步强调了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仍然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项重要原则，是必须要仍然坚持的，是与对外开放的理论一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

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②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1958年6月17日。

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因为这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权利、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必须分外珍惜。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也是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所一贯坚 持的原则

前面已经说到，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革命取得胜利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也有一个对外交往的问题。比如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都有一个需要取得国际援助的问题，在与国民党等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有一个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①就是说，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争取一切必要的国际援助。这已经包含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

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建国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申明了独立自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往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决不会作任何大国的附庸。毛泽东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

^①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①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再有一丝一毫的染指。

在革命取得胜利即建国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进一步得到运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毛泽东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根据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平赎买了资产阶级，将千百万小农和手工业者组织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而且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我国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仰仗任何超级大国的鼻息，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施加的压力，坚持不当任何大国的附庸，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我国不但强调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尊重别的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希望别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就是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②邓小平的这段话，是对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的深刻发挥和发展。我们只有努力坚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原则，才能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繁荣的、现代化的国家。

①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②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

第20章

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

——学习《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在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有一系列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其中，《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篇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一文所阐述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方面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方针和原则，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著作，仍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趋向高潮。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基本确立了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初步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对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开始有所借鉴。在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国情实际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四个字，最早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这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召集各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座谈，听汇报。这样，毛泽东同志就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一次比较详尽、完备的调查研究，涉及的经济领域比较全面，加上其他一些党政领导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的汇报会，所以汇集的经济建设经验相对比较集中和丰富。

在听取各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同志自己说，当时工作很紧张，一天就是床上地下，起来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在汇报时，边汇报，边议论，边总结，收获很大。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个充分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个主要关系。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如实地说明，论十大关系的总结，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1956年4月25日，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论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十大关系的思想不断完善和充实。此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又经过党内多次讨论和

整理，由毛泽东同志最后在1975年审定，于1976年12月26日，亦即毛泽东同志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20多年之后，首次公开发表，1977年4月15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了这篇光辉著作。这是一篇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伟大著作。

二、五大经济关系的实质

《论十大关系》科学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谈谈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农轻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五个重大关系的问题，这五个经济关系，亦即经济方面的五大关系。这五大关系既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虽然这种探索当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

（一）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考虑的。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认为必须合理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走以工业总产值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道路。

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这是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应优先增长的学说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苏联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物力

财力迅速发展某些关键的重工业部门，增强了国际和国家经济实力。但后来由于苏联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不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显著的应有的改善，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迟缓，直接为人民消费服务的日用消费品就非常缺乏。

我们避免了苏联的这一教训，在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同时，抓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的同时，规定了要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之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极端困苦的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搞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的余粮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太低。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这条道路是不足取的，我们应当走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

那么怎样来走工业化的道路？怎样来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指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①这种科学的、辩证的分析，透彻地说明了我国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和方针。

我们走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是基于我们的国情实际而提出的。“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②在我国，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外，农业还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还是工业产品的重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723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要市场，而且，在经济还不甚发达的我国，出口物资的大宗是农产品，要靠农产品来取得外汇，以便进口各种工业设备。此外，农业还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因而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论述，使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发展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经济发展并没有如同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那样去发展，而出现了时轻时重的局面。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年多的调整，才扭转了多年来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33.6:33.4:33.0，逐步趋向合理、协调。

(二)沿海和內地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作为第二个重要关系提出来，是有理由的。在我国条件下，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极不平衡。据一些专家估计，我国如果从兴安岭起，经张家口、榆林、兰州至昌都，自东北斜贯两南划一条线，将我国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这两部分面积大体相等，则我国人口和工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五都集中在东南部，西北部只占百分之五。就是这东南部半个中国，发展也极不平衡，沿海工业要比内地发达的多。毛泽东当时便指出：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所以，“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拿现在确定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来说，它包括上海市全部和江浙两省的10个市、57个县，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0.08%，即不到

1%，人口占全国的5%，而工农业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15.6%，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0.8%，即五分之一多。而有不少后进地区，还需国家每年给予财政补助。

在这种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积极作用，以此为基础来支援、加强和发展内地工业，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极端缺乏的物力、财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只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只是在内地布点设厂，忽视加强沿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就会与予期的愿望不合，甚至适得其反，拖延我们的工业建设速度。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有一种貌似有理的论调，即过分地制造战争紧张空气的论调，极大地妨碍着我们对沿海工业的注意力。毛泽东因而指出：“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可惜在指出这个问题十多年后，仍然有人重犯害怕战争立即打响的毛病而主张工业建设的“山、散、洞”政策，许多新的工业设施布点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结果，使经济建设的力量大为分散，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延缓了我国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毛泽东辩证地指出，如果对沿海工业的发展采取消极的态度，到头来还是妨碍了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最后达到发展内地工业使之工业合理布局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党中央作出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的决定，建立深圳、汕头、厦门、珠海经济特区，建立海南特区和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决策，都进一步证明了办好沿海工业基地的重要性，这是毛泽

东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三) 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充满着辩证法。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大国,过去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重要,但是要加强国防力量,最为可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军政费用压缩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用更多的资金来“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的力量增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相应跟上来并取得适当的发展,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搞通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50年代中期,这个关系并不是那么易于为人所接受的,由于抗美援朝等战争的原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是比较高的,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从而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但是中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来的,中国人被外国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日子远没有被人们所遗忘,人们要加强国防建设以抵御国外侵略的愿望理所当然地经常地占上风。可是事情是辩证的,只有加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才能更好地得到加强,否则只能削弱国防建设。

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一个深入浅出的道理: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因为,国防建设的经费哪里来?全国财政收入是一个定量;增加军政费用,就势必减少经济建设的费用,这样就必然减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反过来必然影响国防建设。因果关系是会转化的。

(四) 在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过去

的经验，重点阐述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关系，强调了对这几个方面要统筹兼顾，任何偏差都是不可以的。正确地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中，这个问题并不是始终处理得很好的。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工作中的失误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在从1958年到1976年的19年中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快。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注意了这个情况，努力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年来，全国人民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加上这几年较多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使国家能够集中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减少，因而不能更好地集中财力物力搞国家重点建设，这也是需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中不断加以调整的。

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他说：“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当时企业自主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短，经验少，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只是原则地提到这个问题，没有深入进行这方面的论述。但已经提出了自主权问题，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都是有启示和指导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政策，有效地提出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与个人关系改革的问题，基本上打破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问题，从而为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走过一些弯路，有时集中过多，强调条条（即国务院各部）的作用，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有时强调简政放权，重视块块（即各省市自治区）的作用，往往分散财力物力，国家重点建设必要的财力集中不起来。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即是说，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既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全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也有个主次问题。要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用三中全会以后的话说，就是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上述五大经济关系，毛泽东作了明确的阐述。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①因此，《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经济关系的，主要是这五个关系。其余五大关系是政治方面的关系。但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中，也谈到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了必须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

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会有不够的地方，在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

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等，是列宁所早已指出过的重要思想。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①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人民经济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不但我们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注意向外国学习，在现代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比如日本，技术引进所花的投资相当可观，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它是近几年来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费用之比最为突出的国家，为一比六，即日本的技术引进费用六倍于其技术出口的收入，而美国则为十比一，英法两国则大体为一比一，德国为一比三。由于注意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日本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远比美英等国家为高，而我们国家经济的基础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就更需要向发达的国家学习。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抵制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制度和思想作风，“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种态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追求真理和进步的态度，是我们永远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当前及我们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是改革，二是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个思想，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原则的，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还叙述了许多重要的关系，其基本思想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加以发扬和光大。

三、《论十大关系》是指导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周恩来同志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向八届二中全会作的报告中指出：《论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具体的加以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一稿，已在胡乔木同志的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整理的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①

《论十大关系》成功地总结了我国建国初期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建国初期几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

①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6页。

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经济建设项目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初步经验。总结这些初步经验并提出今后发展的方向，是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迫切需要。《论十大关系》正是适应这种形势而产生的，因而具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曾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①毛泽东同志将《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作为区分我国照抄外国经验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的界线，旨在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道路，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是不行的。既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了自己独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中，我们党也能创造性地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什么在接着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就不能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呢？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说明，我们还在走着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此外，《论十大关系》还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总路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缺点，但其主要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因而有其正确的方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在1958年5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6页。

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但是它的基本思想早就由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来了。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著作之一，它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论点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它将指导和推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阔步向前。

第21章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中就曾说过，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计划经济必须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而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的。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文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运用权力把资产阶

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先前作为资本所具有的全部属性，而使它们的社会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依照预先规定的计划来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①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有计划按比例原则进行计划管理，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计划经济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实行的，离开了计划经济，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

而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资本家企业主的事情。国民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各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由全社会的统一计划来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家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在价值规律的自发支配下运转的。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是通过经济动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实现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②无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怎样竭力加强国家干预，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解决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国民经济成为根本利益一致的统一整体。这就使国家有可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统一的计划，在各个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效地使用资金，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正确规划生产布局，恰当安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重大比例关系，自觉地实现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虽然，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得并不是十分明显。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的体现，现在看来必须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计划、调节、平衡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的状况在短时期内还很难完全改变，商品经济也不是十分发达，我们现在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几十万个，集体、乡镇、私营企业总数有几百万个，对这些企业的全部经营实行计划，实际上办到的可能性不大。而计划只有符合实际，才能真正起到计划经济的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①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对于我国现在以至今后很长时期内都是毫无疑问地适用的。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包括市场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

^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单行本第16页，1984年10月20日。

例地协调发展，而不是把一切都包起来，都通过计划去实现。

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也说明计划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也不可能一切都按照计划的办。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体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①其实每年一次的经济计划，也不可能保证使生产和需要取得平衡，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计划在一年之内也要作经常的调整，才能保持供求的大体平衡。而长期存在的供不应求的情况，物资不能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情况，也不是经济计划在短期内便能解决的。而且，经济计划的实行，并不是因为是计划经济了，就不会产生实行计划的困难，就会一切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邓力群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记得1962年以前，对于本年度计划能否胜利实现，下个年度计划怎样制订。陈云同志和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总是说要过8月15日以后才能够见分晓。‘八月十五日光明’，那我们当年的计划就能顺利完成，下一年度的计划就可以保持较高的速度。8月15不光明，就是说，遇到了旱灾、水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完成当年的计划就有困难，下年的计划就要考虑到指标适当降低。”^②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计划不可能完全切合纷繁复杂的实际生活，不是万能的。

实际上，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②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5页。

践中，也并不是一切都实行计划经济，而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并不是实行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实行市场调节的。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姚依林就说过：“1957年我们通过市场调节的东西相当多，那时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东西大体上只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而通过市场调节的是百分之三十。1957年时，财政是平衡的，物价是稳定的，因此通过市场调节没有发生不利的影响，无非是这个商品通过市场调节价格提高一点，那个商品通过市场调节价格降低一点。总的来讲，从客观经济来讲，是稳定的。”^①这说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途径。

有些人往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人为地对立起来，以为实行了计划经济就不能进行市场调节，而实行了市场调节就不是计划经济了，其实，从计划经济的内容来看，经济计划的制定，必须要利用价值规律，必须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必须要运用价格、利润、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手段，而且要通过市场才能得到实现。反过来，从市场调节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也离不开计划的指导，离不开计划的要求。总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计划经济，那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离开了市场调节，则会僵死不活，经济建设就缺乏活力。因此，在计划的作用下，在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就可搞活整个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

二、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我国国家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和实施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初期，由于还存在很大部分私人经济，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比

^①姚依林：《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1981年1月10日。

较注意市场作用。随着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的实现、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行和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尽管受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党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党的八大决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和发言,都在探讨改变这种状况,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计划体制和管理办法。在1958年郑州会议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纠正“左”的错误期间,在60年代初期贯彻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改变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开放集市贸易等都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但是,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许多正确的观点和作法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了,没有得到执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否定毛泽东晚年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错误观点,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不断地提高了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提出的“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论断,正是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它通过研究国内外社会

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通过总结我国5年多来实行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成功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征作出了新的论断。它打破了那种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邓小平说，这个决定好，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①又说，这次会议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②因为这个决定明确地规定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与市场是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作用不同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自发的，无计划的调节，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市场调节作用是有可能被人们所认识并按照它的要求加以自觉利用的，所以称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市场调节，也就是把市场调节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内。但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是否正确，能否实现，最终都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因此，“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③计划与市场，两者是不可或缺的。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87年12月）第391页。

②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载《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599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31页。

关系可以概括为：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这种概括，主要就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而言，但同时非常明确地说清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

三、毛泽东论商品生产

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商品经济，这个似乎很简单的命题，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正式确立起来。这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本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全力发展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迫切的意义，是革命取得胜利后毫不迟疑地需要去做的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认为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强调计划经济就是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采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的管理办法，忽视甚至否定运用商品市场关系和价值规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的确，马克思曾经预示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生产者不需要交换自己的产品，“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

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也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②但前提是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恩格斯还指出过，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借助于价值形式。他说：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③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适应“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条件，曾经想比较快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不过，列宁很快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并从1921年起，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发展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国营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等等。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据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肯定了在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并且批评了那种认为商品生产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剥削制度的消灭，商品生产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④他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制订经济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④《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8页、第549页。

划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区分，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斯大林认为国营经济内部不存在商品生产，只存在商品的“外壳”；生产资料超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不是商品；价值规律甚至对农业的原料生产也不起调节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这种看法反映了苏联长期存在的计划管理体制排除市场调节，过分强调运用行政手段贯彻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的现实。

在中国，毛泽东也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商品经济问题。

首先，在1958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搞极左，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强调指出：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斯大林是搬列宁的。列宁说全力发展商业，我们应当说是全力发展工、农业、商业，问题的性质是农民问题。^①并说：我们是商品生产还落后的国家，不如巴西、印度。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对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毛泽东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与生产力也有关，因此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某些地方仍要通过商品来交换，毛泽东还严正批判了那种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说：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他否定了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修改文件时说：商品的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现在人们都是要避开这一方面。谁讲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大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要写上去。当一点右派。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商

^①引自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语》

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他把要不要商品生产提到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上来考虑。他指出：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以为是资本主义，看来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又说，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

其次，对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毛泽东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反复指出：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把商品生产限于生活资料，倒不一定。毛泽东并且正式表明了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指出：商品生产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毛泽东还说，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斯大林不把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赫鲁晓夫改了。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①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又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产生、存在和得以发展的重要的基础与条件，即社会分工，存在着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实体；存在着社会劳动同局部劳动的矛盾。商品交换不仅存在于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之间，也存在于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内的不同企业之间，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更存在这个问题。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相当大的部分都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这使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具有商品经济的特点。这种认识

^①转引自顾龙生：《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历史考察》，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1期。

是经过几年改革才逐渐牢固地树立起来的。

我们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既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正确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改革计划体制，指明了方向。

第一，要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计划经济的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能够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节，使市场机制受国家宏观调节的制约，从而使企业的微观决策和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要根据商品经济的特点和市场调节的要求，改变那种在计划上大包大揽、在流通中统购统销，在劳动上统包统配、在财政上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把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计划的范围和程度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尤其是象我国这样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尤其必要。

第三，要坚决抛弃把计划经济与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计划经济不只是实行指令性计划，也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带有强制性。为了使国家掌握必要的物质力量来调节社会生产，以保证宏观决策的实现，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过多。除此之外，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它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只有在必要时辅以一定的行政手段。这种计划形式可以把国家的计划指导同企业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今后实行计划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

现行的计划体制，属于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较宽。改革计划体制，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于部份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则完全由市场调节。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劳务活动，时间性短，地域性强，对经济全局的影响较小，不可能也不必要纳入计划；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由市场价格自发地进行调节，反而有利于产需结合，丰富和方便人民生活。因此，市场调节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的有益补充，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随着指令性计划范围的适当缩小和指导性计划及市场调节范围的适当扩大，在计划管理中必须充分重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在总体上只能是粗线条和有弹性的，要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努力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家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必须承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上，公有制始终要占主体的、主导的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邓小平在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也曾经指出：“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会得到改变的。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册第599页。

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解，现在理论界有许多种解释，当然最基本的理解是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的是绝大多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要实行经济计划，少数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则可以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那种重要商品由计划调节，不重要商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实质上仍然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不相容的传统观念的反映。这种观点认为，市场调节仅限于一些范围极小的不重要产品，实际上就是把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我们撇开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寻求这些不同观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承认“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大家都认为必须以这个原则来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大家都同意这个原则的使用和执行，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改革和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践中，不同的认识正在越来越接近于统一，接近于正确。

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快捷途径，是正确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被我国改革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索出来的新创造，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22章

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实际，走自己的路，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遵循的理论观点，也是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建设社会主义遭到挫折以后得出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加以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

一、按照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就指出过：“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中国的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横排本，第596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依照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穷积弱，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反动统治势力在农村力量薄弱，鞭长莫及，和中国有广大的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生活无靠的贫农等这些基本特点，采取了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样一条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打破了革命首先在城市发动并取得胜利、再扩展到农村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这样，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有了多种形式，这是由各国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因国情的不同而不同。同样，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需要走自己的路。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我国的国情特点，即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又与我们有合作的历史，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民族这样一些特点，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同国外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同的策略，即在经济上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政治上采取了团结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则给以定息和一定的工作安排，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工作。这样，就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将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这同样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创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严峻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等作了艰辛的探索，努

力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认真的实践。他从农业开始，进行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随后又开展对于工业生产的调查，连续听取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多个部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然后主持制定和写作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文献，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一穷二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将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每一次接见外国朋友，都要说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经济不发达，是个穷国这样的话，说明他对于中国的国情是正视的。1959年，毛泽东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时要以农、轻、重为序，这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建设的程序，根据中国国情实际提出的一条正确方针。

当然，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数次挫折，未能如人民之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来，只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徘徊前进。

历史总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历史引向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个历史新时期中，党中央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开始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外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

人自己的力量来办”。^①同时他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这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大道前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能建设成功，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蓬勃发展。

二、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

主义的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发挥与发展了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点，提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回答和解决这个新课题，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1亿中国人民在未来的近百年内所要着力完成的历史任务。

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变的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大目标，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指出：那种怀疑社会主义是不是有优越性，怀疑社会主义能不能战胜资本主义，那种散布所谓社会主

^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9页。

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终究要替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对于这一点，是不应该也不允许有任何怀疑的，因为这是历史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也是我们党历来强调的，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邓小平在谈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时曾强调指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①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许多方面现在还没有赶上、也不会很快就赶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同时，我们尽管犯过不少错误，受过一些挫折，走过许多弯路，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的几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所没有取得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原来同我们底子差不多、情况差不多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印度）比起来，还是要快得多。我们这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世所公认的。连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我们所取得的这一切胜利，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取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2—153页。

得的，正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所以，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也十分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①我们的党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初步的，仅仅是开始。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持久的努力。只有到了物质财富比较丰富，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进一步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才能真正为更多的人所信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②这就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作为评判我们政策的标准。邓小平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老是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也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必须意味着比资本主义更发展，更进步，更美好，更富裕，社会主义必须意味着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邓小平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是主要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我们的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

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1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15页。

国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说明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道路，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

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能从一而终的观点，是教条的、僵死的，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使之不能前进的绳索。这个道理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情况是不同的，怎能要求有一种走法呢？苏联采取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推翻旧制度的统治，中国则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不必都用一样的方法。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其它的办法进入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情不同，革命的主客观力量不同，历史社会条件不同，背景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尽相同，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国家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呢？

既然各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特点，那么，就要勇于走自己的路，而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邓小平历来认为，中国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①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重新概括出的重要结论。

第二，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这个问题很简单，所谓中国特色，就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1页。

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有中国的特色，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有其他国家的不同特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对于一切国家都适用的，没有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而各个国家的国情实际不同，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各异，社会经济制度的原有基础也不一样，从而必然使各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各自的特点。

中国的特点是，经过4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所指出的，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一句话，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站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后列”到什么程度？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第130位，就是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低得多。这当然有中国人口多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的国情特点，具体地说则是：

（一）中国11亿多人口，8亿多在农村。据1985年统计，我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0.18%，达83478万多。农业人口多，说明劳动力资源后备丰富，但因为基本上还是使用同几百年前差不了多少的手工工具搞饭吃，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太高，也不可能因政策的变化使农业得到持久的发展，农业商品率太低，一个农业劳动力养不了几个人，比发达国家差一大截。最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产业结

构有所改善，有将近8000万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成了离土不离乡，离农不进城工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也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进城工作，但这并没有改变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格局，而要做到这一点将是相当遥远的事。陈云说过，在中国办一切事情都不要忘记8亿农民这个最大的现实，因为这是最根本的国情。

(二)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又一重要表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了三个“同时存在”，即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1/4的状况同时存在。这就是不平衡。以不同程度的相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来说，情况就非常明显。例如，以乡镇工业为例，在华东6省1市的范围内，平均每个县有200家企业，1亿元产值，而西北5省区范围内，平均每个县只有30家企业，400万元产值，分别相差达7倍和25倍。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1/4。内地和边缘地区则比较薄弱，有些省区还要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助过日子。又如尖端科学技术，中国有不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人工胰岛素等等，也同时存在大量文盲、半文盲，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统计，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统计口径：6周岁以上）有2.8亿多，即占全国人口的1/4以上。

(三) 我们以前常称中国地大物博，我国的确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许多重要矿藏的产量和拥有的贮藏量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只要以人口一平均计算，我们拥有自然资源的数量就成为世界的后列。同时，有的自然资源由于交通等条件不具备，还无法开发。在近期内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以及开发自然资源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力量都还很缺乏，多数的资源只

是潜在的，不能解燃眉之急。另外，我国地域虽然辽阔，但可耕地面积并不太多，人均耕地面积就更少，比起世界平均水平来，要低得多。这也是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情，是不能忽略的。

（四）我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中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因而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标志、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没有得到长足发展。革命胜利后在很长时期内对商品经济的片面理解，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千百年来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集体化道路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的促进也是有限的。即便是经历了10多年经济改革的现在，农村的商品率也只有30%多，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现代化也只是在极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有条件的地区得到实现。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经济的观念也很弱。而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只有坚持发展商品经济，才能跳越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是我国的又一国情，这也是与我国经济比较落后、底子薄这一国情分不开的。

（五）我国建设资金缺乏。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资金主要靠本国人民的积累。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的基础差，底子薄弱，而且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首先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积累率不能太高，一般应控制在30%以下。这样，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不能不成为我国长时期内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自从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使这一政策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以后，政府采取了吸收外资、接受贷款等多种形式的筹资措施，在国内开展金融改革，解放思想，以各种办法筹集资金，但这都只能使资金缺乏的情况稍有缓解。现在，多方面都需要钱，但钱就这么一点，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说，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地还要依靠发

展本国经济，而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里还存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生活和建设的问题。两者要兼顾，不可偏废。

以上所提到的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的。与此相适应，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劳动收入；虽然从总体上说，劳动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须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因此民主只能是渐进地发展和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在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常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如此等等，这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

第三，走自己的路，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前面已经提到，一切民族都将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但是各个民族的走法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必须走自己的路。外国的经验只能借鉴，不能抄袭，不能照搬。教条地、片面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就会吃亏，就会受到不应有的挫折，这不是没有历史教训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①这两次飞跃的概括，准确地叙述了不管革命与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真理。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专门叙述。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伟大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新课题起码需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走自己的路，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作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动摇，否则就会失去信仰，失去精神支柱。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并不是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当作护身符，或当作教条，或拿个别词句去吓唬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始终要与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自由化倾向作斗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以后也不会停止的。

第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一个严重的教训，那就是在很多的年头里积累率过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因此，生产发展要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起来，不能再走那条不顾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年、甚至20多年基本不变的老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看到中国人民原有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低下，就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建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8页。

国40多年后，仍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实行的高积累政策，对于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的实力，对于发展重工业生产，应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由于对人民生活的兼顾不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不够，反过来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一点现在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多年中，注意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问题。这10多年来，是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的时期。拿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收入来说，1979年为644元，1986年增加到1332元，增加了688元，翻了一番多。而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一共才增加了198元；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就更快一点，1986年农民人均收入为424元，比1978年的132元增加了292元，增长223%，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虽然这仅仅是开始。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反过来也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速度，这就是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这10多年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历史性的成就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说明了只有在生产建设的同时，抓紧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使生产得到更快的发展，也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三，还需要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将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放在首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长期的主导因素，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起码的常识。

重视发展生产力，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象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坚持的一

条重要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更加明确了这一点。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邓小平在此之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反复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而要横下一条心，专心致志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即一切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大报告说：“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②而且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这就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重大意义将是无法估量的。

第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身是在发展着的，不能以静止不动的僵化观点去看待社会主义。

这里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是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的。他们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里发生。他们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因此国家所有制将成为唯一的所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68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页。

有制形式，从而也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个人消费品则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研究了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例如俄国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①提出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到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可以采取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并存的结构，以适应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

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70多年来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科学预见，已在许多方面被超出了。例如，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存在商品与货币，等等。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展，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设想的事实正好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提供了认识真理的钥匙。可见，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在发展之中的，不能拿不变的教条去套，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有固定的模式，是万古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否则，就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了，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事实上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来。因此，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满足于空洞的教条，拿过去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正宗，就不存在中国特色了，也不可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从新的历史条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下的中国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并具体运用到建设实践中去，才能真正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走自己的路，也才能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第23章

毛泽东论现代化经济建设

《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毛泽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发行了。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他的贡献。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

一、改造中国与世界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是毛泽东矢志奋斗的目标。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立志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必须重视经济工作，并初步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设想，也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认为，在服从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前提下，经济建设乃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生产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基础。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

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中国要工业化的口号。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二、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工业和国家富强问题进一步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就是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将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庄严口号。

在此之后，在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里，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相继提出了要把中国逐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要使中国富强，发展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号召。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只有具备了发达的工业，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巩固，否则即使有了根据地，也会丢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在毛泽东1952年下半年开始提出、1953年由中央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了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内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一化三改造”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行动指针，工业化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权的全力奋斗的目标。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又增写了一段话，这段话现在也收进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说：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②

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编写的这个《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已经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这样的字眼。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③周恩来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5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想,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因此,“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①

在此后的几年内,毛泽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悉心钻研,努力想使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出了设想,他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又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现在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此之后,毛泽东向刘少奇学习,分别听取中央几十个经济部门的汇报,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进行探索。以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基础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并提出“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号召，他指出“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设想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赶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出设想：“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就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①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过冷静思考后的客观估计，是基本上符合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他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客观条件，认为要使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到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劝别的同志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把时间设想得长一些，这样，就能取得主动权。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就建设现代化强国问题增写了一段话，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因国内外的各种原因取胜外，其余无一不是以我国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非是制度腐败与经济落后两条。因此，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②落后挨打的沉痛教训，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都记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7—828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

记忆犹新的。毛泽东从历史教训的角度，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方向。

同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时，增写了一段四百余字的话，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①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还引用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的话，激励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中国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而作出我们每个人的贡献。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为此他曾经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和决策，诸如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的思想，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思想，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处理好经济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理论，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理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等，都表现出毛泽东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以及在关于阶级斗争等重要理论问题上的失误，他未能最终将一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9页。

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设想付诸实施，未能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尽管如此，毛泽东对现代化建设所作的贡献，对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号召，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我国人民奋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在对毛泽东的宣传和研究中 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各地相继出版刊载了一大批研究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理论书籍和文章，以及反映毛泽东政治活动、生活情趣的回忆录和文学性出版物，包括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士撰写的专著和文章。其中有些读物在国内广为流行，十分畅销。

在这些作品中，不乏严肃、高质量的佳作，其对于正确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加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增强凝聚力，都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不看到，有些作品存在不健康的倾向。这些倾向，对于正确地研究毛泽东，对于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是个障碍。

一、歪曲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民粹主义。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并没有清算他原先选择的民粹主义理论。他们把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中国国情特点而提出的正确口号“若否定贫农，便是否定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说成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者“脱下学生装，到民间去”的重现，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命”是为了实现他的民粹主义理想，建立一个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结构。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实践，同民粹主义的主张几乎一样，因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他们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建化和儒学化，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的根植。

二、在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否定一切，甚至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理论界、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百家争鸣，以求趋向真理的一致。问题是有些人借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为名，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在1951年就开始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全部否定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还有的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也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晚年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关于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思想、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等许多理论及实践也是正确的，全部否定毛泽东的晚年是错误的。

三、在众多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文章中，通俗出版物太多，研究性的著述比较少。应该说，在毛泽东原先被神化的情况下，出版一些真实的关于毛泽东生活情况的著作，对于人民了解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认识这位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领袖人物，是有益处的。问题在于，一是有些作品不顾历史事实，仅凭一星半点材料或是道听途说的传闻，热衷于写“奇闻”、“秘录”，失实的不少。一些所谓纪实文学，迎合一些读者喜听秘闻轶事的心理，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二是儿童积木式、拼凑成书的“大作”太多太滥。其中有的是以同

一题材，以不同标题出版多种书籍，其内容类同，只是在词句、次序上作些调整，交不同出版社出版。有的仅靠剪刀浆糊，把已经出版的书籍中的所谓奇闻轶事，拼凑成书。三是有些翻译作品质量不高，或者翻译草率，错误百出，或者对书中不正确观点不加任何评判，听任谬种流传，造成不良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过：“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建议重视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倾向，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和纠正这些倾向，使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

后 记

我1978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名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改现名）工作以来，有幸参与了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注释和研究。在工作中，我注意了对毛泽东经济思想资料的积累，开展了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我发现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尚未深入开拓的领域，因此决心努力整理。本书便是我十多年来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之一。

收入本书的有些章节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但编辑成书时作者均加以修改增删，重新整理。本书计划写作时，曾获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研究员的热情鼓励。我的三十年前的大学老师蒋学模教授为本书写了序言。山西经济出版社陈宇华、李廷芝同志对本书出版给予了积极支持。还有其他许多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收集材料的同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顾 龙 生

1992年1月1日